

夏潮論壇 2

探討的、批判的、進步的——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三月出刊

第一卷·第二期

財政部浪費國帑，苛擾人民！
黨外雜誌「穿梆」乎？
「花花公子」訪馬奎斯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誰來制衡

當今台灣「壟資派」的代言人，對於「台灣目前經濟問題及解決途徑」的分析和主張，如果把它放在理論與歷史中去檢驗，結果會發現那些主張全是錯誤的。那些錯誤的主張，不僅僅出現在兩次由「台視」轉播出他們的討論會和座談會之中，更是經常散佈在兩家壟斷資本家的「大報」和由一家資本大王獨占的「天下」的輿論之中，上則在引導政府決策，下則在誘騙社會順從，積非成是，已非一日。其目的就在於維護「政治寄生的壟斷資本家」的既得利益。

在他們那些錯誤的主張中，最帶有煽惑性、虛偽性的主題有二：其一是美化壟斷資本家，一律改稱為「企業家」，並且要為企業家的精神定位，替企業家的地位定位，視他們是全社會的領導角色，要人民對他們禮拜，要社會對他們放縱；其二是把國家的利益併為資本家的利益，把資本家的利益視為國家的利益。這也就是等於暗示人民愛國家就得愛資本家，人民要對國家效忠就得向資本家效忠。於是資本大王不僅成為「管理之神」，而且成為全體國民效忠的偶像，這是十分荒謬的。

大家都知道，從五、六十年代壓迫農工（是以壓低糧價和廉價勞工來表現的）和強迫儲蓄，培植起來的台灣經濟的基礎，到七十年代通貨膨脹、外貿導向和投機中變了型，即保護出來了壟斷大企業和壟斷資本家。經濟計量的屬性（成長率和名目所得）很高，經濟體質的屬性（資本結構和資本家）很低，因為保護出口競爭，所以又特別富於「政治寄生性」。如果，真要替現在的壟斷資本家定位的話，韋伯（M. Weber）的「商業資本主義」、「政治寄生的資本主義」、「近代資本主義」（合理的資本主義）這三個類型可

以用作參考指標，來測量台灣的壟斷資本的發展，還停留在「政治寄生的資本主義」的階段，所以他們還不配稱為「企業家」只能稱為「政治寄生的壟斷資本家」。

同時也就可以理解，現在台灣壟斷企業的利益，只是政治寄生的壟斷資本家的利益，與國家利益絕對不一致，與全民的利益更不一致，當然也就與整個社會利益不一致。簡單來說，壟斷資本家的利益目標是「利潤成長」，以之用來擴大他們的壟斷資本的權利；而國家政府的利益目標，就不是「利潤」，而是自由、安全 and 社會福利。經濟學的鼻祖亞當史密斯也早已指出，資本家的利害是與社會公共的利害相反，在許多情況下他們是欺騙和壓迫大眾的。壟斷資本家的經濟作為，的確都是為了利潤及擴大資本權力，連捐出的「基金」成立的基金會，也是為了逃稅之故¹。資本無國界，利潤無恩情，那裡的利潤高，它就向那裡流。

壟斷資本家的利益，不但不與國家社會的利益一致，而且相反，與社會其他各階級之間充滿了利害衝突，這種經濟的利害衝突，當然會引起階級衝突，經濟學是把它放在「生產三要素」之中來分析的，也就是指土地所有者的地主、勞動力所有者的工人和資本工具所有者資本家的衝突，特別是由生產組合到分配組合支配權力的衝突為最現場的利害衝突。研究這種衝突及其解決的途徑，才是經濟學的主題，也才是解決現實問題的關鍵。所以，美國「制度學派」經濟學家康蒙斯（J. R. Commons）說：「政治經濟這門科學，是起因於利害衝突，起因於努力使利害衝突轉變為理想的調和。經濟的衝突形成為政治的衝突與戰爭，這都是由於稀少所致。由於利害衝突，

資 本 家 ？

或者產生實際可行的利害調和，或者產生停頓，或者產生破裂而需要求助於另一次更強有力的集體行動，即立即可以付之實施的政策或戰爭，以期於衝突之中求得秩序，而不是企求調和。」依此來看，壟斷資本家利益與國家社會利益一致調和之說，根本是欺人的鬼話！凱因斯主義的實際運作不過只建立一個新秩序，馬列主義的實際運作也不過只建立一個新秩序，階級的利害衝突都未「調和」。台灣的偽經濟學家說台灣經濟「調和」了，而能共享成長，真是夢囈。

歷史告訴我們，資本愈是集中壟斷，經濟就愈會出毛病，社會也就跟著出毛病。當土地被集中在封建地主手中，造成「莊園經濟」，停滯不前，「重商制度」就起來取而代之，建立了一種經濟的新秩序。當商業資本被集中壟斷，而又有特許保護，停滯不前百病齊發的時候，工業資本主義就起來取而代之，建立了一種經濟的新秩序；這個新秩序雖被賦予宗教倫理和自然哲學的基礎，可是它從自由競爭到壟斷競爭進而成為寡頭壟斷，所以「社會主義」和「第三波」都要取代它。在沒有取代它之前，也有四種制衡它的模式：

- ①社會主義式：即西歐社會民主黨、工黨等的模式，把壟斷資本企業收歸國有（社會公共所有，參與管理），提高社會福利。
- ②第三波未來式：即「第三波」一書的作者杜佛勒提出的模式，以產銷合一，小規模生產、社區市場、區域經濟、直接民主，來代替壟斷企業的大規模和大而無當的政府。
- ③節制資本式：孫中山民生主義的主張，政府要節制壟斷資本家的壟斷資本的膨脹，

而不是節制資本累積的成長。

- ④經濟制衡式：即一般的社會運動形式的對抗行動，如工會對抗權、社會抵制權的集體行動等等。

第一種模式，在台灣行不通，雖然有一個「民社黨」的存在，但是它太無力了。第二種模式，是未來式，適用於成熟的經濟社會，不適用於政治寄生的壟斷資本主義的台灣，第三種模式，是執政的國民黨的黨義和憲法既定的國策，如果政府能夠認真的去實行它，當然是好事，現在的問題是當前經濟的決策和財政金融措施的實踐，以「出口領導成長」的名義去擁抱壟斷資本家，並鼓勵「父子班」和「母子班」，而更加封建和壟斷，專門支持「五鬼搬運」的壟斷資本家，令人失望。剩下的就只有第四種模式了！由於壟斷資本家的獨裁獨享和壟斷資本企業的獨占獨大，侵犯了整個社會的「經濟人權」，製造了整個社會的「痛苦指數」，社會就得保護經濟人權，運用各種對抗權力，形成各種抵制運動，來制衡壟斷資本家的狂妄、和壟斷企業毒害的囂張。

要記住「資本無國界，利潤無恩情」，任何道德式的吶喊，人道式的呼籲，都不可能打動壟斷資本家鐵石的心腸。失去的自由，必須自己去收復！失去的權利，必須自己去收回！當壟斷資本家聯合壟斷社會財富、傷害人民生存、剝奪大家經濟人權的今天，你向任何廟裡燒香求助都沒有用，只有我們自己才能救自己，只有以聯合行動來對抗聯合壟斷，才能取得平衡。大家都要起來保衛經濟人權啊！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三月出刊

● 第一卷 / 第二期 ●

本刊文章歡迎轉載，但請註明出處。

夏潮論壇 目錄

<p>● 社 論 ●</p> <p>● 讀者之頁 ●</p> <p>■ 政治經濟 ■</p> <p>每月評論</p> <p>● 紀念青年節 ●</p>	4.	誰來制衡資本家？	本社
	6.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黨外雜誌「穿梆」乎？ ● 不見得有利益的「利益團體法」 ● 日商在壓榨我們的勞工 ● 錢那裏去了？ ● 「深耕」又被查禁了！ 	吳明牧野 不平鳴 路芝適 老朽
	10.	給青年朋友的一封信	青 青
	14.	<p>貪殘肆虐是禍亂的根源</p> <p>——為財政部言行不相顧，浪費國帑，苛擾人民，使政府信用大受損傷，向行政院提出質詢</p>	立法委員 / 胡秋原
	17.	<p>辛苦一整年，獎金六百元？！</p> <p>——正大尼龍工廠示威事件</p>	陳莫愁

發行人 / 柯水源
 社長 / 黃溪南
 總編輯 / 蘇逸凡
 執行編輯 / 鍾 喬
 美術編輯 / 王智章
 廣告顧問 / 進步廣告小組
 編輯部 / 台北郵政第29-247號信箱
 電話：(02)9144333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誌第3474號
 中華郵政台字第0791號執照登記為新聞紙類

劃撥帳號 / 555202 黃溪南

零售 / 國內每册新台幣50元， 國外每册美金2元
 長期訂閱 / 國內：全年12期500元 半年6期280元
 國外：航郵全年歐美地區美金30元
 亞太地區美金26元
 港澳地區美金20元

印刷所 / 翔豪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萬大路640巷30號

發行所 / 台北市泰順街59巷10弄12號4樓

■ 世界之窗 ■

名著書摘連載

■ 歷史與思潮 ■

● 婦女節專輯 ●

■ 藝 文 ■

■ 電影廣場 ■

■ 環境與公害 ■

- | | | |
|-----|--|-----------------|
| 20. | 脫！脫！脫！
——明星裸照風波 | 曾心儀 |
| 23. | 評「中國之春」論民主統一 | 王曉波 |
| 26. | 同胞需團結，團結真有力
——與蔡憲崇談台灣民主運動 | 陳 華 |
| 29. | 危機時代需要新思潮
——「南方」雜誌訪美國名政治經濟學家蓋爾布瑞斯 | 南 南●譯 |
| 33. | 日本消費社會的形成(上) | 犬田 充●著
金 劍●譯 |
| 38. | 為女權而戰！
——圖解「女權運動小史」 | 本刊編輯部 |
| 43. | 「三八節」有感 | 丁 玲 |
| 45. | 拯救苦難的女同胞！
——盼「優生保健法」儘速立法通過 | 李 豐 |
| 49. | 願我的書，使人們更相愛!!
——198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奎斯訪問記 | 黎 軒●譯 |
| 70. | 文革前的大陸電影 | 韓良露●譯 |
| 77. | 南韓「經濟奇蹟」的昂貴代價 | 黃立禾●譯 |
| 80. | 公害日誌 | 編輯部 |

北美洲代表 / MR. JAMES NING
106 ROOSEVELT BLVD.
FLORHAM PARK, N. J. 07932
U.S.A.
美西聯絡處 / MRS. San San Chen
2627 Hillegass #104
Berkeley Ca.94704
U.S.A.

台北總經銷：
百全書報社
電話：(02)9245210

各地經銷處：
自強書局 電話：(032)224807
國華書報社 電話：(034)555853
大華文化服務社 電話：(035)228054
英華書局 電話：(037)320810
台中書報社 電話：(042)333363
嘉聯圖書社 電話：(052)324581
永茂書報社 電話：(062)234339
天和書報社 電話：(07)382975
環球書局 電話：(087)323071
民生書局 電話：(039)323765
國民書局 電話：(039)543743
花蓮文具店 電話：(038)322941
紐約書局 電話：(089)322267

自立叢書

出版者：自立晚報

· 服務專線：351-9621轉262

地址：台北市濟南路二段十五號

· 劃撥：3180帳號自立晚報社

總代理：忠佑實業有限公司

· 電話：393-6770

■ 郵購一律九折優待(不包括特價)

1 自立藝苑書畫選集

自立晚報編印
定價600元

自立藝苑書畫選集，係精選宋、元、明、清及近代時賢書畫、金石二百餘家、三百餘幀之代表作品，以八開銅版紙彩色精印精裝，足以存真，無論欣賞或珍藏，均具價值，共二〇八頁，定價六百元。

2 台灣民族運動史

吳三連等著
定價250元
特價200元

本書描述民國三年至民國卅四年之間，數百萬台籍同胞在日本殖民帝國統治下掙扎、奮起、衝刺以爭取民族尊嚴的一系列民族運動。將卅三年來血淚凝聚不朽的民族情操，萬千個烈士捨身塑造的大漢尊嚴，詳盡完整的記載出，共五六八頁，二十四開。

3 蓬壺擷勝錄(一)(二)(三)(四)

林 藜著
每冊定價100元
合購四本特價300元

台灣又稱美麗之島，名勝古蹟遍佈，今所遺留建築多樸質可愛。本書作者鑑於台灣大陸血脈相連，不僅對山川景物普作指引，進而對文物因革，風俗民情善作報導，可視為採風問俗的經典之作，共八五七頁，二十四開。

4 法窗夜語(一)(二)(三)

吳啓賓著
每冊定價80元
三冊合購特價180元

吳啓賓律師以故事形態、深入淺出的方法灌注您與日常生活習習相關的法律常識，不僅可以培養國人守法的精神，維護個人合法的利益，對於違法亂紀者也有遏阻的效力，共四五頁，三十二開。

5 吳豐山專欄(一)(二)

吳豐山著
單冊定價60元
合購特價100元

吳豐山專欄是國內唯一正式具名之長期性政治專欄，自六十四年迄今仍屹立不斷，以鼓吹民主法治和繁榮為寫作準則，常能言人所不敢言或不願言，對時政發揮相當影響力。現書已出版計第二冊，共四三四頁，三十二開。

6 替歷史作見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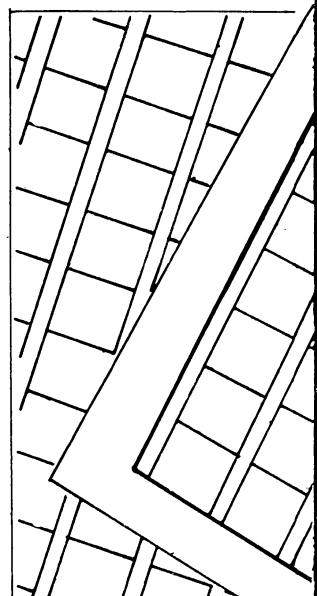
張忠棟等著
定價100元

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在立院審議過程中，許多專家，學者踴躍地提出鞭辟入裡的見解，本報鑑於此乃輯各家之說，逐日整理成「替歷史作見證」以為這一代有良知、有勇氣的知識分子為維護人權所留下珍貴的記錄，共二四五頁，三十二開。

7 雷根小傳

章台生、林琳著
定價 60元

本書係中文版介紹現任美國總統生平最詳盡的一本，作者因此得雷根總統親函致謝。內容自雷根總統童年至大學時代、好萊塢生涯、州長任內迄三度問鼎白宮，皆有詳實報導，共一四九頁，三十二開。



● 訂價：國內每卷台幣100元 國外航郵歐美美金7元 / 亞洲美金5元 / 港澳港幣25元 (存書不多，欲購請從速。一次合購10本以上七折優待，五本以上八折優待) ● 郵撥帳號：555202 黃溪南帳戶 ● 郵政信箱：台北郵政29-247號信箱 ● 電話：9144333

買新“夏潮” 不要忘了買舊“夏潮”

敬請珍惜民國67年舊“夏潮”第四卷、第五卷合訂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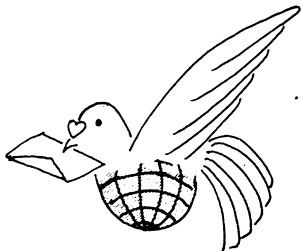
當您翻開這一本中斷了四年，爾後復出的“新夏潮”，請您不要忘了四年前“舊夏潮”波瀾壯闊的一年，就是那一年，文學界掀起了空前激烈、燦爛的大論戰——鄉土文學論戰，就是那一年，黨外開始了行動上的大聯合，就是那一年，中美斷交突然宣佈了，也就是那一年，新人輩出、洶湧澎湃的大選舉，中途停止了……而“舊夏潮”也在那一年停刊了……。

“舊夏潮”第四卷、第五卷合訂本
第四卷中華民國67年1月～6月
第五卷中華民國67年7月～12月

要目：

1. 鄉土文學論戰——
王文興教授談鄉土文學的功與過
論鄉土經濟與鄉土文學
胡秋原論王文興 nonsense in sense
中國人立場之復歸
2. 論新聞自由——
新聞自由的歷史對照
諍言給「聯合報」副刊
為大老板服務的報紙
3. 黨外民主運動大採訪——
訪問康寧祥、蘇南成、康水木、余登發、黃順興、陳鼓應、周滄淵、張德銘……。67年大選選情分析
黨外民主餐會報導

——懷念舊“夏潮”，支持新“夏潮”——



讀者
之
頁

一個反時代潮流的提案

編輯先生：

國民大會七十一年度年會通過呂世明等九位國大代表提案，建議政府限制選民及候選人資格，其中公民投票資格應提高為受完九年國民教育以上。

經一位朋友的介紹，知道貴刊相當尊重我們這些社會下階層的人，希望能借貴刊一角，代為表達我們對這些國會裏的代表的憤怒！

雖然我們都未受完九年國民教育，但我們也是國民，也有我們的判斷和我們的需要，所以我們當然也可以透過選舉，選出我們的代言人以及替我們爭取權利的代表。憑什麼要以教育程度來界定一個國民他對於政治權益的訴求？

只要靜心想想，在軍隊裏，走在最前面的士兵，很多是小學畢業的青年；加工出口區裏、建築工地上、十大建設，任何一個工地現場，那些做苦工的老兵、揮汗的年輕工人、生產線上的女工和男工，有多少小學畢業和未受小學教育的中華民國國民在沈默努力的工作著。在我們這個以勞力為主的國度裏，那一種需要勞力工人的行業，不需要這些沒有機會接受良好教育的國民獻出

一分力量，為這個島國爭取經濟成長的成績上不可抹滅的苦力……

長久以來，我們均無法以合理的方式得到應有的經濟分配，制度上種種奇怪的現象，即使我們的經濟在成長，但比較起來，最慘的還是我們。現在，竟還有這些國民代表提出這樣令我們心痛的『建議』，不禁讓我們覺得他們突然封建起來的心理背景，使人心寒……

雖然現在因著種種原因，我們還無法和他們理論，而我們投票選出來的代表也很少替我們爭取說話的機會，但我們會自己努力，爭取機會學習，用功讀書，互相勉勵，或許有一天我們也可以說說我們想說的話……所以今天我們聚在一起，討論好寫這封信給貴刊，即使我們的文字無法像一個作家表達得那麼好，但是我們不願再繼續沉默下去，所以懇求貴刊主編先生為了我們因投訴無門給予一次披露的機會！

我們想要清楚地告訴廣大的人們，特別是上階層和知識階級的人們，這種事會發生在我們的國會裏，實在是國家的羞恥。我們都知道這些老代表來自怎麼樣的時代和怎麼樣的階層。坦白說，他們無權否定我們應享的權利，令我們吃驚的是，他們竟在這個時候還提得出來，甚至通過！我們如果誠心遵行三民主義的話，這些人豈不違抗了全國人民和蔣總統經國先生的意願！請大家做個公斷！

我們真想說句「他媽的」！

敬 祝

編 安

五位就讀於某市立國中補校的學生敬上

是刁民還是惡僕？

編輯先生：

看到「夏潮論壇」第一期關於二重疏洪道示威真相的報導，對省政府主席李登輝叫嚷「公權力」而罵老百姓「刁民」的形狀，油然而出一種「官大氣盛」的印象。

李登輝為了「公權力」，對著二重疏洪道業主，做滿大人模樣，罵兩聲「刁民」，算是客氣，至少沒使出滿大人對付「刁民」的手段，「砑

擦」一聲，人頭落地。

平心而論，公益私利，自然公益為重。只是同樣對「公益」與「私利」，官方有他們的版本，老百姓有老百姓的理解。

但從此地傳播媒介中歸納出的印象，似乎黨部、官府說的，電視、報章「宣導」的為公；不服政令，不聽「宣導」的，是私。

然而，有力官員、民意代表等大人先生們要各級政府重劃都市，說是為公；只是重劃後，公園預定地成了住宅區，地價飛漲，正是口說為「公」的大人先生們的地。倒是一些本地人世代的住所，突然間被劃成了違建，不拆，就是以私害公，是「刁民」。這樣的「公」「私」，再經報紙、電視混淆，難怪一般局外人要罵那些「自私」的「違建戶」，而不去追究整天罵黨外「混淆視聽」，自己却不餘遺力的混淆視聽的報紙、電視了。

在中國文化中，從來講的是「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道理。孔子說：「苛政猛於虎」，孟子說：「民為貴」，可沒說過「民為刁」，否則，「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大丈夫，豈不盡成「刁民」。「水滸傳」同情「官逼民反」。杜甫說「盜賊本良臣」。朱熹論李揖寇廣西是「取民太重，深是不便」之故。罵老百姓「刁民」只是那些自以為是人民主人的專制酷吏。

今天是民主時代，人民是官吏的主人，官吏不過是人民的公僕。花錢雇來的僕人敢罵主人「刁」，在普通人家老早就要解僱了。但是，今天省主席不民選，人民空有主人之名，以致僕人成惡僕，居然罵主人是「刁民」。李登輝原來應該不是如此，但官當久了，「近墨者黑」，竟然也染上了專制酷吏的惡習。

大人先生們有他們的一套「公」「私」，老百姓有老百姓的「公」「私」，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但大人先生們的「私」，絕不是老百姓的「公」。以大人先生們的「私」為老百姓的「公」，還不及「封面女郎」雜誌落拓大方：私處就是私處，絕不在私處蓋上「公權力」的標籤。硬把大人先生們的「私」當成老百姓的「公」，那不是刁民，而是惡僕才對！

林榮上

陳鼓應來函

夏潮諸友：

好幾個月沒給你們寫信，很抱歉。去芝加哥的那三個月，大部分時間在圖書館裡找資料，影印了幾千張新舊刊物上的文章，但多未及細讀，粗讀的感想實在太多。從思想史的角度看，台灣這三十多年來，知識界的表現，是個大倒退。這固然是時局使然，但就人物格局而言，也比晚清及五四時代遠為遜色。當今知識份子坐井觀天，以為置身「現代化」的天地裡，陶陶然自喜，而心態的瑣細，視野的短淺，作為的急功近利，誠令人可嘆！

回柏克萊一個半月，在修訂舊作「老子」，帛書本出土後，一直沒有機會修改，這次參考有關帛本的資料及當代學人的著述作了很多的增訂，註釋部分增補了一百九十多條，其他部份也作了一些潤色，上星期才完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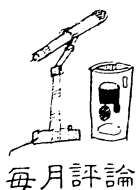
我原計劃舊曆年前回台北探望岳母，提出申請已有數週，迄無回音。我機票已買好，只是日期未定。四月間要去芝大，所以這個月底或下月初便得起程，我擬先到東京，停台北，到香港。到香港後，可能會在中大及港大作二、三次演講，其中一次要講「帛書及老子其人其書問題」。回台探親之事，據協調處承辦人面告：「可能不很樂觀。因為國內對你還是很敏感的。」

昨天晚上，在此間九號電視台看到一個專報導台灣現狀的節目（Chinese Affairs），觀點尚持平，各方面的看法都顧慮到。黨外人士有永善和周清玉的訪問，都講得很好。

祝好

鼓應一九八三年二月八日

為感謝您的鼓勵，即日起至三月底
止，工農朋友、學生讀者六折優待
全年300元；一般訂戶八折優待
全年400元。



每月評論

黨外雜誌 「穿梆」乎？

■吳明

慾海風波，苦海無邊。佛家每每以清心寡慾告誡衆生，如果貪色重慾，無法煉成菩提正果。

偏偏世人不喜聽木魚清誡，汲汲於色相的追求。在這種自然人性的要求下，舉世犯衆色相智昏；「封面女郎」利用人性的弱點，造成國內首度的色相風波，其來有自。

我們且不談「封面女郎」諸位俏麗暴露的程度，及其是否構成傷風敗俗的罪行，因為這有待司法當局的裁決，不是市井子民可以置喙的。

但是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封面女郎」在道德君子的同聲撻伐下，遭到新聞當局嚴厲的制裁。「浩浩狂瀾翻到底」，煽慾諸君略諳法令，乃轉走脫法行爲，出「封面女郎」叢刊，此招令嗜色的癮君子不得不佩。

由「封面女郎」的脫法行爲看出，它並不是始作俑者，因為本有李敖的「千秋評論叢書」爲前塵，及「在野」的叢刊，繼之三月中旬的「博觀」叢刊爲後盾。可是無巧不成書，新聞當局事先警告「封面女郎」，如果一出叢刊，雖然合法，還是會扣你一頂帽子的。而脫法行爲的第一頂帽子，却讓橫衝直撞的「在野叢刊」搶頭采，足令肖學者不寒而慄。

傳言，尚未出刊問世的「博觀叢刊」全體同仁，瞎子吃湯圓心裏有數，恐亦會遭「在野」、「封面女郎」的命運，說不定是政策性的考慮，誰都逃不掉的，因為選舉一到，自然要緊縮言論。看來全島色情加黨外雜誌的大整肅，花開並蒂還是第一春呢！

黨外雜誌目前衆刊樹立，如雨後春筍般的發芽，仿如春秋戰國的局面。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當局禁黨外，黨外走脫法的途徑，替言論自由寫下外史。期望黨外雜誌在「穿梆」的風波中，堅苦卓絕道貌岸然，不要做過多的明星秀，思本更多的政治瓶頸問題。縱然天不從人願，遭到政策性考慮的排擠，也要爲言論自由外史，豎立楷模的標準。

不見得有利益的 「利益團體法」

■牧野

最近立法院因爲正在審查合作社法，使得全國的合作社瀰漫著一股草木蕭蕭的氣氛。爲什麼全國的合作社會草木皆兵呢？大概是三十餘年來，凡是政府想立的法，一定不是對立法的對象有利，而是孫悟空的緊頭罩，叫它們逃不出政府的如來掌心。

人人自危的合作社，自然會瞭解這個歷史的立法傳統，乃不惜運用重金，向立法院發動金海戰術。於是自鳴清高的某些立法諸公看不過去，展開扒糞工作。整個立法院頓時傳出了收受合作社數千萬的賄款風波，及立法諸公闔府歡欣的出國觀光壯舉。

日商在壓榨 我們的勞工

■不平鳴

在農業社會裡，地主爲了滿足自己貪婪的私慾，就以佃農爲壓榨的對象。所以，在中國歷史上，許多有社會良心的知識份子都紛紛爲被壓榨的農民鳴不平。「水滸傳」裡有首詩：『夏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苗半枯焦。農夫心裡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是爲梁山伯好漢「替天行道」的根據。日據時代，台灣的文學家，也有許多作品爲農民們鳴不平的。甚至有文學家如楊逵者，乾脆投身農民運動，組織「農民組合」，爲農民奮鬥。

「耕者有其田」之後，台灣的地主大體上是消失了，但台灣農民還是忍受着「農業培養工業」的犧牲。又由於經濟結構的轉變，現在台灣的

「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法治國家講究證據確鑿，筆者亦不願於此繪影繪聲。只不過當立法院因合作社法掀起軒然大波時，我們的中國時報、聯合報諸記者，一身學養，常因為新聞角度的考慮點到為止；這次却被他們逮個正著，發抒胸中塊壘，大談制定「利益團體法」。思以此法，輔導規範囂張的利益團體，走向合法的正軌，成為國會的第三走廊。用心良苦，令人敬佩。

考察歐美先進民主國家，尤其是美國，利益團體活動頻繁，乃對政府的決策構成壓力。利益團體常與國會山莊的議員勾結，透過這種種的孔道，在政府的決案結果中分一杯羹。一般兩方的政治學者，為了合理化這個立法過程，創造出多元社會的民主藍圖學說，掩飾利益團體的諸種弊端。以致一些西方政治學者，以「少數人的民主」譏諷。

事實而言，西方的利益團體，雖有少數民主的現象，可是社會的變遷，導致民主的社會中，個人非結合成為團體，實在不能成為利益發表的有力者；從這個角度利益團體有其存在的不可避

免性。雖然少數的財閥巨賈，控制了多數的國會議員，可是西方開放的社會中，因為民智的提高，就是一般民衆，也能自由的結合成為有力的團體，他們的選票，仍然會得到國會議員的青睞。

反觀我國的狀況，次級團體，如工會、農會、商會、漁會，這些代表孤苦無依的中下階層民間團體，長期受到某些因素的干涉，根本無法活潑的有力運作。他們的利益，無法透過利益團體遊說的孔道，向國會山莊施展壓力。立法院偶而有代表他們的聲音，大抵是少數道德的立法委員，由良心和關懷發出聲音，只不過留下歷史的證言罷了。

所以筆者以為，如果台灣想朝向多元民主的社會發展，當務之急，應讓真正代表中下階層的次級團體，從泥土中茁壯成長，以便和少數巨賈抗衡。如果上述的次級團體茁壯，仍然產生立法過程的不當，再訂立「利益團體法」，亡羊補牢時機猶未晚也。否則此法一訂，恐怕只是壓抑真正多數人的利益團體生根；因為少數巨賈神通廣大，目中不會有法的。

工業人口甚至超過了農業人口。農民沒有了地主，但新出現的工人却有了資本家老闆。

在經濟景氣的時期，工人是老闆賺錢的工具；經濟不景氣的時期，工人又成為老闆犧牲的對象，被裁員而失業。根據經濟學說，一個國家要發達資本，這是不得不用的一種積累資本的手段。在目前社會經濟的體制下，雖不得不有這種資本積累的手段，但也得合情合理。然而，台灣不但有本國的資本家來壓榨我們的勞工，並且，還有外國的資本家來壓榨我們的勞工。外國資本家更是仗恃着政府左袒外資的政策，而無法無天。

根據二月十一日「中國時報」中部版報導：

台中縣東勢鎮台瑞電氣公司，在名義上是中日合作，實際負責業務的是日本人。日本人雖在戰後投降，離開了台灣，但仍一向視台灣為其殖民地，尤其有政府左袒外資的政策，就更加深他們這項心理。所以，日資工公司對台灣員工一向不顧台灣勞工法的規定，而有許多不守法，不合理，不近情的要求。例如，台瑞公司要求員工們在一個月之內必須加班九十二小時，平均每天（

含星期天）三小時，如未達加班規定的百分之八十，便扣取工資，使員工心懷不平，但值此經濟蕭條之時，惟恐抗議而遭開革失業，故只得向縣府提書陳情。

陳情書中指出台瑞公司規定：一星期日及例假日，公司要求全體員工一律加班，工讀生未到廠加班者，扣除休假日的獎金。二除了公司指定的全體員工加班外，其他的加班不在此限。三夜間加班，除工讀生及公司特准人員外，每月加班總數的比例規定為：不到百分之八十，扣假日獎金一天；不及百分之七十，扣二天；百分之六十九以下扣全部假日獎金；無假日獎金可扣，扣全勤獎；無全勤獎可扣，扣半薪。

台瑞公司之壓榨本省工人，簡直有如當年日本糖廠壓榨台灣農民一般了。因此，我們要警告台瑞公司的日本負責人，莫把今天台灣最高統治機構的總統府當作當年的總督府；也呼籲處理這項陳情案的台中縣政府，應徹底調查實情，秉公依法處理，不可一紙公文了事或曲法左袒日商而損害台灣勞工權益。

錢那裏去了？

■路芝適

國際景氣不好，生意難做，公營事業個個叫苦連天，不過我這裏只想談一談公僕們所辦的業績，看看我們的荷包又失掉多少錢。

(一)台灣鋁業公司

去年十月四日自立晚報報導，台鋁自七十年七月至七十一年六月，虧損達十九億一千萬元。歷年虧損累計為二十七億。今年一月六日，中央日報報導，台鋁自去年十一月止，累積虧損已達三十二億九千九百餘萬元。又說「目前台鋁公司正以每月近二億元的速度持續虧損」。

(二)台灣金屬公司

據去年十二月七日的民族晚報和今年二月一日的聯合報報導，台金公司於六十七年擴建鍊銅廠，建廠資金從十五億餘萬增至三十五億五千餘萬元，完成後，七十年度虧損四億八千萬元（可以博人一笑，好像是為虧損而建的廠）。到七十一年三月止，台金負債總額已達一一八億五千六百萬元。

七十二一年一月十二日，聯合報報導，台金「每天要付出三百萬元的利息」。三月三十一日，監院審查通過彈劾案中便曾指出，「台金公司出售

反射爐渣給寶貴園公司，未依合約規定執行，置公司權益於不顧，損失八七〇萬元」，「合約的變更也未依照有關法規辦理，置法令於度外……有圖利他人之嫌」。

(三)唐榮公司

行政院經建會委員會，七十二二年二月二日審議唐榮公司財務狀況指出：唐榮公司負債總額高達二百一十億五千二百五十二萬元。佔總資產的七八％。

唐榮新建不銹鋼廠工程費自備款七十六億元，無法籌出，因債信不佳，各行庫不敢貸予。同時原財務計劃可盈餘二十五億四千萬元，目前估計，五年內將虧損九億八千餘萬元。「又，其營建業部份，承攬國內工程，常轉包與違約。國外工程由該公司自行決定辦理，由於與國外當地銀行訂立鉅款透支契約供為週轉金，收受工程款並未匯回國內，其收支亦未列帳管理。」

(四)中華工程公司：一月二十九日聯合報報導，中華工程公司開發工業區土地，累計積壓資金一百五十多億元，每月必須支付利息一億二千萬元。財務搖搖幌幌的嚇人。

(五)亞信債務：去年八月，亞信發生擠兌，央行與台銀，十萬火急的貸款給他，至十月二十七日聯合報報導，亞信尚欠央行十九億五千萬，欠台銀二十億。

「深耕」 又被查禁了！

■老 朽

深耕雜誌第廿八期，於二月廿四日下午在裝訂廠遭警總查扣，理由是：「三十年來重大政治案件」等文，其部分內容嚴重淆亂視聽，足以影響民心士氣。消息傳開，大家對這份同為民主奮鬥的黨外刊物寄以莫大的關切，對「大家的警總」却以不能折服人的理由來查扣「深耕」，我們是有意見。

何謂「淆亂視聽」？據「警備通訊」一篇署名王勝生的文章「泛論『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所下的定義，即在破壞社會價

值體系，或傳播不實之消息，造謠惑眾者也。所謂破壞社會價值體系，如價值顛倒之問題，最主要的，莫如善惡的顛倒，……又如真假的顛倒。

但我們細觀「三十年來重大政治案件」一文，只是客觀的擺出事實，把某年某月某日發生的各種政治案件，作一有系統的臚列，並無任何主觀意識的是非評論。它所紀錄的，自一九四九年四月作家楊逵因發表「和平宣言」被判刑十二年一案開始，到一九八〇年二月廿八日林義雄的母親、女兒遇害為止，總共約五十餘件。全文純屬歷史資料的整理介紹，何來「淆亂視聽」有之？

所以，警總以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第三條第六款「淆亂視聽，足以影響民心士氣或危害社會治安」，來查扣「深耕」，於情於理於法均有商榷的餘地。本文前面所舉證的事實，無非想

(六)華同公司：七十一年七月，華同賠付美商通用公司四十億，至今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國時報報導，華同尚欠八家美商銀行九億元。因貸款到期，無錢償還，向央行緊急告貸。是則華同的虧損將近五十億元。

其他：

(七)中船公司：據去年十月二十日聯合報社論透露，到年底，中船的虧損將達一百億元。

(八)大德昌化工公司：七十一年十月二十日，經濟日報報導，大德昌公司虧累達二十六億元。

(九)中鋼公司：七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經濟日報報導，中鋼公司於十一月虧損三億八千萬，七至十一月共虧七億六千萬。

× × ×

以上所列的所謂虧損或債務額，未必就會完全是淨損，因為萬一景氣恢復，或經營得法，不無完全賺回來的可能，只是在某一時點上說是虧損或是債務額而已。

現在且將上列虧損或負債數字，加起來看一看：

台鋁	三二億九九〇〇萬元
台金	一一八億五六〇〇萬元
唐榮	二一五億五二五〇萬元
亞信	三九億五〇〇〇萬元
華同	五〇億〇〇〇〇萬元

建議警總在執行出版物管制辦法時，應態度公正而法理明確，不能含糊其詞，語焉不詳，動輒以「淆亂視聽」來查扣人民的財產（出版物）。擺出違法的事實，講出查扣的道理，才能贏取民心。任何一本刊物總不致於從頭到尾都淆亂視聽的，有違法部分，可以經過溝通、協調、研議，加以修正，使其順利出刊，以確保言論自由免於被大打折扣。

我們堅信，警總查扣「深耕」，並不是「深耕」一家雜誌的問題；警總在執行出版管制辦法的行徑，還關係整個輿論界的言論自由。寄語警總文化工作單位，今後在處理攸關人民的言論自由的事務時，不能老是處處發生疑問，竭力進行查禁和扣押，而應力求客觀，以理服人，才足以樹立「警總是大家的警總」的新形象！

中船	—〇〇億〇〇〇〇萬元
中鋼	七億六〇〇〇萬元
合計：	五六四億一七五〇萬元
×	×
×	×

假如看官有興趣再進一步試算，亦即用一千八百萬人去分擔的話，您猜，每個人要負擔多少錢？現代人計算數字很快，只要用電算機一撥就會出來，那就是：每人三千三百四十三元餘。

× × ×

二月十六日的自立晚報登出一則荷蘭政府宣佈的消息，據荷蘭經濟部發言人說：關於中華民國向荷蘭R S V造船廠訂購二艘潛艇一事，荷蘭政府並沒參與這項交易，所以由荷蘭政府撥列財源支援R S V造船廠並不涵蓋這項造潛艇計劃，荷蘭政府說，中華民國如果要得到這二艘潛艇，必須靠自己的努力，因為中華民國給R S V的訂金（按聯合報說一億美元）已經被轉投資於對美國外銷挖煤機的計劃上。

荷蘭政府說要我們自己努力，如何努力？是要我們再送上更多的訂金？本地某報還揚揚得意地說我們是R S V的第一順位債權人，其實從另一個角度看，應該是R S V的第一號冤大頭！很顯然的，R S V早已搖搖欲墜，我們的執事諸公難道不知？看來這一筆交易不但做不成，而且少不得又要花掉不少民脂民膏了！

傳說一個母親在懷胎時，因補殺一隻穿山甲而生下了一個像穿山甲的女嬰……

「穿山甲人」

為您報導了……

馬來西亞身罹絕症的華裔女子張四妹的傳奇故事，附有圖片八頁。

四季出版公司 郵撥：105626
電話：392-9134 定價：新台幣100元

● 紀念青年節 ●



給青年朋友的

一封 信

青
青

各位青年朋友：

紀念「三二九之役」革命先烈的青年節又到了，我今天要和一般青年朋友聊聊天，至於那些老年人（這自然是指那些精神和心理上衰老的人）只好請他們把這封信放開，不要去白費他們的眼力讀一封跟他們沒有關係的信。

我假定你大概有了十八歲或廿四歲左右的年紀；也許你正在大學唸書，或者剛畢業不久；也許你正在工廠做工，或者在公司上班。

我想你的頭腦很清楚，已經擺脫了人家盡力

要使你相信的種種迷信，你不願意隨俗浮沈，也不肯接受流行的思想。而且更進一層，我想你不是一個追求時尚，言不及義的青年，那種人是墮落社會中的不良產物，他們成天東鑽西跑，到處找錢，談話內容永遠離不開飲食男女。在這樣的年紀，他們也已經只知道拼命花費以圖自己享樂了！我假定你和這般人完全相反，你是有良心的，因為這個緣故我才來和你談話。

我知道一個當頭的問題已經放在你的面前了。你很多次問過你自己道：「我要做一個什麼樣

的人呢？」事實上，一個人在年輕的時節，他就知道他花費好幾年工夫學習了一種職業，研究了一種學問（要注意這種學習和研究的費用都是社會供給他的）並不是想用它去做榨取的工具謀個人的私利；如果他不曾想到將來要應用他的智慧、他的才能、他的學識去幫忙解救那些陷在貧困和愚昧中的人，那麼他就是完完全全墮落了，變壞了。

你是一個有理想的人，可不是嗎？好，讓我們來看看，你要怎樣做，才可以使你的理想變為現實。

× × ×

我不知道你生在什麼樣的人家，你的環境怎樣。也許你的命運好，有機會接受大專教育，你就要去做醫生、做律師、做文學家、或者經商做生意了。你的前程是很遠大的，你剛剛走進真實生活裏面去的時候，就已經有了豐富的知識和專業的技能。也許你只是一個普通職工，你的科技知識僅僅限於在普通高中學得的那一點兒，可是你却有著機會去直接觀察現在的工人過著怎樣疲勞困苦的生活。

現在就假定你是前一種人，我先和你談談。

假定你要去做一個醫生。

明天你就要在你服務的醫院，碰著一個去看病的婦人。她面色枯黃，染患了肝病，她的丈夫睜著大大的眼睛在一旁憂心如焚的望著你。那個丈夫辛苦了一輩子，無論是怎樣繁重的工作，每天總是勞動十二、三個鐘頭，可是現在他失業已經三個月了。在他的那種職業裏，失業照例是每年都有的，本不算一回稀罕的事；不過他從前失業的時候，妻子還可以出去做做短工——也許就是去洗你的襯衫，每天賺個百來塊錢；但是現在她已經病了兩個月了，這家庭於是更加窮困悲愁了。

醫生先生，你怎樣給那個病人開藥方呢？你一看就知道她的病源是營養不足、勞累過度、缺乏新鮮空氣。你叫她每天吃點好飲食嗎？你叫她去做一點美姿體操嗎？你叫她換一間乾燥的、空間寬敞的房子嗎？這真是莫大的諷刺！要是她能夠這樣做，她就不用等著你來指教，她自己已經做了！

你對這樣的病人說些什麼話呢？勸他們改良

飲食，轉地療養，少勞苦一點嗎？這些話，你當然想說，但是你却不敢說出口，你只得忍住心痛，滿口咒詛地走出來。

隔天，你又碰到一個衣著入時，開著轎車來看病的婦人。這個女人一生專門講究打扮、交際、跳舞、或者和一個愚笨的丈夫口角，時常通宵不眠，現在弄得憔悴不堪。你的同事勸她：生活不要太放蕩了，飲食也該吃點清淡的，多在新鮮空氣裏散步，脾氣也不要太暴躁；她既然不做一點生產的勞動，也應該多少做點輕巧容易的室內體操！

前一個女人病死了，因為她一輩子為養家操勞，從沒有好好休息過；後一個女人憔悴了，因為她一輩子瑣碎不堪，從不知忙個什麼勁兒。

如果你是一個生性柔弱的人，對於什麼事情都可以忍耐下去，便是看見那些最令人生氣的事情也不過是輕輕歎一口氣，或者喝一杯酒來安慰自己，那麼時間過久了，你就會漸漸覺得像上面那種不平的生活對照並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了，你的獸性又會鼓舞你，使你只存著一個念頭，就是你自己也跑到那般享樂的人裏面去，免得以後再和「沒出息」的窮人為伍。然而如果你還是一個「人」，如果你的靈性還沒有被獸性完全毀滅，那麼你會有一天回到家裏對自己說：「不，這是不公道的，我們不應該讓它這樣延續下去！」

那時候你就會懂得怎麼辦了，你就願意研究它了。

到了那時候，一方面你覺得已經盡了那應盡的義務，他方面你的感情和行為又真是完全一致，那麼你一定會發現你自己有那麼多的能力，是你以前夢想不到會有的。到了後來會有一天（不管你的師長們怎樣不高興，那一天終究會來到的），我說，你本應該去盡力促成的那個改革在實行了。

到了那時候就讓你去享受科技生產的快樂吧！這種快樂將成為萬人共有的了。

× × ×

假使你學完了法律，預備去做個法官或律師，那麼你對於你將來的活動也許會有不少的幻想——你看，我還假定你是一個好人，一個懂得利他主義的人，你也許會想：「還是把自己的一生用來反抗一切的不正不義，繼續不斷地和它們勇

猛地奮鬥！永久不停地努力去求得法律的勝利！法律，那是至上的正義之表現！還有什麼職業能夠是比這更美好的嗎？」於是你滿懷著自信心走進真實生活裏面去從事你所選定的這個職業。

現在有個工廠的老板跑來要求法庭判決他的工人償還損失，因為工人們接連好幾天鬧情緒不肯上班。根據法律的立場看來，這件事非常明白，用不著一點躊躇：那些工人既然隨便不上班，使工廠憑白減少產量，他們就應該賠償老板的利潤損失。但是，我們如果把事實詳細調查起來，我們就會明白：那個老板把他的利潤天天耗費在飲酒作樂的事情上面，而那些工人却是從早到晚勞動不息，老板自己對於改善工人勞動條件的事，一點也沒有做。但是法律是絲毫不能通融的，法律永遠保護財產，依了法律，總是老板有理。

但是你的良心，你的公道情感，還沒有全被法律的條款所矇蔽、所摧殘；你將怎麼辦呢？你究竟站在那一方面呢？

再舉一個例。有一個男子，幼年時代教養太壞，又受著歧視，一直到了長大成人從沒有聽見過一句同情的話。後來爲了搶一百塊錢，就殺了一個路人，那時候你會去根據法律，要求嚴辦他嗎？其實你很清楚，與其說這人是個罪人，不如說他是個病人，是個瘋子。無論如何，他的犯罪是我們全社會的罪惡養成的，並不是他一個人的過錯。你明白了這道理以後，你還去要求處他死刑嗎？或者更殘酷點去要求把他關在牢裏二十年嗎？

不不不！一千個不！

你或者抹煞你的良心去做個壞蛋，不然，你一定會摒棄流行的觀念，努力去打破這一切經濟上、社會上、政治上的不義了。

× × ×

還有你，中小學老師，我要向你說什麼話呢？自然那些把教書當做一種討厭的職業的人，我是不願和他們談話的；我要對他談話的人，是那個在一群天真活潑的兒童和少年中間，天天在他們快樂的面貌、歡欣的嬉笑裏過生活，自己覺得饒有興趣的人；是那個盡力想把他自己幼年時代所懷抱的人道的思想，啓發培植在這群兒童和少年的小小頭腦中的人。

我時常看見你很愁悶，而且我也知道你爲什

麼不快活。你最愛的那個學生，他的數學成績並不很好，這是的確的，但是他的心腸確是不壞，他今天背誦革命先烈的故事的時候，是多麼地激昂慷慨！他的兩眼發著光，他好像要把世界上所有一切專制魔王立刻完全刺死；他非常激動地朗誦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熱情的遺訓：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

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但是他一回到家裏，他的父母伯叔因為他對於訓導處的老師略有失禮，就重重地責罵他一頓，他們教他「小心謹慎，尊敬師長，恭順服從」，整整教訓了一個鐘頭，等他把 國父的遺訓拋在旁邊，去改讀那「生活與倫理」才罷了。

昨天你還聽見說你的那些最好的學生如今全都變壞了，某人一心一意只想做官，某人與老板勾結，侵吞了工人的微小可憐的血汗工錢。而你呢？你從前對於這些青年抱了那麼多的希望，現在你才想到現實生活與你的理想中間是有著一個何等可悲的衝突了。你在納悶了。

你現在還在納悶呢！但是我敢斷言不到兩年，經過許許多多次失望以後，你就會把你所愛讀的好書拋開了。到後來你會在心裏說：「革命先烈當然都是很好的人，但是他們終不免有點呆氣」。

或者，你並不是一個這樣的人，你會使你少年時期的夢想成爲壯年時期的堅強的信仰。你的理想是要實現那普遍的，人道的教育，使學校內外的人都能得到它的益處。但是只要你睜開眼睛一看，就知道在現實社會結構下面這種教育是不可能的，你自然會去批判這個金錢崇拜的社會的基礎了，你就會去告訴那些年齡比你來得輕而不肯讀書思考的人：知識是一件多麼可愛的東西！你會去告訴他們，人類應該怎樣，而且能夠怎樣。

× × ×

還有你們，青年的藝術家、雕刻家、畫家、詩人、或音樂家！你們不看見那曾經觸動過你們先輩的靈感的「聖火」，到現在，全都消滅了嗎？現在的藝術流於膚淺庸俗，你們難道會不看見嗎？

改造社會的理想在現代藝術裏早已消失，現代藝術因爲沒有別的更高的理想，便自以爲在寫

實主義裏面找到了一個；這就是呆呆板板照像似地用顏色去繪一粒草上的露珠，描一隻女人大腿的曲線，或是仔仔細細地用散文和詩歌去描寫一條陰溝裏的臭泥，一個上等妓女的臥房！

你要說了：「倘使果真是這樣，又該怎麼辦呢？」

我的回答是：如果你以為你自己所有的聖火，只是微弱得像一支將滅的燭光，那麼，你很可能照你以前那樣繼續地做下去；你的藝術不久就會成爲一種職業，去替大公司裝飾門面，替不入流的電影、電視去作劇本，替無聊的娛樂雜誌去寫小說——現在的藝術家，大半已經很快地向著這方面墮落下去了！

但是如果你的心的的確確與人類全體的心是諧和一致地跳動著，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詩人，你有一對詩人的眼睛去注意人生，那麼，你親眼看見那苦海，它的波濤一天天在你四週洶湧；你親眼看見那些掙扎度日的小市民，你親眼看見那些一具具從礦坑裏挖出來的死屍。那時候，你再也不能袖手旁觀，靜守中立了，你一定會來加入被壓迫者的隊伍。因爲你很知道美、崇高、和生命，都是永遠讚美那些爲光明、爲人道、爲正義而奮鬥的人的！

× × ×

夠了！你不要我再說下去了！

你一定要說了：「既然是這樣，那又該怎麼辦呢？」

好吧，我來回答你：有一件最偉大、最令人奮發興起的工作等著你來做。

這裏有兩條路聽你選擇：或者漸漸地抹煞你的良心，終有一天你就會這樣一說了事：「只要我能夠享盡一切快樂，只要人間仍然這麼擾擾攘攘，那麼，即使人類全體滅亡，我也不管！」不然你就加入人道主義者的隊伍裏，和他們一起努力去把社會根本改造過來。

當然，這是一個繼續不斷的苦鬥歷程。有時要去補足那些因爲壓力、疲倦、墮落而離隊同志的缺額，有時要去把因爲大批監禁而突然中斷的研究重新開始——這是怎樣一個前仆後繼，困苦艱難的事業啊！他們的刊物是由那些節衣縮食，犧牲睡眠，而向現實社會搶得些少知識的人所經營的；是靠有心人盡力節省下來的五百元，一千

元來維持的；而且他們一面這樣做，一面時時刻刻地擔心著，害怕當局會知道「他的人民，他的靠山，是一個人道主義的社會改革者。」那麼他們立刻就會被開除，立刻會跟著他們的妻子兒女全都陷在最糟糕，最可怕的境遇裏面了！

有時候，當然也會有一個青年，夢想著狂熱的戰鬥，到改革者的隊伍裏來，爲的是找尋一些興高采烈，趣味濃厚的事情，但是他一看見那條道路十分遼遠，改革事業非常困苦，而且在這條路上固然有他所希望得到的光榮，但同時也是荊棘叢生，於是他就立刻離開隊伍了。

你會問：「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讓我來告訴你。

凡是你們有知識、有才能、有本領、能勤勉的人，如果你們還有良心，那麼就請你們都來（你們自己和你們的伴侶），都來把你們的知識才能，替那些最需要你們的人做事。不過，如果你們真的到民衆中間來了，你們就要牢記住：你們並不是來做首領，而是來做一起奮鬥的同伴；並不是來管轄支配人，而是到一個新環境裏來給你們找力量，這種新生活不斷地向前邁進，以求達到新社會的實現。

到了那時候，而且只有到了那時候，你們才會過著一個完全的，高尚的，合理的生活。你們會看見，你們在這方面所用的努力會有了很多的結果；而且你們會覺得，你們的行爲和你們的良心完全一致，毫無矛盾，這個感覺會給你們許許多多的力量，是你們以前連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請你們不要說：「我們人數太少，能力太薄弱，要想達到我們的這個偉大的目的，是不可能的。」

我們來數一數吧，看看在目前這個社會結構下面，像我們這樣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人究竟有多少——工人、青年、小市民、……我們的數目是極多的。每天下班的時候，大街小巷都被我們的人擠得滿滿的了。

青年朋友，離開那些用花言巧語，似是而非的言論誘惑你的偽君子吧！我們的力量就像大海大洋一般，一切東西全可以被我們沉沒，一切阻礙都能夠被我們衝破。只要我們大家有決心，我們總有一天可以把正義建立起來，地上的一切爲善、欺瞞與壓迫都會被我們的力量掃除殆盡！

貪殘肆虐是禍亂的根源

——為財政部言行不相顧，浪費國帑，苛擾人民，使政府信用大受損傷，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立法委員 胡秋原

現任財政部長就職之初，嘗謂「財政只是手段。」或因此言大受譏評，乃於國民大會報告「當前財政思潮與財政政策」（見「憲政評論」第十四卷第一期）。其所謂「當前財政思潮」者，乃介紹美國總統雷根之經濟學。姑無論雷根經濟學能否代表「當前財政思潮」，但雷根財政政策以減稅刺激投資，而此適與財政部之加稅政策相反。就其論「我國財政政策」部份而言，謂：「我國政府的支出約有四分之三來自租稅，賦稅收入佔國民所得百分比已不屬偏低，因此如何適度地節制公共支出，尤其是公營事業的投資，……是我國資源分配上一個深值探討的問題。」又云：「租稅的目標是要創造一個更優良的租稅環境，在兼顧租稅公平的原則下，加強投資誘因，創造更多的財富」；「目前我國在稅制上固然尚有許多問題值得改進，但是稅政的改進更顯得迫切，那也就是要有一個健全而有效的稅務組織與人員來確實達成稅務制度上所謂『不苛不擾』，『不逃不漏』的目標……」。凡此諸點，皆甚正確。然財政部長就職以來，怪招疊出，皆與其以上所言相反。其先向小型餐飲業者及一般攤販開刀，早已怨聲載道。這自然遠不足以平衡我們龐大的預算赤字。現說最近的幾件舉措。

據近日報紙報導，舊曆年關前夕，台北市稅捐處國稅局，聯手起來加派稅務員到五十五年家貨商店站崗，官方說是「輔導」開立統一發票，輿論說是「監視」開立統一發票。站崗「監視」的結果，據報導開立統一發票的張數較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四百四十七，約四倍半左右，增加金額為百分之六十八點八。財政部長又表示，站崗只是治標辦法，「治本之道，是建立在重罰的基礎之上。」台北市稅捐處長隨即表示「目前稅法對逃稅者僅能處以罰鍰」，實為不足，應視為重刑犯，改判徒刑，重者五年，一年再犯者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可判七年徒刑云。案監稅之制，始於明代。而以刑法手段處置「逃稅」亦始於明萬曆中。「明史」云：孝宗初御史陳瑤言，崇文門監稅官以掊克為能，非國體，乃罷（「明史」卷八十一，商稅）。其後神宗時，國用大匱，「通都大邑，皆有稅監」。「貪殘肆虐，民心憤怨，尋致禍亂」，「遂底滅亡」云（「明史」卷三百五，宦官傳陳增等傳）。自由中國之財政部長奈何竟放亡明惡事？此視民為盜賊也。然政府視民如草芥，民視政府為何人，孟子早言之矣。又今年站崗結果，使開統一發票之張數較去年同時增加四倍半，固不一定證明監視可使收入增加百分之六十，更不得以年關家貨之貿易而證明平時每日皆然。如因此而普遍站崗，試問全台需多少稅

壹、稅務站崗及 以刑法懲罰逃稅問題

務站崗人乎？刑法者，在我國過去，視如用兵。現代各國，憲、民、刑、商等六法，各有範圍。現行我國刑法三十五章，並無漏稅之目。違反稅法，輕則罰鍰，重則停業，唯有涉及刑法詐欺與偽造文書之罪，始能給以刑事處分。世界之法律既有一定之原理；而國家立法，亦有一定之機關與程序。今財政部長與台北稅捐處一朝權在手，便欲以重刑達其征稅目的，此固係絕無現代公民之法律常識，然以此類之人主持稅務，即財政部長所謂「健全而有效率的稅務組織與人員」乎？然逃稅漏稅之事，倘無稅吏之合作，恐亦非易事也。

貳、每年納稅所得逾三十萬 始有資格開立支票戶頭問題

據二月二十一日「中央日報」訊，「財政部已接受中央銀行業務局的建議，將考慮規定每年納稅所得新台幣三十萬元以上者，才有資格開立支票存款戶。財政部即將展開對支票存款戶處理辦法的修正工作，除了將授權銀行自行審核支票開戶資格外，並計畫全面取消銀行對支票存款戶每次發放空白支票數量限制。」而理由是「財政部為健全支票管理，減少空頭的支票發生了云。然空頭支票與納稅之多寡有何必然關係？此除僅足與納稅不足三十萬者（即大多數之國民）以無限之麻煩外，可防止納稅所得三十萬以上者不開空頭支票乎？」

參、亞洲信託救濟問題

去年八月亞洲信託被擠提，財政部長一下令就是四十多億貸款救濟，這件事使台澎金馬地區之工商界和國民都深感詫異！財政當局對於公共事業之支出尚且主張節制，「亞信」既非生產事業，又非銀行事業，為何財政部如此法外的慷慨支援？據說亞信資產並不足以抵償貸款，而其擠提之事也有故意製造之說。種種傳言，茲姑不論。本人欲請財政當局立即向本院及社會說明者，現在亞信還債之情形如何？據聞火車站前的「亞洲廣場」不知何日可成，現在數十萬台北市民每

日過火車站前，目觀「亞洲廣場」一片爛泥而又阻礙交通時，對此政府慷慨救助之廣場皆怒目而視矣。

肆、加值型營業稅之實施問題

據本會期 貴院對本院同仁所發書面報告第二五頁：「為積極籌劃實施加值型營業稅，正調訓各稅捐稽征機關主管人員，及邀請國內外專家檢討，期能集思廣益。並將於本年四月研擬加值型營業修正草案，俾期先完成立法，俟適當時機正式實施。」此加值型營業稅為今後財政部兩大方案之一。此案草案尚未送至本院，本人自不能詳細批評。不過有數點可得而言者。

(一)此原是十六年前曾由政府聘請專家研究過的舊案，因本院同仁多表反對而止，現在頻頻由財政部宣傳，現在是實施此一優良稅制之最佳時機。在舊曆年前財政部長邀請新聞界作簡報時，新聞界人士詢問，「這一加值型營業稅的構想，與十六年前有何不同？十六年來台灣地區的稅收狀況，有些什麼具體改革，使得財政部認為現在適於推行加值型營業稅？」財政部長竟然啞啞不能成言，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這次簡報歷時不到半小時結束，足見財政當局對此稅法並未深加研究。

(二)又財政部一再宣揚「加值型營業稅」是進步的稅法，全世界有二、三十個國家實行。財政部能將此二、三十個家之名舉出，證明其成效確皆足使吾人效法乎？據聞中南美甚多國家實施此種稅法，亞洲首先實行者則為南韓。中南美諸國固未必值得倣效，而年來一奇怪之事即有人有一種南韓崇拜熱，動輒南韓如何如何。尤以南韓在貿易上已成爲吾人之勁敵，故當師法其稅制。然南韓在貿易上成爲吾人之勁敵，究竟由於其他種種因素乎，抑僅賴此「優良之稅法」乎？此不可不察。此如果係優良稅法，則不久以前南韓大捕財稅界之貪污又如何發生乎？財政部又稱，推行此一稅法，乃爲創造良好租稅環境，以促進經濟復甦。同時又稱，實施此稅後，難免使工商界受到衝擊而使物價波動，唯政府將採控制物價措施以資應付云云。此非自相矛盾至極之言乎？以今

日經濟之沈滯，外銷之萎縮，再加上物價波動，不僅將更難與南韓競爭，且將造成復興基地之政治不安矣。

（三）目前台灣工商界對於加值型營業稅惶惶不安，其原因大可注意。目前吾人稅制，營業稅係對營業毛額課稅，印花稅隨營業發票課稅，貨物稅包括若干工業原料及民生必需品在內，故實為重複課稅，亦即惡稅。所謂加值型營業稅意在消除重複課稅，而對生產及加工之每一流程中所增價值課稅。比較目前稅法為合理矣，而工商界惶惑者，即不知財政當局之目的，究係減稅以減低成本以利外銷之競爭乎？抑係以優良稅法為名，增加稅率，乃至附加「建設捐」之類，使工商業者之稅負較重複課稅為尤重乎？此非工商界之神經過敏，而係財政當局之行動使然，而財政當局自稱將使物價波動更有以使然也。

（四）以上所言，非謂本人認為加值型營業稅絕不可行也。本人與工商事業無緣，實行此法後，對台灣現行正當工商事業之稅負較之舊法將為如何並未研究。但以常識可斷言一事，此法之先決條件，必須各公司行號皆有信實之簿記，皆有信實之統一發票而後始能對於加值、扣抵、退稅能有確實之估計；而此亦須今日台灣五十萬家之商號皆有其會計人員。況統一發票制度據云亦問題甚多，尚待健全。若非然者，將有更多之逃稅漏稅，政府之收入將更不如前，而台北稅捐處所欲處五年七年徒刑者恐將使監獄有人滿之患，而此時財政部必須預造監獄而後可！財政部或可曰，吾人方「邀請國內外專家檢討」。然上一句說，「正調訓各稅捐機關人員」，又下句云，「四月研究……修正草案，先完成立法。」今日若干行政人員之辦法是：先確定一事「勢在必行」，然後經由「專家」宣傳，經由命令，「先完成立法」，然後「正式實施」！貴院關於此一稅法之施政報告，意在斯乎，否乎？

伍、最後尚欲為政府告者

（一）一般國民因志切反共，對政府之愛護支持，實已盡最大之能事，此由今日台灣人民租稅負擔之重可以證明。老實說現在台灣人民的租稅負

擔不僅很重，而且是既煩苛又重複且不公平的。現在台灣的稅制，從中央、省市、縣市三級租稅加起來，就有二十二種之多，教育捐、大陸救濟捐、電話捐等各種附加捐還不在內。其中主要的幾種稅，如營業稅、貨物稅、營利事業所得稅，都是重複課稅，而關稅全由消費者負擔，綜合所得稅大部份由薪資所得的勞動者負擔。按照所得稅的級距來看各主要稅負率的分配情形，關稅是累退的，綜合所得稅是累退的，貨物稅是累退的，娛樂稅是累退的，所謂「累退」是指所得愈低稅負愈重，所得愈高稅負愈輕。例如綜合所得稅第一級（舊級四萬五千）稅負是百分之一點二五，一百萬以上的級稅負是百分之零點五四；例如貨物稅第一級稅負是百分之三點三六，一百萬以上的級稅負是百分之一點六三；例如娛樂稅第一級稅負是百分之零點零九，一百萬以上的級稅負是百分之零點零四；屠宰稅是百分之零點三十和零點一四。所有的主要稅負，低所得的貧人負擔多，愈有錢的人負擔愈小。整個租稅負擔占國民所得百分之二十一左右，也就是說每一個國民每年收入一百元，其中有二十一元被財政部收去了，這個總負擔是不輕的，比南韓、日本人民的稅負都高，只比美國低四五個百分點。然美國國民所得是一萬二千美元，我們國民所得只有二千多美元。此是財政當局亦明知的。

（二）今日財政上積弊甚深，如要不逃不漏，如上所說，必須一切公司行號皆有真實簿記和發票，而此亦必須改革稅制，改正稅率，而也必須改進稅務，此即確立整個政府之信用，以及財稅人員之信用。政府之起用現任財政當局或信其有術能彌補赤字。然觀其苛及攤販，則聚斂之術，其細已甚。至於稅員站崗，及準備之重刑征稅，則財政當局以及三十多年來整個政府之信用，已因此一舉而受重傷。縱有良策美法，亦必難推行。結果亦唯有擴大及加深苛擾之一途。

（三）政府勿謂尚未見明末士民公憤，至於與稅監相鬥也。怨毒恐怕難免發生於今年末選舉的時期。與其焦頭爛額於斯時，何如曲突徙薪於現在？

——轉載自72年三月一日
第七一會期立法院公報



辛苦一整年，獎金六百元?!

——臺大正龍工廠示威事件

□陳莫愁

二月九日，距離春節僅有三天，正大尼龍工業公司新店廠的八百多位勞工，却個個憂心忡忡，情緒憤怒！這天中午，他們匯集在台北市南京東路一段該公司總公司前，示威抗議……

「我們抗議老闆對待工人太苛刻！太不合理！我在正大尼龍公司已經服務十二年了，底薪才七千元，我有太太、四個小孩，每天都在靠著加班維持生活，從早到晚為公司賣命，希望老闆賺錢，看會不會年終獎金多一點，好好過個年，誰知道竟然只有六百元……，我們付出了極大的勞力和精神，但是公司却這樣刻薄的對待我們。」

一位憂心沮喪的工人憤怒的表示，他說，六百元給回中南部的員工當車資都不夠，乾脆年也不要過了。

由於集聚抗議的工人多達三、四百人，加上勞資雙方的僵持，公司負責人振振有詞的表示：「已發了六百元的年終獎金，你們還要怎樣？」糾紛越惹越大，終致市警中山分局派出大批警力，前往維持秩序並將聚集工人疏散，才結束抗議事件。

隔天報上出現短短的一則新聞，稱其為「春節小插曲」。春節很快就過去了，而與豐田汽車

在台灣設廠等新聞，在報上所佔的篇幅大小相比，這段「小插曲」確實引不起人們的關注。然而，在這事件的背後，却潛藏著勞工制度的諸多問題，及資本家缺乏社會責任意識的惡劣心態。

正大尼龍公司新店廠的勞資糾紛，事實上導源於一個極單純的理由。根據該公司產業工會表示，廠方曾於元月中旬公佈因公司業務虧損，農曆春節年終獎金總額為五十萬元，由八百多名員工均分，每人約為六百元。由於絕大部份員工家計負擔頗重，平日薪資微薄，年關開支全倚賴年終獎金的發放，廠方做此宣佈，頓使勞工心慌意亂。

而根據勞工之判斷，公司業務虧損全係推諉之詞。他們說，去年一整年公司訂單不斷，機器從未停過，而所有產品均運銷出去，根本沒有庫存滯銷，何來虧損之理？因此他們透過產業工會，向廠方交涉發給一個月的年終獎金。但是自始至終，廠方不是避不見面，便是置之不理，終於導致工人情緒不滿和抗議。

據筆者側面理解，自元月中旬起，工會知悉工人的反應後，先後六、七次與廠方進行交涉，均未獲得廠方同意，而年關一天天逼近，員工焦躁、不安的情緒終於壓抑不住的爆發了。

二月三日，離過年只剩十天。這日上午七時，早A班的員工為向廠方抗議，於簽到後拒絕進入廠方工作，並要求廠方做明確答覆。但是廠方仍以「董事長不在，不能做主」為由，拒絕員工要求。中午十二時，產業工會理監事再度與總廠長鄭炳麟協商，但其態度仍然強硬，無法達成協議。

而至下午五時，管制站大門倒是貼起總廠長的告示：「本廠自二月二日上午七時起被迫停工，在停工期間，為處理必要工作，自二日夜班起，除動力一課、二課值班人員及全廠職員仍然照常上班外，為維護廠區安全，其餘人員非經核准一律不得進出廠區。」在告示旁並另附一紙公告：「凡違反規定，進入廠內者，一律送警究辦。」

這項告示更引起全體員工的不滿與驚慌，他們說，從這裡就能看出資本家的傲慢心態與法西斯！

而廠方所謂「被迫停工」事實上並非「被迫」

，而是直接由副廠長下令指示的。

工人對於廠方這種態度和作法，深表憤怒，公告也不予理會，接著兩日均群集廠內簽到，後即在四周走動，不離工廠，一直待到下班時間方始離去。同時，產業工會並向台灣省總工會、台北縣總工會、台灣省人纖業聯合工會及生產事業黨部等單位陳情，請求協調解決。而廠方深恐工人發生暴動，即於三日向新店警分局報案。於是，新店警方會同警備總部、調查局等情治單位，派員前往疏導…。

之後，二月七日，產業工會召開第五屆第二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報告整個狀況經過，並繼續與資方協調交涉。當時列席單位包括全國總工會、省總工會、台北縣總工會、生產事業黨部第十支黨部、台灣省人纖業聯合工會等，惟仍未獲得任何結論。

而這同時，台北縣社會科亦派員與廠方協調，但資方避不見面，函公文索請廠方復工，亦置之不理。

員工眼看春節就要到了，要求的年終獎金毫無著落，各種協調交涉皆無效果，於是二月九日，他們採取了集體抗議，靜坐示威。

靜坐示威之後，資方稍作讓步，答應每名員工可「借支」二千八百元，做為年節應急之用，但是借支之款，仍需於幾來薪資中扣除。而這項「恩澤」也遲至二月十一日（除夕前夕）才發佈，大半員工早就回家過年了。

而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當員工過完一個陰慘的春節回來上工後，廠方開始調查「二月二日早班值班人員打卡後未到現場工作者意願表，須親自簽名自願或被迫二項，並附註：未填此表及未親自簽名者視為自願。」這項調查使員工心裡再度產生恐懼。而根據員工反應，主管者用十分強硬態度要求員工非填寫意願表不可，資方用意與後果均不得而知。

而員工自二月二日在廠方自稱被迫停工後，至二月十一日之九天工資，亦於支領薪水時被扣除。根據工廠法第五章第二十五條規定「工廠對於工人不得預扣工資為違約金或賠償之用。」及勞工法令中「勞資糾紛期間薪資依法照發」之規定，資方擅自扣除員工九天工資顯然違法，這將可能造成另一事端。——而這些糾紛，目前仍由產業工會報請上級工會及有關單位處理中。

根據正大尼龍公司的員工表示，過去數年，常有類似的糾紛發生。而公司不合理的事亦不僅這樁，譬如公休假日排班，不與工會溝通協調，也不行文公佈，却利用主管施加壓力，強迫員工配合工廠過年停工，連續休假七天，其餘每日均應出勤上班，不顧員工身心健康與負荷……

又如長年不調薪。據工人表示，該公司於招募工人時告示，每半年調薪一次，但是有許多工人自民國六十九年起就再也沒有調過薪資，儘管物價波動那麼多次了。

而正大尼龍公司此次爲了年終獎金而導致的勞資爭議，至少暴露一個問題：工廠法對於年終獎金發放的規定過於含糊。

按工廠法第四十條規定，工廠年度終結算時，如有盈餘，除提股息、公積金外，對於全年工作並無過失的工人，應予獎金或分配盈餘。根據這項條文，對於年終獎金的發放並無硬性規定，而是在「工廠有盈餘」及「工人無過失」情況下才發放。因此有不少廠商鑽法規漏洞，蓄意減發年終獎金，這種情況最常見的是，工廠有盈餘但轉嫁其他關係企業，而向勞工表示工廠虧損或盈餘不多；另一種方式則是資方藉口找出勞工的過失，例如「工作不力」、「不聽指揮」等空洞的失職名詞，而減發其年終獎金。

儘管資方這種手段是惡劣的，却因工廠法中並無明文規定：工廠拒發年終獎金時，會受到何種處分 因此如果廠方堅持不發，勞工法似乎仍是莫他奈何。

然而，我們今天要強調的是，一個資本家的社會責任及其企業良知；正如正大尼龍公司的八百多位勞工所言，他們奉獻全年的勞力與精神，爲公司賣命，在歲末年關要求一個月的慰勞金並不過份。台灣省總工會理事長彭光政，在列席正大尼龍公司產業工會第五屆第二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時亦表示，年終獎金要求一個月，實是合理要求，希望公司多所體諒。他說：「公司董事長應了解，公司內部人事職位雖不同，但其對公司之貢獻絕無二致，因此不容社會對勞工有偏頗觀念，基於職業平等觀念，爭取待遇、福利享受，不應認爲是資方對勞工的施捨。」他更表示，今天我們社會需要的是企業家，而不是資本家。因爲資本家唯利是圖，處處剝削勞工，而企業家除

了追求利潤外，更重要的是社會責任問題。——這值得每一位資方人士深思與檢討。

而不管是正大尼龍公司的勞資糾紛，或任何一項勞工事件，我們都會從中看到勞工問題的癥結，即台灣工會的積弱不振。

工會是唯一能代表勞工與資方爭取權益的機構，工會不振，勞工有什麼力量去爲自己爭取合法權益？又怎能與資方平等溝通協調？

而造成台灣工會無能、衰弱的原因，却是執政黨有意造成的。衆所週知，台灣所有的工會由基層到全國總工會，均有強大的國民黨部力量介入，而且是越上層的工會組織，這種介入力量越穩固龐大。工會之選舉，亦變成其政治鬥爭之地盤或黨員晉升之跳板，幾乎完全與四百多萬勞工毫不相干！這是十分諷刺又令人痛心的事實。

爲了四百多萬勞工的真正自主與權益，第一，我們希望黨部撤出工會；第二，我們希望工會開放選舉，讓勞工自己直接投票選出他們的領導者！只有突破政治上的毒瘤障礙，台灣的工會才能發揮其法律賦予的功能，也方能真正爲勞工謀求權益。而這時，勞工才有真正平等、保障可言。

台灣新文學的第一頁!!

關心台灣政治歷史與文學歷史
的知識份子，不可不讀——

李南衡 編

日據下台灣新文學

- | | |
|------------|-----------|
| 1. 賴和先生全集 | 4. 詩選集 |
| 2. 小說選集(一) | 5. 文獻資料選集 |
| 3. 小說選集(二) | |

出版 / 明潭出版社

訂價 / 國內新台幣1250元

國外水陸美金50元

郵撥帳號 / 555202黃溪南



脫！ 脫！ 脫！

——明星裸照風波

慈林教育基金會典藏 □ 曾心儀

(一)

二月十日，行政院新聞局宣佈對拍攝傷風敗俗照片的影視明星藍毓莉、上官明莉、陳凱倫、洪乃雲予以禁演六個月的處分，並將「封面女郎」雜誌創刊號查扣，處分停刊一年，陳凱倫攝影專輯亦經高雄市新聞處查禁。

這是農曆過年前，各報社會版的一則大新聞。去年裏，由張盈真帶頭開拍攝影專輯後，男女明星競相暴露大拍裸照，終於由綽號「小公雞」的男演員陳凱倫惹禍，被新聞局一刀砍斷這股裸照風潮。

無巧不成書，「封面女郎」雜誌甫創刊即與攝影專輯結伴，同成爲新聞局的刀下鬼。

陳凱倫專輯刊出多幀他個人全身裸體照，以及他與一位不知名女子倆人一絲不掛地「疊」在一起的照片。

「封面女郎」雜誌則刊出藍毓莉、上官明莉、洪乃雲暴露下體的照片。

裸照被查禁的新聞鬧開後，事件關係人包括明星、攝影師、出版商，有的爲自己脫罪，有的還振振有詞地爭辯是「藝術」不是「猥褻」。

聽這些人辯論「藝術」與「猥褻」，根本是浪費精神！

明星攝影專輯與「封面女郎」雜誌兩股歪流的會合，爆發這場新聞事件，根本上是這個社會腐化發展的必然趨勢。

(二)

「封面女郎」雜誌脫胎於中常委余紀忠所辦的「時報周刊」。採用相同的開本，同樣的紙張、編排，它擷取「時報周刊」的精髓，只要明星穿得愈少愈好，盡談色情、暴力，其他在「時報周刊」裏或也出現的知識性文章都免了。

「封面女郎」雜誌創刊於本年一月，是影視明星與出版商給我們這個社會的新春獻禮。創刊號以藍毓莉當封面人物，爲她作專輯。製作群員工名單如下：

「封面女郎」雜誌社長：黃宗弘

專輯製作：老凡

攝影：林進雄

設計：馬永良

剪裁：莊麗蓉

策劃：蕭國煌

他們出了問題的傑作是，叫藍毓莉正對著攝

影鏡頭坐，撩起薄紗裙子，露出私處。由於她的內褲是透明的，加上拍的是彩色照，令讀者一覽無遺。

藍毓莉說，這是「穿梆」照片，製作人刊用前沒有經過她過目。藍毓莉在影視圈裏是有名的「腦裏少一根筋」美人。但是，她又不是白痴，她怎麼會不知道那樣的坐相，撩起裙子，正對著攝影鏡頭會有什麼結果？即使不拍照，在人面前這種坐相也令人難以理解。

「封面女郎」雜誌另外出了問題的照片是，刊出上官明莉在歌廳表演時，短裙飛揚，露出沒有穿內褲的下體；也是正對著攝影鏡頭。

上官明莉對新聞局解釋，那張照片是被人無意間拍的。她並說，她因為趕場換裝，不便穿內褲，但她強調穿了「褲襠」。歌廳的舞台與觀眾席只是一線之隔，上官明莉穿短裙，裏面空空如也，她又跳又轉，會有什麼後果難道她事先真的不能預料？

據新聞界人士說，上官明莉這張照片已流傳了數月之久，黃宗弘辦「封面女郎」雜誌，把它收錄進來。據說，刊用這些照片，黃宗弘最擔心的是，雜誌沒上市就遭查禁，那麼他就賠定了。然而事情的發展是上市後遭禁，配合見報率，他們「只做一票生意」的願望已達成了。原價一本九十元的雜誌，經查禁後索價每本高達一千元。

「封面女郎」雜誌首期裏選出「十大性感女明星」，她們是「脫星」+「攝影專輯明星」=「脫星」，依名次順序是：

- ①陸儀鳳 ②陳麗雲 ③陸小芬 ④吳巧玲
⑤張盈真 ⑥楊惠珊 ⑦程秀瑛 ⑧陸一嬋 ⑨于楓 ⑩劉夢燕

中常委余紀忠辦「時報周刊」利用脫星賺錢，小人物黃宗弘等人也利用脫星賺錢。

中常委余紀忠的「時報周刊」在六十七年假借「促進我國電影事業的發展」選舉「十大影星」，讀者投票時得在明信片上貼「時報周刊」印花。小人物黃宗弘仿倣余紀忠，也來選「十大」。黃宗弘的進步是不要讀者貼印花，他並使影星更上一層樓——只要性感。

不管是上流人物，還是下流人物，他們只想到明星穿得愈少愈好，露出一身肉就是「性感」，就是「人體美」。

不管是正式拍裸照出專輯，還是站在舞台下偷拍，這些人最有興趣的就是女人的肉體，進而而是「女人的三點」。他們非但不以色情為耻，並還有意加以渲染，利用它來生財牟利。他們忘記了，女人的三點原是最神聖的，它創造生命、哺育生命，女人承荷了生之苦難。這些衣冠紳士對性的曲解，對女人的侮辱，實乃羞辱、否定了自己生之尊嚴。

此次裸照事件，只不過暴露了影視圈糜爛的一小部份而已，在這些現象之後，是財勢與色慾交纏不清、墮落、腐化不堪的人間地獄！

(三)

據新聞界人士透露，明星攝影專輯靈感來自日本。日本女星山口百惠被稱為「天使與魔鬼的化身」，她的攝影專輯銷路很好。此地的出版商即予仿效，首先找到張盈真來拍「單身女郎雙人床」。

張盈真專輯銷售率不佳。出版商分析，認為原因出在很多人在書店翻看，滿足了好奇心後並不買，因此從第二本開始均包上玻璃紙，要看的人非買不可。除了胡茵夢專輯每本賣六百五十元，其他都賣四百五十元。

已出的明星專輯有：

張盈真（影星）：單身女郎雙人床

程秀瑛（原在華視後轉電影界）：雛的白白

吳巧玲（華視歌星）：最高機密

劉夢燕（華視歌星，也拍電影）：帶我走

華萱萱（中視）：赤的誘惑

呂建蕙（影星）：第？接觸

陳凱倫（從電視童星變成歌星）：禁忌的迷惑

胡茵夢（影星）：脫軌的美感

另外，還有崔苔菁等人也趕熱潮，進行拍攝專輯的籌劃，由於新聞局動刀了，這些專輯是否出書顯得相當尷尬。

從張盈真開始出專輯起，她們因「脫」而經常見報。吳巧玲並被疑為一部春宮電影的女主角，新聞不斷。劉夢燕專輯裏刊出一張近於全裸的照片，她與出版社老板王達明劍拔弩張嚷著要法庭相見，後來却不了了之，充分達到宣傳促銷的目的。

華萱萱、呂建蕙是山地人。華萱萱在專輯裏刺面，以山地服裝當裝飾。呂建蕙則強調丁字褲。目的還是在脫，在暴露胴體，惡意扭曲山地文化。

胡茵夢穿上她主持金鼎獎頒獎典禮時的那襲禮服，擺出你在典禮上看不到的粗野姿態，露出可憐的瘦腿；她太不知藏拙。胡茵夢常把自己「一本錢」不夠，掛在嘴上，却不能免俗，也在專輯裏脫。

陳凱倫說，拍與女人「疊」在一起的裸照是在表現一個少男到男人的掙扎和長大過程。對於專輯被禁，他說是意料中的事，他並不後悔拍了這些照片，他信任攝影師的感覺。

二月二十日，聯合報影訊版刊出記者黃寤蘭寫胡茵夢。胡茵夢在「亞洲雜誌」的報導中指出，她厭惡藝人私生活被毫不容情的揭露，而社會對藝人的才華却不重視，甚至出之輕蔑的口吻。她寫專欄、出書、和文化界人士來往被譏諷為「以文化美容」。

我們的社會對影藝人員另眼相看，正是如胡茵夢所抱怨的。這是由於幾十年來，影藝圈並沒有培養出真正才藝的氣質，影藝人員娛樂觀眾並不是以才藝取勝，在其漂亮的包裝底下是一堆稻草和垃圾。我們如果把電視節目和電影表面的那層包裝撕掉後，呈現出來的就是一大堆稻草和垃圾，真正有價值、值得欣賞肯定的太少、太少！

電影是枕頭、拳頭、三廳掛帥。

電視是外行領導內行，廣告掛帥。在螢光幕上露臉的女星，只要能靠後台老板支持帶廣告進來，就是大明星。

李翰祥、胡金銓曾在香港接受新聞天地雜誌訪問時說，由於近代史的禁忌太多，由於電影檢查剪刀的權威，我們拍不出好的電影來。李、胡是當今國片數一、數二大導演，他們並沒有拍出他們所熟知的現實世界。大抵而言，他們只是在玩電影，把觀眾引到一個無關痛癢，不會與現實衝突的世界。李翰祥早期拍「江山美人」、「梁山伯與祝英台」、「西施」、「七仙女」娛樂了多少老幼婦孺。後來被「無名信」誣告到情治單位，他遠走香港，在香港拍了一大堆古裝色情片。就在大家嘆息李翰祥的才華被殖民地香港財閥糟踏，就要完蛋時，去年九月廿八日聯合報登出

李翰祥回到大陸拍「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有才華的導演景況可悲至斯，那如過江之鯽的男女明星，他們自覺或是不自覺地備受屈辱，在星海裏浮沉，罄竹難書。

(四)

我們如果把兩件事拿來和裸照事件對照著看，當會有另番感受，並引起我們深思。

第一件事，翻看去年國人在抗議日本竄改侵華史實聲中所出版日軍在戰爭中罪行照片集，其中有受辱的婦女被日軍強迫拍暴露下體的照片，她們的神情極端地痛苦。她們被侮辱，因為國家無法保護她們。

第二件事，中小學裏常有男學生拿小鏡子，當女老師走過時偷窺她的裙底。

敵人侮辱女同胞是有形的，國人侮辱女同胞是無形的。不變的是國家依舊積弱不振，在國際間的處境日益困頓。近百年來中國的歷史，就是中國人民受迫害、被侮辱的歷史。建國步入七十二年，在台灣，究竟人們覺悟了多少？

從小學生偷窺女老師，到成年人明目張膽以拍攝女人三點滿足色慾，顯示出我們的教育徹底失敗！

我們沒有真正的美學教育，我們的社會缺乏藝術氣質，我們的藝術家貧乏得可憐！

我們沒有健康的性教育，「性」被惡意歪曲，「性」變成墮落、腐化、麻痺的工具。

電視深入家庭。三家電視台大部份由官方投資，民間投資的比例極少。其中，台視是台灣省政府投資，中視是中央黨部黨營事業，華視由教育部與軍方合力經營。電視娛樂性節目佔百分之五十到七十，螢光幕上出現的盡是女明星拋眉弄眼，扭腰擺臀，一片奢靡暴露。現在電視已成為通往權力財勢的另一段階梯，色慾問題的嚴重性更勝於電影圈。

影藝圈是一潭污水，跳進去的，甚少人能出污泥而不染。可歎的是，被侮辱的女性亦少有自覺和覺悟。我們不能對影藝圈再寄存任何一點希望。我們不屑他們所佈施的能麻痺人心的「娛樂」。他們若不自覺、自救，誰也救不了他們。這個社會更新、建設的力量絕不在他們以及包圍他們的蟲蛆身上！

1983. 2. 21

評「中國之春」 論民主統一

□王曉波

要民主也要統一

自中國留學生王炳章宣佈成立「中國之春」以來，大多數中外人士目光的焦點都放在大陸的民主運動上。其實目前的中國問題，除了民主外，還有統一的問題。誠然，民主問題在中國一直沒有得到解決，但是，統一問題也是自民國建立以來從未實現過的。

當年，一個獨立思考中國前途的知識份子李麥麥，研究了近代世界各國的統一運動，並在抗戰時期曾經說過：

就目前中國政治情形說，我們固堅決主張中國內部各民族須一律平等同時更堅決要求中國應實行民主政治。但我們所要求的平等必須是整個的，決不是部分的平等。同時我們所要求的民主也必須是統一的民主，決不是分裂的民主。部分的平等運動和分裂的民主運動，發自於內者，為反動，為破壞國家統一，為變相的軍閥割據。發自於外者，為民族陰謀，為民族侵略，為帝國主義宰割中國之另一表現。

這種『中國政治情形』，不幸地，至今並未具有本質上的改革。但却有些海內外的中國人政治團體，他們的政治主張其實是淪入『為帝國主義宰割中國之另一表現』而不自知。

以現有的報導看來，「中國之春」在推動中國民主運動之際，並沒有忽略中國除民主外還有統一的問題，且提出了「民主統一」的主張。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國之春」發言人王炳章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講演中就說到：

我們本著一個向前看的態度，不管以前你持什麼樣的政治觀點，只要你現在擁護民主，贊同用民主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以民主來統一中國，那麼我們就求大同、去小異，在民主的旗幟下，團結起來。

『以民主來統一中國』，也是筆者多年來在台所主張者，故倍覺親切，也倍感興奮，可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人民是公正的裁判

後來，王炳章在答覆問題時又說到：

統一不是國共的專利，是海峽兩岸廣大人民的問題。共產黨提出國共第三次合作的建議；國民黨提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但是我覺得，現在國共三次合作不是很現實的事。歷史上有兩次合作，但是歷史上有其特定條件，即國共都有既定的敵人。第一次，敵人是軍閥；第二次，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如國共不願合作，

就會被消滅。所以，在既定歷史條件及兩黨的共同利益下，國共才能談合作。

現在則無這一條件，但是統一問題一定要解決，而且不能用武力，必須用談判。現在若要馬上談判，時機還不成熟，而且沒有一個公正的裁判。人民應該是國共談判的裁判，但是現在人民並無力量。「中國之春」也要推動這一談判，若是力量大到一定程度，成為真正獨立於國共之外的民主力量，這時說話就有份量了。

十二月四日，王炳章在柏克萊加州大學講演後，答覆中國統一問題時，又有以下的談話：

首先必須確認大陸和台灣一定要統一。其次再談中國在統一問題上，可能面臨的三種情況：①其中一方以武力吞併另一方；②和平談判；③長期分裂。

我堅決反對第一種方式的統一，也不相信雙方能長期維持分裂的局面，因此要統一只有經過和平談判。然而目前兩地的經濟、政治制度差異極大，和談時機也尚未成熟。因此，若要和談，「中國之春」主張要以民主法治的原則統一中國。至於應該怎麼做，有三項方針：①應由台灣海峽兩岸民意來決定何時談判？以何種方式談判？②和談應有民意代表參與，並非國共兩黨的專利。③兩岸人民有選擇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及執政人選的權利。

台獨與空話

十二月十一日，王炳章在洛杉磯加州大學講演，十二月十三日「聯合報」記者報導說：

王炳章在洛杉磯加州大學演講會後答覆中國統一問題時指出，他堅決反對台獨。他透露：「中國之春」成立以後，得到美國新聞界很大的迴響，很令台獨人士眼紅。王炳章說：『美國新聞界也會判斷什麼運動是有前途的，台獨是沒有前途的！』

十二月十三日上午十時，王炳章在洛杉磯召開記者招待會，在會中的談話也有二段涉及了中國的統一問題。他說：

「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最終目的，是在中國真正實現民主與法治，自由與人權，我們主張用民主與法治推動中國問題的解決，推動大陸與台灣的統一，推動香港問題的解決，推動海外華人現存問題的解決。

「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採取向前看的態度，不管過去持何種政治觀點及立場，只要現在贊成在海峽兩岸推行民主與法治，用民主與法治促進中國統一及解決香港問題，就歡迎加入「中國之春」民主運動。

除此之外，「中國之春」創刊號的「告海內外同胞書」中還有一段提到台灣當局時說：

在政治上，由於當政者對實行民主沒有誠意，而造成人心離異，由於恐懼權力的丟失，益發限制民主力量的發展。因此在共產黨統戰攻勢下，只有被動地以反攻大陸，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空話苟且敷衍。

筆者在基本上同意「以民主來統一中國」或「民主統一」的提法，但是，對「中國之春」所談的內容，也覺得還可以繼續討論下去。

腐化的統一與政治分贓

不錯，『統一不是國共的專利，是海峽兩岸廣大人民的問題』。因此，中國和平統一的問題又如何可以寄託在國共兩黨的談判和合作上？既然主張「民主統一」，以兩黨談判來決定中國統一，這顯然不是民主的形式。誠然，在歷史上，國共兩黨在面對軍閥和日寇時，曾有過二次統一戰綫，合作過二次，現在沒有共同的敵人，不能談判合作。但是，如果國共二黨長期或永遠沒有共同敵人，就永遠不能談判合作，中國豈不就永遠不得統一？又萬一如果國共兩黨一旦發現了有一個共同敵人，那就是民主，由此而再統一戰綫

，談判合作，統一中國，豈不民無噍類？屆時若果真如此，請問「中國之春」諸君又將作何主張？

李麥麥對康梁變法曾有過評論說：

在康梁看來，憲政與自由確是振興當時腐化的中國民族之良策，但憲政及自由運動，如果與國家統一和自上而下的改良運動分離，則憲政與自由兩口號便必然為破壞民族統一的割據勢力所利用。反之，統一雖為當時中國所必需，但如果這種統一，不是憲政的統一，不是使人民有自由的統一，而是要一切人皆同化於腐化的統一，則這種統一必不能保持長久，並且必然要為割據軍閥開闢道路。

因此，至少在主觀上，我們期望未來中國的統一是『憲政（法制）的統一』，是『使人民有自由的統一』，而不是『要一切人皆同化於腐化的統一』。並且，腐化的統一不是真正的統一。國共兩黨有二次合作的經驗，為什麼至今中國未能統一？有如此之歷史教訓，我們還能將中國之統一寄望於第三次的國共合作嗎？將中國統一寄望於第三次的國共合作，大陸的情形我不清楚，在台灣即使國民黨同意，但有許多黨外人士（不見得是台獨）就可能難同意。

筆者完全同意王炳章所說，中國的統一應該是和平的方式，而堅決反對以武力的統一方式。近代中國歷經戰亂，對外抗戰是萬不得已，以爭奪政權而掀起內戰應視為中國人民之公敵！

既要和平統一，又不能寄望於第三次國共合作，那只會是政治分贓而已，那麼唯一的方法就是「民主統一」——中國人民起來統一自己的祖國。王炳章說：『人民應該是國共談判的裁判。』這點不對。人民為什麼不作統一祖國的主人，而要去作「國共談判的裁判」？主人是當家作主，裁判永遠只是為人作嫁而已！

國民會議才是民主統一

「中國之春」批評台灣當局『對實行民主沒有誠意』，我已在「從北京之春到中國之春——論當前大陸民主運動思潮」（將刊於明年元月號

「聯合月刊」）中已經說過：

「中國之春」的這項說法，絕不比世界人權組織對台灣的調查報告為過；類似的話，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都在台灣公開的刊物上可以看到。只要不抓人，其實這也是台灣比大陸自由的地方。

「民主統一」的方式不是第三次國共合作，而應該是召開「國民會議」的方式。「中國之春」批評「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是『空話苟且敷衍』。如果這是針對台灣當局的話，此言是否中肯，袞袞諸公心裡有數。但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本身而言，並不應該只是『空話苟且敷衍』而已。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應有其具體的方式，三民主義的創立人孫中山先生用以和平統一中國的方式即國民會議。根據孫先生的方案，國民會議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是和平的、民主的、是自由的、是不強迫人民服從任何意識型態的，還是多黨制的。並且，在國民會議召開前，各省必須釋放所有政治犯，及確實保障人民發表政見的充分自由。至少，「中國之春」的十八位名譽編輯應全部釋放，大陸民刊應全部開放。

雖國民會議是「民主統一」的理想狀況，但任何一個改革運動都應是富有理想主義的。且國民會議是國民黨總理所主張的和平統一中國之方式，國民黨應無拒絕之理由。國民黨也應為中國之民主統一作出積極的貢獻，否則，難道真的是只想讓大陸同胞扛轎子來抬回去不成？共產黨抬舉孫中山以向國民黨統戰，國民會議是孫先生所倡議的和平統一中國之道，也是恢復全體中國人民於主人翁地位的中國統一之道，中共如敢公然反對，也只能是進一步的自暴其「和平統一」只是欲與國民黨政治分贓而已。

為促進中國之民主統一，在海外，除「中國之春」刊物的發行外，徐文立等籌備而未實現的「中華民主統一促進會」也應有成立的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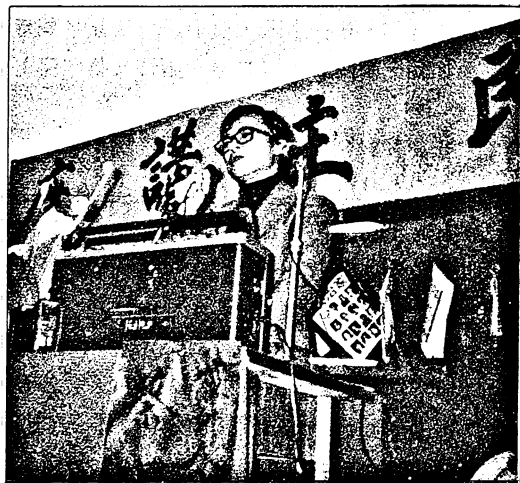
以上所言為個人之見，中國之民主統一是我中國人民統一祖國的事業，望能各方集思廣益，以迎祖國的春天。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廿七日于新店

同胞需團結， 團結真有力

與蔡憲崇談台灣民主運動

陳華



玲瓏的政客。我們不鼓勵蔡醫師得罪人，我們毋寧他也學一點政客的手腕，但千萬要保存自己這點真誠。帶著這份期望，我們倒對蔡憲崇醫師做了以下的訪問。

□蔡醫師，能不能請你先談談你成長的背景。

■我出生台南的一個偏遠的鄉鎮，很小時便舉家遷到淡水。我母親是淡水的世家，年輕時當小學老師，而日據時代的老師在地方上較有發言權與社會地位，因此較能走到風氣之先。她的個性相當剛烈。由於她的父親早死，十幾歲便踏入社會，負擔起家計，後來又遇到太平洋戰爭與國民黨到台灣來的大事，可以說閱歷相當深。最令我感受深刻的是，在日據時代，她並沒有與日本人妥協。國民黨主政後，數度找人利誘威脅她，她仍然我行我素，一以真理為依歸。

小學二、三年級之時，我目睹我母親的參選。那時，並沒有龐大的黨外隊伍，在種種風聲鶴唳之下，少數二三正氣人士，在風吹雨打中，陪同我母親到街頭遊行。那種景象，已經深深地植入我幼小的心靈中。那時，雖然我不懂為什麼要這樣做，可是，母親的倔強勇氣，給我很深刻的印象。甚至，有一次，我最小的弟弟剛生下四天，她就去選舉了，這恐怕不是普通女子可以做得到的。

我比較有意識地參加選舉是在建國中學時，我母親由縣議員競選省議員。我到三重市去看活動，那一次，是李秋遠最後一次的競選，我也看到李秋遠包著綳帶拿著香那種傳誦一時的歷史鏡頭，同時，我也目睹我母親，印證了不出龍潭虎

蔡憲崇醫師是位樸實的理想主義者，也是位積極爭取民主的鬥士。

蔡憲崇的母親蔡洪嬌娥，經歷過異族殘酷的統治後，在國民黨的戒嚴法與選罷法下，仍不稍改為民主獻身的意志，當選過淡水鎮長、省議員，在淡水一帶素負令譽。蔡家的鎮山醫院，以中下層民衆為服務對象，服務週到，取費低廉，在淡水鎮上有口皆碑。

蔡憲崇自小在家庭中耳濡目染，早就對台灣民主運動史發生興趣，近年更直接投身民主運動的歷史潮流。而在他行醫生活中，則特別留心中下階層民衆的疾苦，寄予莫大同情，在黨外從事民主運動者當中，實屬少見。

此外，蔡憲崇的直言無忌，疾惡如仇，在政壇上得罪不少人，或有礙他將來在政壇上的活動，但我們認為一個政治人物，除了送往迎來，擅於應酬之外，胸中多少總得有點真東西，真正經自己思考而樂於為之獻身的東西，否則不過八面

穴的傳言，而落選了。我高三這年，第一次站上演講台，拿起麥克風，這種經驗，回想起來，真是猶在目前。也在此時，播下我政治意識的種子。

本來學理工，好思考，討厭營苟衆生的我，很坦白地說，並不是在很强的意識之下，走向政治。而且，在當時社會制約之下，好像醫生的兒子，最大的責任，便是繼承父親的衣鉢。但既然有了這些淵源，到了高中時期，我便有了強烈的政治意識，再加上我透過歷史知識的培養與現實事物的磨練，使我漸漸有了既定的「模式」。這三部份——反對者、認同中下階層、歷史知識的薰陶——便構成我做一個有志從政者的幾何圖像。

□你是一位開業的醫生，孫中山先生與蔣渭水先生的故事，是否多少對你發生一點影響？

■ 孫中山是我在少年、青年時期，最最崇拜的一個人，他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我瞭解的很多。蔣渭水則是我在對中國史的興趣逐漸轉移到台灣史時，才漸漸認識的。所以，我對二人在認識上的次序有先後，但却有同樣深度的研究。我舉一個例子：我畢業時是台灣最年輕的醫生，同時也拿到日本千葉大學的獎學金，我夢想要做一個心臟外科的權威醫生，甚至夢想有朝一日得到諾貝爾醫學獎，我立刻面臨一個抉擇：我到底要走臨床抑或基礎醫學？我到底要做一個醫生抑或做一位社會工作者？坦白說，我當時沒想到後來會全心投入政治圈。在這種選擇的情況下，孫中山給我很大的啓示，於是我放棄外國一切的獎學金，也不打破頭擠公家醫院。我先留在家裏，然後到很多地方：如新竹、頭份、苗栗等的鄉下，當一名醫生。正巧，陳永興醫生邀我一起去屏東山地。這次山地醫療，使我更有機會接近中下階層苦難人民。所以，孫中山先生對我的一生有決定性的影響。至於蔣渭水先生，則啓示我如何以一個台灣人與社會工作者的身份，對整個台灣的未來，以及中國未來的歷史，有所貢獻。畢竟，孫中山在時空上都距離我較遠，蔣渭水則帶給我鄉土的感覺。另外，蔣渭水在民衆堂後期，所思考的路綫問題，也深深影響我。那時，日本政壇受各種西方主義的影響，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科學的社會主義各相競爭，台灣也受波及。蔣渭水是

一個能以今日的我來否定過去的我的人，在他死之前，他似乎有修正自己過去的傾向，而且他在認識現實、把持理想方面，以及反映社會的心聲、合乎時代的潮流上，給予台灣政治運動很大的啓示與教導，這是任何運動都避免不了的。

□你是不是因爲個人遭遇了很大的挫折才參加民主運動的？

■ 我參加民主運動，絕不是個人遭受某種挫折抑或不如意的事，我前面所言三個因素，正是我性格內包含三種運動：反對不合理的統治者、同情苦難的中下階層、對中國歷史的夢想。因爲這三個因素，使我無意中踏入了政治界。至今，我有很深的感觸：政治是不離現實利益的衝突，而這種利益的衝突，往往使一個人否認、歪曲他當初的政治理想，應是我最感痛心的；同時，在我們的民衆之中，也有很多在社會、文化上的缺陷，但很多民衆運動者却不敢指出，而使得我們的社會文化，不能與時俱進，而間接使民衆運動的品質低落。

□在你心目中，你認爲民主運動該是什麼樣型態的運動？

■ 我年少時，腦中並沒有民主運動這個名詞，根據孫中山的革命事蹟與各弱小民族爭取主權獨立的運動，我頭腦裏只有「革命」二字。我第一次有「民主運動」這個觀念，是我在閱讀有關蔣渭水或其他台灣先輩苦痛的事蹟才滋生的。當然，現在回想起來，我母親二、三十年的奮鬥，也應該是屬於民主運動的一部份。

民主運動，就是反對專制、反對獨裁的運動，我估且稱之爲反對運動，這也是表示我們的力量，離對手還遠得很，對手不願做好，不願改革，我們一點辦法都沒有。唯一的，便是表示反對的立場罷了。在對手對我們強大的威脅利誘之下，我們仍然表示反對的態度，便代表著相當深遠的意義。不可否認的，自日據以來的各種政治運動，都是屬於反對獨裁、專制的運動。我認爲，民主運動一定是：一、反對的，絕對不是著眼於現實的利害，民主運動若要成事，必然要有一群人，都有強烈地爲真理而反對的態度，絕不妥協、互相愛護；所以任何爲個人利害、集團利益而去反對的，不是民主運動。二、廣大的民衆所普遍感受到的苦痛，一定要經由民主運動，讓人

民把這些苦痛說出來、寫出來，逐一地告訴大家。三、反對運動，就是要結合所有有同樣心情的志士。綜合地說，反對運動必須要有啓發、帶動民衆的作用。

甘地的反對運動，給我最深的印象，他在「談不合作」中說：「有人說，做運動是不合法的，我要問這些人，什麼才是合法？如果法律是要爲迫害、剝削更大、更多的民衆服務時，這種法律便是不合法，反對它才是合法。」因此，現在有人大談「惡法亦法」，值得我們再三檢討。如果，反對者現在便承認惡法亦法的作爲，有朝一日反對者執政的時候，同樣會制定出壓迫民衆的法律。甘地的話，給我最大的啓示是，只有正義與公道才是合法。我也不是堅持現實的迂迴策略、戰術不可以走，只是要走政治、社會運動的路，這種前題絕對不可忘記，也因此避免後一代對反對運動本質的誤解。

□身爲一位醫生，你將對民主運動做怎樣的貢獻？

■我年輕時從書本所了解的政治，便是狗咬狗、誘狗相咬、站高山看馬相鬪的圖像，這種勾心鬥角的事實，使我對政治很感冒，而我所以踏入政治路途，是我在社會服務工作之後，對社會有心痛的了解而涉入的。很多中下階層的事，做一個醫生的我，不能解決。

有一位憂心忡忡的婦人來看病，說她睡不著。經我查問結果，原來她畢生積蓄都被倒會倒光了。我只能開鎮定劑給她，暫時麻醉她的神經，但這種治標的方式，實在沒有辦法根治她的病，因爲這是社會上的大問題，做一個醫生，沒辦法治這種病，令我十分悲痛。

另外，在我剛出道時，有一位老阿婆帶孫子來看病，這孫子發燒到四十度，情況不妙，我當時急切之下，便責問老阿婆，爲什麼拖到現在才來，妳在害死你孫子，老阿婆不說半句話，只是低頭流淚，那種無奈的樣子，令我一生難忘。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也真是年輕氣盛，不知世事艱苦，是我無知，而不是她沒知識。這個老阿婆，若是有錢看病，何必拖到這個時候呢？這些例子太多太多了，治一個人的病簡單，但大眾的苦痛呢？我有無奈感，因此我反省，很多人爲的病，其實都是與社會缺陷有關，而社會的缺陷，又

與政治之不清明有關。我相信，只要我能進入實際政治的階層裏頭，我一定要爲這些一、二十年縈繞在我腦海中孤苦無依的中下階層大眾盡心服務，我這樣說，也許很多都市的人不相信，我只希望他們到偏遠地區、加工區、貧民窟、山地…等去走一趟。若是有一天，這些問題都已經解決了，我對政治從此再無依戀，我將帶著我的妻、子，從事我最感興趣的知識、思想工作。

□聽說你最近準備設一些醫療、法律的免費服務？除了服務以外，你是期望藉此做一些別的工作？

■過去，我曾做過一些鄉村、工廠的醫療與衛生保健的工作，而這些，都是比較短暫的，而且我也有藉機認識台灣社會的真相之意。所以，現在我打算在一些台北縣的大城市進行服務工作。——這些城市雖然人口集中，但都是無依無靠的外地人，落後的程度，比一些偏遠的鄉下還嚴重。過去，我比較沒有時間爲這些苦難的人服務，現在他們一波一波地湧到台北市的邊緣來，藉地緣之便，我不必再往山地、海邊、鄉村跑了，因此，我一定要好好發揮這樣的服務機會。除了現在在淡水的服務之外，我打算在三重、中和、板橋，這些人口密集、交通發達的地區，做一些醫療、保健工作，同時也邀請一些法律界同志，找時間到這些地點義務服務，以一併解決現在民衆在醫療與法律上的兩大問題。我這種服務，由於人力有限，可能沒有辦法產生直接的效果，但若能拋磚引玉，使得一些法律、醫療上的工作者產生共鳴，能了解進而參與社會服務的工作，便很有意義了。當然，這種服務會使我從事現實政治的活動減少，但我樂意甘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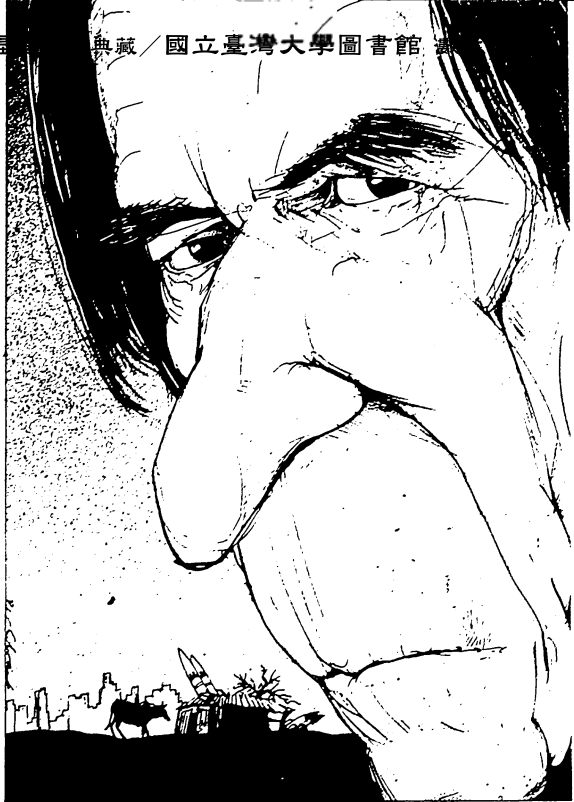
□你參與民主運動這些年，一定有一些不爲人知的感觸，可否請你談談？

■我一直強調，我不是一個適合現實政治的人。我疾惡如仇倔強的個性，以及太過直接反應的性格，常使我得罪一些人。尤其，現實政治中，充斥著種種虛偽的假面具與勾心鬥角，我到現在還不能完全適應。但是，爲了使中下層大眾能早日解除痛苦的目標能夠達成，我必須忍耐、修正我的個性，而且，我很坦白、爽朗，若是真是我有不對的地方，當面說開，我一定虛心檢討、改進。

危機時代 需要新思潮

——「南方」雜誌
訪美國名政治經濟學家
蓋爾布瑞斯

□南 南·譯



■經濟學家蓋爾布瑞斯簡介■

在一般人眼中，約翰·肯尼斯·蓋爾布瑞斯教授是傲慢、好辯，使人不快的，對他有類似看法的，還不止於批評他的人。然而，在他的朋友眼中，約翰却是一位腦筋靈光、精力充沛，並且很能將觀念通俗化的人，畢竟，在他之前，根本沒有任何人能將經濟學一類的著作變成暢銷書。

倫敦經濟學院院長達倫朵夫 (Ralt Dahrendorf)，在為蓋爾布瑞斯的“追尋千年至福演講集”一書中寫序時，特別提到：“蓋爾布瑞斯教授素來態度明確，好誇張，熱衷於一面倒的辯論，這是有魅力的原因之一。還有，或許你會察覺到，他在瓦解對手上，比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更能幹”。

蓋爾布瑞斯教授住在麻州劍橋學園一帶，據說，此地每平方英寸土地產生的諾貝爾獎得主，比世上任何地方都還多。我前去拜訪他時，親自目睹了這些知名之士在一套紛雜、僵硬的體制下漫步、溜狗、開車送孩子上學。當然，由於蓋氏一向認為所有的體制必須不斷加以檢討，自不會熱烈讚美這套體制。

蓋氏堪稱是近年來最被認可的政治經濟學家，有其一定的影響力，但是仍未被普遍接受。他

在“新工業國”這本著作中重複了“富裕的社會”一書中的觀點，視貧窮為“後資本主義社會”中附帶而特殊的問題，這兩本書出版後不久，我們却發覺貧窮是普遍存在的問題，而經濟成長議會於一九六二年四月也曾報導，全美國有四百萬名單身漢和三千四百萬個家庭中人生活在貧窮中；另有兩百萬名單身漢和三千七百萬家庭中的人處於匱乏的狀態下；加起來共有七千七百萬人，佔一九六〇年全美國人口的五分之二。

在第三世界，貧窮並非單一階級的問題，而是一個大眾的問題。匱乏與機會不平等這類的話，只在人們能夠思考並討論這些事情的世界中出現。窮人的世界中並沒有言語，有的只是說不出的悲慘、飢餓與死亡。蓋爾布瑞斯以其對後資本主義社會中貧窮的態度，來對待第三世界的貧窮。他以為窮人已發展出一種與貧窮“適應”的關係，而他們的生活則由“貧窮的均衡”來決定，意即生產一旦超過一般低水平，剩餘馬上就會給消費掉，不會留存，窮人則重回原先的低消費狀態。然而，問題不在低消費，而在沒有消費，因為根本沒有生產！問題在八億人——世界銀行的數字——將陷入絕對的貧窮。至於解決之道，蓋氏建議用教育和大量移民，特別是將那些無法適應貧困生活的不滿份子遷移它處。一九六五年，蓋氏曾做了四次演講，後來以“未開發國家”書

名出版。在這些演說中，沒有“適應”“移民”的字眼，也沒有提到貧窮的均衡。這些概念是蓋氏在一九六五到一九七九年間蘊育成型的，他在“大眾貧窮的本質”一書中詳細加以說明。在這本書中，貧窮被視為一種狀態，非一種情況或一種境遇，就像瞎眼或其他先天性殘廢是種狀態一樣。另外，富裕則被視為一種可預期的境遇。總之，我們有這樣的感覺；在蓋氏看來，貧窮是其自身的成因，也是其自身的結果。

他接受一般的看法，認為貧窮會抗拒變革。為了說明這一點，他舉出窮國農民對高產量品種的抵制。但是有實際經驗，勸過耕者用墨西哥參與國際稻米研究中心品種的人都知道，不出兩年，南亞農民幾乎就能讓這些品種全面取代傳統的品種。事實上，抵制並非出自農民，而是出自官員，出自那些受惠於農業的官員。

一九五〇年代中期，美國的棉花子油過剩。由於迷信棉花子油會導致失明和陽萎，起初反對用這種油做菜的聲浪相當大，但不出五年，棉花子油被全面接受了。在印度次大陸，茶曾於一九三〇年代被視作瘧疾的解藥，現在却變成偏僻遠鄉的日常飲料，可口可樂也是如此。

窮人對變革起疑，但最先看到變革的好處。他們改變，因為變革中他們沒有什麼可以失去，只有收穫。富人抵制變革，因為他們端賴維繫現狀以穩固既得利益。

蓋氏也接受了流行的看法，認為貧窮會造成人口爆炸。同樣是忽略了實驗資料的結果。根據實驗證明，一旦生活安逸，不乏娛樂，窮人出生率即大幅降低。性是窮人唯一的詩歌：快樂的時候，他們生殖；不快樂的時候，他們生殖；無聊的時候，他們生殖。黑暗是強有力的春藥，電晶體收音機提供最好的前奏。

在我們的談話中，蓋氏以其特有的洞悉力與自信，談到當前世界的局勢。

■窮國與富國都應削減軍費■

■：一九七八年在東京，你預測未來的十五年，富國與窮國的關係將日見緊張。你要窮國提醒富國，他們還有契約要遵守。過去十年來，窮國一直這樣做，却不見多大效果。債務

日益沉重，產品價格不斷下跌，保護主義越來越盛，我們根本無法預期富國有意遵守契約。另一方面，全球有一大部份的資源都耗在軍備上。第三世界也逐漸執迷於武器競賽。軍事力量已主宰了生活的每一個層面。依你看，往後這個世界如何擺脫這種情勢呢？

蓋：我相當關切軍事力量的問題。不過，我並不像幾年前那麼悲觀。至少，許多反對軍備競賽的行動已經出現。當今的美國政府上台之初，極盡所能地想從事軍力整備，對此，做了相當程度的承諾，相形地，對武器管制的承諾則相當有問題。而沒有多少約束力的第二回合限武談判，也正如我所預期的是“缺陷重重”。

然而，現在大家的看法却截然不同了，第二回合限武談判如果送交參院，相信能獲致絕大多數的認可，而參院對軍事支出的反應也極其強烈。如衆所週知，前不久衆院首度否決了MX飛彈系統的設置。

另外，我同樣非常關心貧窮國家軍事統治的問題。……去年春天在印度時，我曾祈求印度及其它處於同一情勢的國家，首開其端努力引導窮國削減軍事支出，這是第一步工作。

再則，我們不斷抱怨美、蘇的軍備出口，也不斷鼓勵他們削減這類出口，這都是對的，我支持這樣做。但抵制常比禁運有效。現在我倒寧願見到窮國積極着手控制、削減武器的進口。

■：全球約有五十六個開發中國家直接由軍事政府統治。這些政權有沒有可能削減軍事支出，或減少武器進口？

蓋：我不低估這一點的重要性。不過一般而言，窮國中最進步的國家是由文人政府統治的，而我希望墨西哥，哥倫比亞，印度，阿爾及利亞能首開其端。幾年前，由法國政府贊助，以民主的前瞻為題，在雅典舉行了一次重要的會議。我參加了這次會議，發現到會中竟忽略軍隊在民主政體中所扮演的危害角色，這使我非常驚訝。

■：在你一九六九年出版的“如何控制軍隊”一書中，你認為軍事組織能發展出“其自身的

生命，目標與真理”。你看到幾種對該組織的挑戰——如軍事組織僱用的那些受過高級教育的人員，矢志要減少該組織的威脅性。你覺得當時你指出的挑戰，對軍事組織的成長有沒有任何影響？

蓋：有，只是不夠大，但我們絕不能放棄希望，不能認為軍力是絕對的。十年，十五年前，美國以軍事介入越南，但是在強烈輿論的壓力下，終於結束越戰。

■：你在“第二帝國的輓歌”（“哈佛”雜誌，一九八二年十月號）這篇文章中，強烈反對超級強國干預第三世界，承認民族追求自覺、自治、自組政府的本性，是“組成近代史的少數要素之一”，歸結說，美國與蘇俄任何干涉的行動，都會傷到他們。在你看來，於可預見的將來，這些第三世界國家——你所謂的窮國家——有沒有絲毫不受干涉的機會？

蓋：噢，當然有。這方面我很有信心。我們和蘇俄於過去二十年的經驗，在在顯示出干涉的壞處，而如我在那篇文章中所說的——即將擴充成書出版——干涉愈密，反抗愈大，我們在越南的情況就是如此，我也敢說世上沒有幾個國家會像阿富汗那樣厭惡蘇俄。

■：最近幾個月，我們看到幾個第三世界政府得到超級強權的安撫與示好。

蓋：我要鄭重提醒你，你必須區分雷根政府與美國人民。對雷根而言，（巴基斯坦總統）扎亞可能是個英雄，但這並不表示他在美國整體政治中享有勢力。那種以為全美國，甚至國會都恭維巴基斯坦人權紀錄的想法，是非常無稽的。——我們還沒那麼糟糕。

■ 當前經濟危機的嚴重性

■：你認為目前的經濟危機到底有多嚴重？

蓋：這是最重要的問題，因為現在大半問題，富國窮國間的種種摩擦，都與世界性的危機，尤其與美國的危機有關。那就是衰退……當然，衰退減少了我們自第三世界的進口，削減第三世界（出口物）的價格，使他們不易還債。另外，衰退也引起保護市場的態度，第三世界也無法不受其影響，而最嚴重的

，窮國能夠得到的新資金，不管是私人的或公眾的，都減少了。由全球窮國的觀點出發，最重要的事，莫過富國，尤其美國的經濟能得到最佳的營運。全世界都因我們政府目前的經濟政策而遭殃。

■：你以為目前情勢中，有沒有任何可以導致一九二九年經濟大恐慌重演的因素。

蓋：沒有。當然總有相似之處。一九二〇年代末期，大量的國際貸款沒有償還，但是相對來說，比起現在又少得多了。一九二〇年代危機的肇因，是一段不停投機的時期，其中有股票市場上極為熱絡的投機買賣，有股票市場的崩潰，以及稍後銀行體系的崩潰。今天我沒看到類似情形。我不排除發生銀行危機的可能性，然而一旦發生，我們政府會採取相當迅速的步驟挽救銀行。不，叨天之幸，歷史並不以相當類似的形式重演。的確，經濟政策的誤導，將我們帶到極端貨幣主義與所謂供給面經濟學的困境，我想這都亟需做大幅度的改變。而令我難過的是，我一時還看不出該如何改變這些政策。我們已了解這些政策有多麼糟糕，但是我們還沒找到取而代之的政策。

■：對布列敦森林協定所成立的機構，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以及其他聯合國特別機構的工作，目前大家普遍感到不滿。這些機構無法將資源實際的轉交給窮國。你同意這樣的觀點，認為這些機構已沒有效用，或根本不相干了嗎？

蓋：我要說這是真的，不過我還要說，最重要的是美國經濟的衰退——我們的失業人口，停擺的生產力，高利率——這使我們對國際基金的提供，懷著保留的態度。……市場緊縮時，保護市場似乎是順理成章的解決方法，而保護市場不僅使富國與窮國分裂，並且還有分裂富國的作用。

■：你認為有必要成立一些新機構嗎？

蓋：我認為我們必須時時檢討這些機構。但是我仍要把話說回來，最重要的是富國有正常的經濟發展。

■：在你的著作中，你談到改變的過程。一九七八年你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曾說：“我是一

個漸進主義者。”但整個體制必須不斷的，積極的加以修補，而且還必須具備隨時對問題做出反應的意志。你認為改變是一個長期的演化過程嗎？

蓋：我不是個革命主義者，我是漸進主義者。

■ 第三世界該怎麼辦？ ■

■：但是你在一九六五年出版的“未開發國家”書中，收了一篇討論不同發展模式的演說，其中你做了一個觀察報告，在討論到拉丁美洲的發展模式時，你確認不做事而得收入的集團，如軍官與地主，是成長的主要障礙。你指出：“這裡的進步端賴消除這些不做事而得收入的團體。”但這種消滅工作“不是改良而是革命的工作”。

蓋：無疑地，進步的拉丁美洲國家，大都是已經消滅了古老的封建階級統治的國家，墨西哥是個典型，巴西則是另一個例子。但是……我的初衷是非暴力的。我不敢說我會去鼓動暴力革命。

■：你對伊朗發生的改變有何看法？

蓋：哎，這是自找的。伊朗當時有個極其專制的政權，它也得到外國，包括美國的庇護。我並不是說暴力不會發生。我只是說，每當我提倡暴力時就會感到不舒服。

■：在你的發展模式中，你將中國、印度、巴基斯坦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列為同一類發展模式。這是早在一九七三年你前往中國之前的事了。

蓋：我一九七二年到〔中國〕。

■：除了北平“耀眼的街道”據說你還發現了一個“極具效力的經濟體系”。

蓋：我認為中國人大體如此——我不敢說我確實將它描述成“極具效力的體系”，——但是中國人以其特有的組織天賦，發展出一套對他們很有用的體系。我從不懷疑其中有許多問題。我想在十年前我寫那篇東西時，並沒注意到官僚體制的沉重包袱為中國人所帶來的苦難。但是，那時我也不認為中國已經充分享受秩序所帶來的好處。總之，在共產革命之前，這個國家充滿內戰，和軍閥間的衝

突，混亂——只要恢復秩序，經濟就會有相當大的收穫。說了這麼多以後，在我看來，中國像印度西北旁遮普、哈雅那兩省一樣，是經濟發展成功的例子。

■：你是說中國人不需大量移民而解決了“適應”貧窮的問題。

蓋：中國人已自窮鄉僻壤大量移民到都市。而我仍堅持我的看法，人們應付貧窮的方法之一是乾脆離開這裡。

■：現在已沒有移民的餘地。現在有嚴格的規定，禁止他們照自己的意思移民國外。

蓋：噢，不，並不如此。廣義來說，任何想來美國的人都可以來……英國為一島國，是較難接受移民的地方。但是世界史上，從未有一個時期像過去三十年那樣，有這麼多人從一國移民到它國去。

■：回顧過去，你覺得世人是否變聰明了點？

蓋：不，我不能說人在智慧上有多大長進。就國內與國際政策方面而言，我要說柴契爾夫人與雷根政府都在退步。

■：在你所有的工作中，你最喜歡做的是什麼？

蓋：首先，我希望能對軍力有所抑制，希望我們與蘇俄能許下武器管制的重諾——對我而言這是比什麼都重要的事。我希望我們能放棄十八世紀的經濟政策，承認我們現在是一個有大工會、大公司、大政府的世界，我們必須有調和這些機構的倫理。我們不能在二十世紀的下半葉，仍舊依賴似乎很適合十八世紀下半葉的經濟措施。

■：你認為蘇俄領導層的更換，是否有可能達成管制武器的協議？

蓋：我不知道。我想我們看蘇俄，似乎過於重視它的人事變遷。蘇俄一向由組織來治理。最近幾個月的變遷，並不像一般人想的那麼重要。

■：在美國，有人說我們不是生活在戰後，而是生活在戰前。你認為本世紀結束以前，真有可能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嗎？

蓋：不。我還不認為人類會遭到毀滅。說那些話的人是放棄了希望，或者更可能是在引起別人的注視了！

〔譯自一九八三年二月號“南方”雜誌〕

□名著書摘連載□

日本消費社會的形成〈上〉

犬田 充 / 著 • 金 劍 / 譯

這不是一個「先進」的世界
這是一個「過份發展」的社會
——M·麥莎洛維奇·E·貝爾特斯：
「處於轉機中的人的社會」

■以消費與戰爭 為主軸的現代日本

日本廣播公司（NHK）在一九七五年所做的「昭和五十年：回顧與評價」調查中，舉出「昭和時代」十五件大事，要人們選出三件對於日本社會和日本國民生活發生重大影響的事件。

調查結果得票最高的前七件大事分別為：

(一)日本戰敗（一九四五）六九%；(二)因中東戰爭引起的石油震撼（一九七一）三二%；(三)「太平洋戰爭」（一九四一）二六%；(四)高度經濟成長政策開始（一九六〇）二四%；(五)戰後新憲法頒佈（一九四六）二四%；(六)公害問題嚴重化（一九七〇）二〇%；(七)日美安保條約改訂成功（一九六〇）十五%。

把上面的調查結果加以抽象化和理念化，則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七五年中，改變日本的大事，不外乎消費與戰爭。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不論戰爭和戰敗的原因如何，但是，通過這個戰爭，日本人才從她過去的社會剝離，為其後日本消費社會的形成，準備了條件，肅清了道路，則為不爭之論了。

■新的人種的出現

日本廣播公司前揭的調查，也有這個有趣的結果：被用來描寫戰後日本用得最多的辭，據統計得要先後為：(一)「自由」，五四%；(二)「發展」，四七%；(三)「豐裕」，四二%；(四)「和平」，四一%；(五)「光明」，二七%。

相對地，用來描寫戰前日本的辭，依得票多

寡，是(一)「貧困」，四三%；(二)「黑暗」，三二%；(三)「限制」，三〇%；(四)「混亂」，二七%；(五)「寒冷」，二一%。

戰前戰後的日本意像，由上述的統計，便一目了然了。當然，今天，對日本現狀懷抱不滿，對日本社會所走的道路不予肯定的人，確實還存在著。儘管對日本生活和現狀不滿，不能適應的人，在百分率上居於少數，但在絕對數目上，却多得不容忽視。但，做為一個全體，把全日本國民當做統計性團體來看，日本人對戰後日本社會的評價，遠遠比戰前者為優，是殆無疑義的。

但這也不是說日本人民一向支持和喜歡戰後社會的。根據一九五五年的統計，認為戰後社會比戰前好的，只佔一六%；相反，懷念戰前日本的人，高達四五%。其他三九%的人，是依違兩可的人。但到了一九七四年，比率一改而依次為五一%、二〇%和二九%了。支持戰後社會的人口，在短短二十年間，增加了3.2倍。另外，根據日本總理府的調查，認為戰前的生活好的，在一九五六年，佔五六%；一九五九年以後，認為戰後的生活好的，佔四四%；一九六〇年五八%，到一九六五年，增加到八〇%。

又據日本統計數理研究所的「國民調查」，在一九四五～五五年間，日本人傾向「清高、正直地生活」的人，比傾向「過自己有興趣的生活」的人為多。及到一九五五年到六〇年代，這種情況起了逆轉。日本人要過「清高、正直的生活」的人變成少數人。到了六〇年代，主張過「自己有興趣」的生活的人數，大量地增加了。

■消費人 (Homo consumen) 的登場

綜合這些資料，可以確言，到了一九五五年代，在日本出現了與過去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意識全然迥異的、新的人種，而且成長為日本人中的多數。這新人種就是所謂的「消費人」—Homo consumen。

研究日本人成為消費人的時間上的過程，至少可以區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從日本戰敗的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五年頃的這十年。在這時期中，日本傳統制度、價值觀崩壞，是一個為在大眾範圍內的人欲大解放準備條件的十年。

第二個時期，是從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〇年代終期的十五年。正如這時期的流行語辭「技術革命」、「消費革命」所象徵，日本進入了一個科技的社會。日本戰後持續了好幾年的飢餓和匱乏的時代，隨著韓戰所帶動的「特需景氣」而告終結。日本在偶然和幸運的情況下，正趕上全球性的技術革新和生產力劇增的潮流，在日本精湛的資本家、傑出的官僚和一大群中級技術專家的協力下，使日本迅速向科技社會移行了。

從一九七〇年代以迄於今，是第三個時期。

在全日本從貧困和匱乏向著富裕移行的過程中，人們的行為模式、生活意識、價值體制等，慢慢地從農村性向著都市性轉化和變化。日本出現了完全和過去的農村型截然斷絕，保持了城市型的行為模式、意識和價值觀的新的人類。而這一群新人類，逐漸開始發展到可以決定人的社會的大勢了。

■解體的時代

一九四五年，進行了十五年的戰爭，終於結束了。於今想來，當時確有一份奇妙的光明之感。現在回憶起來，戰敗當初，確有過一種奇妙的光明感。但是，由於戰敗，日本失却了殖民地，版圖銳減了四四％。加以從海外復員歸來的日本人，合起來又增加了六百萬日本人。戰爭使個人的資產破滅，也使整個日本的生產基礎荒廢。在物質上，日本處於絕望的境地。

一九四六年，日本人的每人所得，較之戰前的一九三四到一九三六年，降低了五二％。但是，日本從這種低水平生活恢復的時間，也很迅速

。到了一九五〇年，日本已恢復到戰前最好的時代的七〇％。

據一九六五年「國民生活白皮書」的分析，日本在戰後一系列以「國民經濟民主化、社會民主化和日本非軍事化為目的的制度改革」，即(一)農地改革；(二)舊財閥解體和制訂防止經濟力過度集中、和有關反獨佔的法律；(三)「勞動三法」之制定；(四)教育制度的改革；(五)在法律上確立男女同權和舊式家庭制度的崩潰」……「把向來僵直的、封閉的日本經濟和日本社會，附予新的流動性和競爭性，為嗣後日本經濟高度成長和生活的平準化，奠定了基礎。」。

但是，這一份在表面上冷靜的報告，却不能使我們忽略了上述諸改革並不都是「和平」地完成的。這些改革，帶來各式各樣的衝突和鬥爭。但是，由於對強權的旁觀性的容忍，一向是日本國民的生活樣式之一，因此，戰後日本政府的各種改造，就在這種容忍中比較順利地完成了。日本人民的這種容忍的生活態度，在其後第二期技術革新時代中，依然存留下來。

■日本戰後改革的評價

不是依據前揭日本廣播公司(NHK)「一九七五年調查」，國民認為戰後各種改革中，給予肯定評價者，依得票率為：一婦女獲得參政的權利，七六％；二憲法第九條有關日本放棄戰爭政策的條款，七二％；三天皇退而僅為國家的象徵，六七％；四獲得團結權等工人人權，五一％；五廢止戶主、家權繼承，建立新的、現代家庭制度，四九％。

從上述統計看來，第三、四、五項意味着從權威以及源於權威的恐怖中解放；第一、四項，又意味着從受歧視到平等參與；第二項意味着安於和平。這些，都以不同的樣式，同日本人民走向慾望解放有關，從而對於日本大眾消費社會的展開，有很大的影響。

總之，日本戰後各項改革，就彷彿一架巨大的社會堆土機，在舊有的社會上縱橫上下，使日本社會平坦化和構造化了。其結果，一方面造成只信賴自己和金錢的社會心理上退化性的一元化趨向，同時也提供沈積在社會低層的較有才能的

人創造了突破壓制，向上浮動的機會。

更重要的因素是，昭和五十年（一九二五～一九七五）歷史的重大要因——戰爭，在新憲法中規定加以「永遠放棄」。這樣一個對於「消費」顯得「無限透明」的社會，對於規定日後日本大眾消費社會的形成，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向著消費革命出發

也許是一種偶然罷，昭和四十年代（一九六五到七五年）的末葉發表的「經濟白皮書」，清楚地宣告了「成長的極限」。在昭和三十年代（一九五五～六五）初，大家都覺得「戰爭已經結束」，對「技術革新」的揭幕的歌頌，響徹雲霄。但是，同一個「經濟白皮書」，經過了二十年的歲月，却宣告了成長的終結。其實，從七〇年代初，許多人都認識到一個時代已經結束，而另一個時代已經開始了。

再看看發表在一九六〇年的「日本國民生活白皮書」，我們發覺其中有一個堪予注意的重要判斷。這份白皮書預言：戰後日本國民的生活不但要在數量上逐漸富裕，也會伴隨生活的改革而發生許多質的變化。它清晰地預言了消費會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白皮書列舉了戰後日本生活改革的五個原因：

一、所得水平提高了；二、技術改革的影響；三、社會結構的變革——即所得的平準化、家族制度發生變化；女性向各種工作職業崗位擴張；四、生活意識的影響——由勤儉、節約、儲蓄的生活意識，向着享受人生的生活意識轉化，以及(五)行銷marketing活動的影響等等。

依據一九六一年的調查報告，當時日本人民對所謂「生活革新」的印象，是享受閒暇時間和趣味、娛樂的增大。其次，是家務勞動的減輕，等等。（參見國民生活研究所：「都市中消費者之意識與行爲」，一九六五年刊，第三〇頁。）

一九六一年日本城市工人每個月的可處分所得為四萬兩千日圓（合七千台幣）弱。正是在這種「豐裕」的水平上，加上在所謂生活革新的意象上，日本的大眾消費社會開始起步了。可以這

樣說：日本在由所得等規定了的實態和意識之間存在著巨大差距的情況下，向著一個嶄新的社會，轉過彎曲的路途。如果七〇年代起算是第二代的大眾消費社會，則在六〇年代初，日本的第一代大眾消費社會，早已以歪曲的形態形成了。

■社會的動因

在日本，傳統社會向大眾消費社會的移行，是由於什麼社會的動因才開始的呢？這是一個有關日本戰後史的一大轉變期，不能不向歷史學者請教的問題。我個人則以為，日本人民對政治的失望，有助於使這種向大眾消費社會的移行開始和加速的作用。這固然不能解釋全部的事實，却也至少能說明一部份的事實。

一九二〇年代，是美國社會向着大眾消費社會移轉的時代。Only Yesterday 一書的作者，著名的新聞工作者F·L·亞倫這樣說：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歐戰結束。戰爭的餘燼並未立刻消失。一九一九年，美國國內到處發生罷工。建築業工人、造船工人、地下鐵路工人、製鞋工人、木工都紛紛加入各種同盟罷工，總罷工人數多達二百萬人。爆炸和暴力事件也開始頻發。凡是起來警告「赤色威脅」、主張取締「布爾雪維克主義」的市長和議員，都會收到一份爆炸性郵件。波斯頓城的警察罷工，使波城成為流氓的天堂。極右翼愛國團體紛紛組成，造成比原來的「威脅」更大的威脅。

但這種刻意製造的「憂患意識」，也迅速地消彌了。一個不安和亢奮的時代結束了。人們開始感到「赤色」云云的威脅在客觀上並不存在，而且開始對成天叫嚷著「威脅」的人感到嫌惡。美國人終於開始認識到讓「過份勞動的公司職員得到應有的休假，享受生活。」，是應該的權利。亞倫說道：「美國人現在比什麼時刻都認為應該享受生活。人生苦短，煩惱無用。人生，應該是一場遊樂……應該向着最新的流行狂奔，享受有趣的世俗小事……。」（F·L·亞倫前揭書第八五頁）。

這裡擺著一個簡單的事實。在大眾消費社會中，人民並不抱持著某種意識型態而生活。他們並不秉持大的義理去生活。

■政治鬥爭失敗後的頹廢

「消費革命」乃至於「生活革新」這些語辭，在日本，是緊接着六〇年「安保鬥爭」的結束，而突然出現的。如前文所述，在一九六〇年版日本政府的「國民生活白皮書」（一九六一年二月刊）中就指出：日本的生活，「不但要在數量上逐漸富裕，也會伴隨生活的革新而發生許多質的變化」。這種「渴想安適地渡日的消費意識乃至於生活態度的變化」，成為這消費革命的要因之一。

日本人民被戰後突然得到的「民主」和「自由」所迷失，得到過多的「權利」，對日夜搞得沒有生活質感的，造作的鬥爭，終於開始感到倦怠和厭惡。一九六〇年代全日本人民為「My home・My car」（買房子・買車子）而碌碌矻矻，耽溺在土地、耐久消費財的獲取，顯示了日本人對於能夠保障個人「安全・確實・高收益」的生活行動的熱烈選擇。人人為消費的快樂而狂奔，競相走向「快樂主意」的道路。

日本社會學家作田啓一這樣說：「向來，追求個人一己的幸福，是一種隱私，背著別人的價值……但如今，追求個人幸福的本身的正當性，却成為人們公開主張的積極性的價值了。」（作田啓一：「價值的社會學」，一九七二年刊，二八四頁）。這種洞察，實在觸及了問題的核心。

消費的大道，比起別的道路，更顯得平坦而充滿著甘美的誘惑。不論是歷史上的什麼時代，對快樂主義的駁斥和異議，都較少現實的說服性。不論對於頭等市民或二、三等市民，消費之樂，永遠對他們敞開著又大又寬的門戶。

■整體的「富裕」化

「以黃金的六〇年代」這個流行的廣告辭開始的六〇年代初期，日本城市工人的實際收入是四萬零八九五元（合新台幣約六千八百十五元），但到了十五年後的一九七五年，一個城市工人的實際收入增加到二四萬日圓（即台幣四萬元）。

當然，比較這兩個數目時，也應該計及這個時期中的貨幣貶值率。但是即使減去貶值率，

這個數目不論如何都表示了日本社會的「富裕」。即使對「富裕」的內容與含義各有不同，但作為總體的日本的「富裕」化，殆無疑義。更重要的是，人們已經完全接受了這個大眾消費社會的狀況。

對於像這樣一個「富裕的社會」，在十年、十五年前，人們做過什麼樣的預測呢？

國民生活研究所（即今之「國民生活中心」）在一九六一年曾經以「有人說十年後日本會像歐洲一樣繁榮。您對這種說法有什麼看法？」這樣的問題使受調查者去預想距當時十年後的日本生活。回答「完全同感」者，東京 1.2%，大阪 1.0%；回答「八九不離十」的人，東京 21.3%，大阪 19.2%。易言之，對於趕上歐洲的預測採取肯定態度的，東京是 22.5%，大阪是 20.2%。另外回答：「不太可能」的人，東京是 56.9%，大阪是 54.8%。超過半數的日本人畢竟難於相信在當時的十年後，日本在生活會趕上歐洲。（國民生活研究所，前揭書，八十六頁）。

■活的證人——日本

一旦觸發的大眾消費者的慾望解放，以及被企業有意識地創造和操縱、管理的人們慾望，會引發何等劇烈的消費爆炸，這只要看看戰後的日本狀況，就知道日本的例子便是活生生的例子了。從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七一年的二十年間，日本的實質家計消費，漲了二・七七倍之多！

在日本，正式吸收行銷（marketing）觀念的時間，是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的事。考查一九六〇到一九七一年間行銷觀念導入的時代，發覺日本城市中每家實質家計總消費，增加了一・六倍。

再看日本的商品別實質消費額的增加，可以看到這個事實：一九六一年到七一年間成長最高的商品，是住宅與光熱費用有關的商品，計增五・二倍。其中以電視機為首的電氣產品居多。連帶地電費等能源消耗量顯示急速的增加。

成長率佔第二位的商品，是肉類、乳製品和卵等「先進社會型食品」和嗜好食品。佔第三位的是雜費支出的商品，其中又以化粧品，和以汽車等為中心的交通關係費，和休閒用品居多數。

在這種爆炸性的消費成長中，日本的生活有這些特點：(一)、向來的商品被更新穎、更洋化的商品所取代；(二)、出現更方便、更快適愜意的商品，並廣泛普及化，例如調理好的食品、家電產品、汽車等)；(三)使生活更快樂、更享受的商品之普及化(例如電視機等家電產品、流行性產品、休閒用品)。

另一個變化，可以從能源消費中顯示出來。能源消費不僅僅在量上增加了，在質的方面也有很大的變化。

僅僅是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二年間，在消費生活中所耗去的石油的量，比以往高達四·六倍。在這個時期中，從國民經濟全般來看時，實質的個人消費支出增加了一·八倍。這種消費規模為向來的能源消費結構，帶來巨大的變化。私人轎車的燃料，在一九六五年，佔日本的能源消費總量(計九四四萬千升)的七·五%，但到了一九七〇年，私人轎車的燃料，便佔了總量(三、一〇三萬千升)的二四·四%。

此外，還有一件必需注意的事。即在大眾消費時代急速成長的商品，例如耐久消費財、能源消費、流行製品，率皆為大企業所生產的商品。

這一方面是大企業善於更多、更好、更快地適應了消費者的生活慾求(「提高生活水平」的慾望)，但另一方面，也是追求企業的唯一目標——利潤的大企業，經由它們的商品，誘導了消費的爆炸。反過來說，當然表示有無數不適合的商品被淘汰、浪費了。

■高度經濟成長的評價

許多人至今對於日本六〇年代的高度經濟成長，給予高度的評價。根據調查的結果，有六一%被調查的日本人認為日本經濟的發展對於他自己的生活在有益。比起八%認為經濟成長不利於自己者，遙遙領先。從受調查者的職業來看，特別是自營商工業者、服務業者、管理業者，對於日本的高經濟成長，給予積極的評價。這是因為成長對他們是有利的緣故。再從所得來看，高所得的人，對經濟成長是歡迎的，計最高收入者七五%，中所得七一%，中中級所得六三%，中下級所得者五二%，低所得者為三七%。高度經濟成

長的果實，在分配上，因着不同的社會階層，顯示不均等，至此又得一個證據。

一九七一年，日本總理府調查的結果，國民認為經濟成長所帶來的利益，有這幾項：即「日常生活變得富裕了」；「工作機會增加，失業減少」；「科技進步」；「日本在國際間的評價增高」，以及「社會設施充實化」，等等。

另一方面，國民認為成長也帶來這些缺點：即「公害嚴重化」；「物價上升」；「交通事故和交通阻塞深刻化」；「精神生活的降低」，「人際關係冷漠化、乾涸化」，等等。

根據日本廣播公司輿論調查所一九七六年發表的「低成長時代之生活及意識」中所做的調查，國民肯定了高經濟成長的項目，計為：「終於能買得起汽車、彩色電視和冷氣機」(三九%)；「和友人、知交、同事間的人際機會增加」(三七%)；「買了住家或土地」(二七%)等三項。國民認為成長的缺點是「人變得把錢看得太重」(三九%)；「儲蓄的錢因貨幣貶值而受損」(二五%)；「每天以工作為中心，碌碌矻矻，沒有生活的興味」(一六·六%)。

從上述的各項調查，可以這樣確說：一般而論，國民對高度經濟成長採取支持、肯定、高評價的態度。但是，究其內涵，有許多具有「雙面價值」的性格。「福禍相倚」之說，即使在高度經濟成長這件事上，也同樣適用吧！(待續)

(2)

以歷史的見證透視當代政治
以犀利的批判剖析現代社會

大地生活

1~10期合訂本

代表著戰後在台灣新生的一代，
對民主、自由和法治的一項努力。

訂價：國內每卷台幣200元

國外航郵歐美美金14元

亞洲美金10元 港澳港幣50元

(一次合購10本以上七折優待，

5本以上八折優待)

郵撥帳號：555202黃漢南

爲女權而戰！

——圖解「女權運動小史」

■本刊編輯部



■女權運動的先驅者■

① 瑪麗·華史東克拉夫特是女權理論的先驅者，她在一七九〇年代出版「爲女權辯護」一書，是十八世紀唯一膽敢公開反抗流行的歧視女性思潮的女子。這本書已經成爲女權理論的經典著作，十九世紀蓬勃發展的婦運在理論上受她影響甚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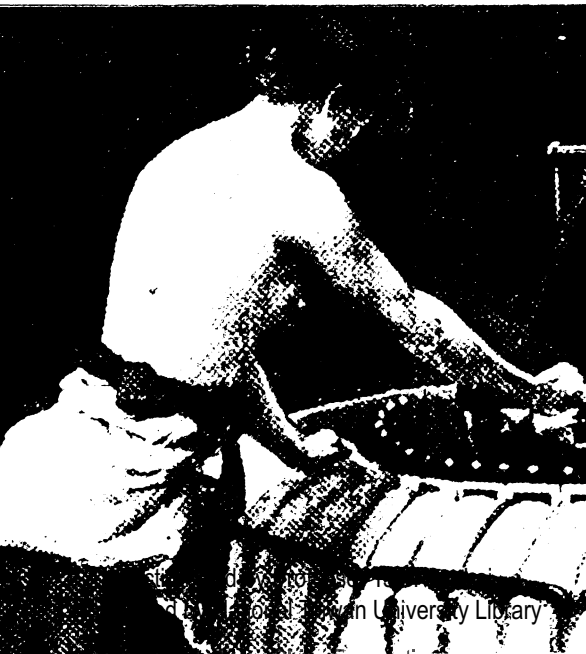


② 愛密麗·戴維絲與伊麗莎白·嘉瑞特首度將女性投票權請願書由隱秘的角落提出來，交給約翰·史都華·米勒，由他於一八六六年呈報給國會。戴維絲小姐爾後創設了第一所女子大學基頓學院；嘉瑞特小姐則是英倫第一位女醫師。



③ 克里米亞戰爭時，南丁格爾在她的史塔里醫院細心照料病人。在十九世紀中葉絕大多數的西方女性均附屬於男性，但也有例外，少數中產階級女性，以無比的勇氣衝破傳統的牢籠，在社會上大加施展其才華和野心，南丁格爾和布朗特姊妹便是當時少數的幸運者。

④ 十九世紀中葉在英國衆多「血汗工廠」梳理羊毛的女工。這類工資低、勞動條件惡劣、並且殘酷剝削工人的小工廠，寫下勞動史上極爲殘酷的一頁。而當時在這類工廠做工的英國女工，在外受盡剝削，回到家庭還有繁重的家務和丈夫的凌辱等待她們。這些女工，可以說是當時英國社會受壓迫階級中被壓在最低層的一群。





■ 為婦女參政權而戰 ■

① 美國婦運興起初期，正逢廢奴運動在全美如火如荼地展開，許多婦運份子也都積極參與。一八四〇年在倫敦舉辦的「反奴役大會」，許多美國婦運份子千里迢迢趕去赴會，却被拒正式與會，只獲准以觀察員身份參加，當時與會的美國婦運份子始覺悟到，壓迫不僅止於黑奴，也及於每個美國婦女。這次的經驗遂促發了一八四八年的「辛尼卡瀑布大會」，使美國婦運走向更組織化，而爭取政治權力也成為最重要的目標。



② 在英國舉辦的爭取婦女參政權演講大會，警方正試圖驅散運動份子，顯示爭取婦女參政權運動所受到來自官方的壓力。



③ 積極爭取婦女參政權的英國婦運領袖——潘克哈斯特夫人和其女兒等三人同遭警方逮捕，後經婦運份子絕食示威，始被釋放。

④ 美國婦運份子也步其英國姊妹的後塵，走上街道，進行鼓吹婦女參政權。

⑤ 婦女參政權鼓吹運動高潮時期，運動份子和官方經常發生激烈衝突。圖中是英國鼓吹份子於一九一四年攻擊英國白金漢宮後遭逮捕的情形。





■ 女權運動與勞工運動 ■



① 十九世紀末，英國女權運動份子開始積極向工廠女工鼓吹女權和參政權。她們認為少數中產階級的擾攘，官方必不為所動，只有以廣大的勞工婦女做後盾才可能逼迫官方讓步。



② 圖為「全美促進女性參政權運動者協會」（簡稱NAW SA，創始於一八九〇年）所張貼的海報，顯示她們已開始意識到爭取工人階級中的女性是婦運成功的基本要素。

③ 英國獨立勞工黨的創始人——基爾·哈迪在特拉發加廣場舉辦的群眾大會上鼓吹婦女參政權。他的介入婦運，給當時由中產階級領導而逐漸失去生氣的英國婦運注入了新血。



④ 左：基爾·哈迪於一九一〇年參加競選時的海報，他除了主張給婦女投票權、所有成年人參政權外，還有多項社會主義主張。

⑤ 右：英國工黨的「全國女工聯盟」成員和她們的旗幟。她們既關心經濟問題也關切政治權力問題，由於她們在政治上的日益覺醒，逼使政府不得不面對問題。





① 艾瑪·韋勒是女子教育的拓荒者，她所辦的女子學校曾培養出不少傑出的女性，十九世紀中葉，美國最著名的婦運領袖之一史丹頓女士，便曾在韋勒的學校受教過。



② 創於一八六九年的哥頓學院是第一所為女性開辦的大學，開辦之初先擁有實驗室，後才有圖書館。

■ 婦女教育權與社會參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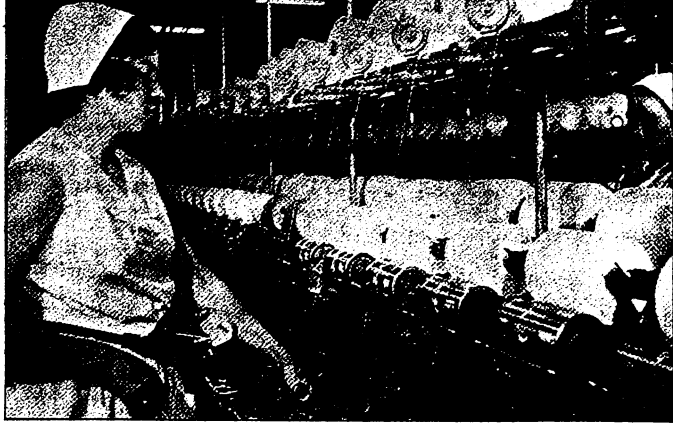
③ 第一次大戰期間，在機場上修理飛機的女性工程師。由於對戰爭的「貢獻」，使得女性的能力日益受到注目，也間接影響到一九二〇年美國參院的通過第十九條修正案（賦與女性投票權）。



④ 一群英國婦女帶著子女在街上示威，要求政府多設托兒所，使她們得以有更多的時間從事職業和社會活動。



⑤ 一群激進的女性主義者在紐約遊行紀念一九二〇年第十九號修正案的通過。這些激進份子要求兩性的全然平等，但她們認為只有社會體制的徹底變革才可能達到真正的平等。



第三世界的「廉價女工」不但是新興輕工業的生力軍，也是跨國公司獵取的重要對象。這些女工的工資一般均低於男工，他們是歧視女性傳統的犧牲者，也是受到跨國企業剝削最嚴重的一群。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九日，在秘魯南方省份進行的全國性大罷工。目前第三世界的任何抗議活動均有女性參加，顯示第三世界女性對自身權力的覺醒，和對社會目標的認同。

第三世界婦女的奮鬥



尼加拉瓜的民族解放陣綫——「桑丁尼斯塔」組織成員中有百分之卅是婦女。在第三世界，「革命」已不僅是男人的責任，愈來愈多的第三世界女性已覺悟到，國內的反動政權和帝國主義者的勾結使他們和男性同胞同受壓迫，只有推翻這層壓迫，才能獲取人的尊嚴和基本權利。



尼加拉瓜革命成功之後，桑定政權即積極進行掃除文盲的工作，圖中上了年紀的婦女正和兒童在同一教室接受初級教育。「教育」是提高女性社會地位最重大的因素，第三世界女性文盲比例的偏高，已日益受到國際性的關切，許多進步的政權也將掃除女性文盲列為教育工作的重點。



美國擴張主義的本質 黃人

美國史家卡門 (Harry J. Carman) 與西瑞特 (Harold C. Syrett) 「在美國人的歷史」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一書中說：「美國從一開始就是擴張主義者。」這是很確切的論斷。美國的版圖從原有的北美十三洲擴張到今天的五十洲，由美洲大陸而侵及太平洋無不是藉著巧取豪奪的手段達成的。美國第二十五任總統，通稱老羅斯福的西奧多·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1858~1919) 是白人殖民統治的歌頌者，也是美國擴張的大功臣，他就曾很露骨的表明：「對白種人來說，不管他用什麼方式奪取土地：用條約也好、用武力征服也好，那都不是問題的重點；最重要的是他終於奪取了並且佔有那些土地！一句話，奪取土地就是一切；而為了文明的好處和人類的利益，一定非這樣做不可！如果有人反對走上征服的道路，不把整個 (美洲) 大陸改造成一個奇妙的、欣欣向榮的文明的國家。那麼，他的主張便是一種虛偽的、邪惡的、愚蠢的道德。」在美國擴張的慾望高漲之際，加拿大、古巴、多明尼加等國都是美國虎視眈眈，極欲吞之而後快的肥肉。一八八六年，老羅斯福就期待有那麼一天：「美洲的土地沒有一尺是在歐洲國家的掌握中 (意即：全由美國控制) 。」他的好友，麻省的參議員羅季 (H. C. Lodge) 則認為：「從里奧格蘭河 (美國與墨西哥的界河) 到北冰洋之間，只應有一種國旗和一個國家」，而夏威夷群島、薩摩亞、巴拿馬運河及古巴也都應該由美國控制。果然，不出二十年，夏威夷群島、薩摩亞、巴拿馬運河區，外加菲律賓、波多黎各、關島等地，相繼被美國併吞，成為龐大的美利堅帝國的一部份。

從美國建國到二十世紀初年的一百多年間，美國人中以盎格魯——撒克遜人最多，美國的主要權力也掌握在他們手裏。這些盎格魯——撒克遜人雖向英國取得政治的獨立自主，在政治思想

、制度上却仍奉英人為師，在血統上更以身為盎格魯——撒克遜人自傲。他們自認為是上帝的優秀選民，上帝賦予他們的神聖任務就是：用基督教、自由及民主制度這些最高度的文明去教化、開導其他的落後民族，使落後民族得以承沐上帝的恩澤，早日脫離野蠻、愚昧的黑暗狀態。如曾任參議員、國務卿並極力促進美國成為太平洋帝國的施華德 (W. H. Seward, 1801~1872) 就替英國的殖民政策辯護說：「大不列顛的做法跟其他粗暴的征服者大不相同。她是文明的傳播者，又是傳教士。她在西半球建立不少殖民地，在東方和世界其他地區也是如此。結果，她把英國式的法律和英國語文傳佈到世界各地去。」老羅斯福則熱烈的讚頌英國在印度的殖民，他說英國給印度帶來繁榮進步、安定，若英國不再統治，印度將陷於混亂、流血暴動中，英國沒有從印度得到任何好處，英國對印度真是功德無量，所以英國應該再繼續統治下去，總之，「英國人在印度的作為……像一切白種人在一切非白種人地區的作為一樣，對於人類來說，還是一件有益的事。」老羅斯福頌揚殖民統治的理由是：「對那些 (指埃及、菲律賓等) 地區的人民來說，如果他們還沒有很高級的文化，最好的事情莫過於吸收和利用美國人或歐洲人的思想、文明及基督教信仰；落後的人民雖不克要受外來的控制，儘管這種控制也有缺點，但對住在地球上各黑暗國度的人民來說，他們要取得道德上和物質上的進步，接受這樣的統治可以說是先決的條件。」

一八八五年，美國著名的學者福斯克 (John Fiske) 在哈潑 (Harper's) 雜誌上發表他的演講稿「顯明的命運」 (Manifest Destiny)，文中力言盎格魯——撒克遜人將統治世界是上帝所賦予的「顯明的命運」。此論一出，轟傳一時；學術、政治、軍事各界的領袖爭相請他演說，政要名流尤奉為上賓。這種種族與宗教的優

越感配合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成了美國擴張主義的主要動力，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風行更給擴張主義者堅實的合理藉口。倡導現代海權論的馬漢（A.T.Mahan）就是個虔信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人，他認為國際之間就是「狗吃狗」的關係，美國寧為吃狗者，不要做被吃者。他說，個人財產權固應尊重，但也有例外，當一個社會不能善用其土地、財產時，文明人就可去佔有他們的土地、財產，不必尊重他們的權利，「文明人會用盡各種辦法，逼使那個無能的種族或制度俯首稱臣，就像劣等民族在優秀民族的持續壓力下屈服、消失一樣。」馬漢更明白的指出政治、軍事是為商業利益服務的：「有些人權力非常旺盛，不斷受佔有慾的推動，同時又本著種族的利益，努力向外擴張，迫使本國政府肯定並保護他們在海外建立的企業。」

因此，馬漢的海權論，不單指軍事而言，他主張海權與商業優勢不可分，要鞏固商業優勢、加強海權就必須建立大規模的海軍艦隊與龐大的商船隊，向加勒比海、太平洋擴張，奪取殖民地做為商業和軍事的基地。他進一步主張美國與英國聯合起來「組織足夠的力量以控制海洋上所發生的一切重大事情。」馬漢的這些論調是種族優越感、資本主義及社會達爾文主義三結合的典型代表，也是十九世紀末年以來，美國戰略的指導原則。

美國擴張主義的真貌在併吞菲律賓一事上，表現得最為清楚。一八九八年的美西戰爭，美國戰勝西班牙，取得波多黎各和關島、菲律賓問題則引起爭論。菲律賓革命軍官與美軍合作，戰勝後，革命軍天真地要求獨立自治，殊不知美國與西班牙交戰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併吞菲律賓做為對中國貿易的主要基地，豈有撤離軍隊之理！革命軍見所求不遂，只有對美軍作浴血抗戰。當時美國國內也有少數反對的聲音，反對者最有力的指責就是：若佔領菲律賓就違反了美國獨立宣言中：「政府的正當權力是由被統治者的同意中產生出來」的原則。可是，美國總統麥金萊和參議員還是批准了併吞菲律賓的條約。為什麼美國可以罔顧立國原則，悍然併吞菲律賓呢？麥金萊總統說他好幾次跪著祈禱，請全能的上帝教導他該怎麼做。最後，他得到了以下的結論：「第一、菲

律賓不能交回給西班牙——那是怯懦而不光彩的事；第二、也不能把菲律賓交給法國或德國——這兩國是我們在東方商業上的勁敵——交給他們會損害我們的貿易，幫助敵人是極愚蠢的事；第三、我們也不能丟下菲律賓人不管，他們不會管理自己，會陷於無政府與大亂的狀況，那會比西班牙統治時還糟糕；第四、因此，除了接收之外，我們別無辦法；我們接管後，可以教育這些菲律賓人，提拔他們、開化他們，並使他們成為基督教徒，在上帝的庇佑下，我們將為他們做一切有利於他們的事。……然後，我才酣然入睡。」參議員畢夫里治（A.T.Beveridge）在參議院的發言則乾脆明白指出美國就是要做世界的霸主：「一千年來，上帝培育英語條頓民族豈只是為了讓他們孤芳自賞而已。絕對不是！祂已指定我們做世界的主人，要我們在任何混亂的地方建立起秩序來……祂使我們熟習統治管理的本領，好讓我們統治野蠻人與老大民族。」美國對菲律賓的革命軍又是什麼態度呢？很簡單：血腥鎮壓。繼麥金萊之後接任總統的老羅斯福對於鎮壓菲律賓革命軍也有極理直氣壯的說詞，他在就任後的第一份國情咨文中說：「叛亂不過是一群在某些地方活動的流氓土匪所造成的事件，這些亡命之徒根本不值得一提。就像世界各地的盜匪一樣，他們不值得我們敬重。對待這些叛亂份子跟對待印地安人應該用同一種態度。……為了忠於我們的傳統、忠於我們的文明、忠於我們的人道主義和責任。對於和平的菲律賓人，我們該竭盡所能的給予好處；對於為非作歹的菲律賓人，我們要給予最嚴厲的懲罰和打擊！」這真是美國人聖明，菲律賓人有罪當誅！最可笑也最能表現美國擴張主義特質的是以下一段話：「這樣的事情在歷史上將是獨一無二的：一個像我們這樣雄才偉略的民族，由於戰局的變化，不得不佔領一個不屬於本國的地方，而在佔領之後，對於原住民，我們是那麼大公無私地關注著他們的進步。如果我們現在就離開他們，他們馬上會墮入自相殘殺、腥風血雨的混亂狀態。我們這樣做是逃避責任，也就是違反了人道主義。」這是何等冠冕堂皇的說辭！滿腹私慾又滿口仁義道德，這就是美國擴張主義的本質。

拯救苦難的女同胞！

——盼「優生保健法」儘速立法通過

□李 豐

前幾個月的新聞報導，景美一所醫院的院長，在替一位女性病人施以月經規則術，接著以全身麻醉為該病人止痛，結果手術尚未結束，病人便陷於休克，雖經急救，不久仍然無效，病人死亡。

在警方處理這件案子的時候，該院院長認為他們的處置並無不當，病人的死亡是因為體質有異，對麻醉藥過敏引起休克所致的。

這裡要討論的，並不是病人如何死亡的責任問題，而是這一件事情之所以會發生的背景問題及社會問題。

據該醫院院長表示，病人是因為月經不順前往該醫院就醫的。當時，病人表示她的月經遲了四天，而且覺得下腹有發脹的感覺，腰酸不舒服，請醫師診治是否已經懷孕。

據病人的丈夫事後表示，他的太太於死亡前一天晚上，也同他說過，月經遲了幾天，同時感到下腹發脹與腰酸，準備第二天去看看婦產科。

這些敘述，顯示病人只是去看看病，看看是否懷孕，同時希望醫師替她解決下腹發脹及腰酸的問題而已。也因此，病人的丈夫並沒有陪她去看病，只囑咐她自己去。這種情形，在病人夫妻雙方看來，都只認為是看看病，最多拿拿藥的小事，他們大概想都沒有想到手術與死亡的問題。

通常月經遲來幾天，是幾乎任何一位成年女性都有過的經驗，尤其是在都市生活的女性同有職業的女性，因為都市生活比較緊張，有職業而要負工作責任的又更加緊張。緊張的情緒不但對身體其他器官的功能有影響，對賀爾蒙的分泌，及對內分泌系統的功能的影響，尤為敏感。如果

腦下垂體及卵巢這兩個內分泌器受到影響，功能不平衡時，月經便會早來幾天、遲來幾天、量少一些、或者量多一些。因此，任何一個婦產科醫師，看到因為月經不規則或者月經量有了改變而前去就診的職業女性，數目都相當的多。

通常對於這種病人，在醫師慎重檢查，排除了其他疾病的可能性，作出了正確的診斷之後，大部分醫師是給予藥物；或者施以心理治療，使病人了解疾病的基本原因，舒解緊張的情緒，以達到治本的目的；只有在病人接受上述治療並不見效，或者流血過多的情況下，才會考慮施行月經規則術或者子宮內膜刮除術。

下腹發脹及腰酸的問題，也常常困擾一般女性。在月經前幾天，由於賀爾蒙分泌量大，有使血管鬱血的作用，有使血液中電解質滯留的作用，於是自然會發生腹部發脹乃至腰酸的現象。只是這些現象在某些人身上嚴重些，在別的人身上又輕微些；在賀爾蒙分泌正常的時候輕微些，在賀爾蒙分泌受到影響的時候又嚴重些而已。這些常識，只要讀到醫科畢業，便都曉得。而且，在醫師看病的時候，也應該詳細地向病人解釋。

在台灣，雖然中學裏有生理衛生的課程，却大部份的教師都不會選擇實用的教材教給學生。學生雖然考完這一科，真正能從生理衛生的課程中學到的知識，却貧乏得可憐。同時，在台灣可以找到的通俗的有關這一類的醫學書籍，也少得可憐。因此，一般人去看病時，對自己體內的生理現象，幾乎一無所知，對疾病的治療原則，更是完全依賴醫師的判斷。時間久了，醫師便也懶得向病人詳細解釋，只是自認如此，便治下去。於是也就給了少數醫師以可乘之機，利用病人的

無知，而施以不需要的治療，施以不必要的手術，藉以賺取額外的金錢或報酬。

這位病人雖然對生理知識的了解不多，她却也知道要找可以信任的醫師去看病，她選擇了門面相當大的醫院，又是經過勞保局審查及格的醫院。照理，應該是值得信任的了。可是，她却會在看看小病的情況下，沒有丈夫的同意，竟肯在匆促間遽下決定，簽了手術志願書，交了不算小數目的手術費，馬上獨自踏上手術檯，接受手術，這位醫師的說服力，一定相當強。可惜病人已經去世，否則便可以加以了解，這位醫師到底是用什麼理由，把一位毫無心理準備的輕病人，勸說到她自動而且馬上接受手術，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如果這位病人對生理知識的了解有相當的程度，她除了知道要選擇醫院之外，也會知道該對醫師加以選擇，對那些不合理的治療加以拒絕，或者，手術之前先徵求另一位醫師的意見，她也許就不必枉死了。

手術之前，通常都必須做若干檢查，證明病人能夠忍受該種手術，或者沒有其他疾病以致手術後產生意外的合併症。同時，手術之所以要簽手術同意書，也是取其慎重之意。照理，在醫院裏施行手術時，手術同意書還必須有一位病人的近親簽名，才算合法。因此，手術通常都不會匆促進行，而是預先定下時間的。只有一種情形例外，就是在急診處進行的急診開刀，這時是爲了急救病人的性命，很多必要的手續，便只有權衡輕重了。

雖然是病人的身份，雖然到醫院去是爲了「求」醫，病人仍然可算是消費者，仍然應該具有消費者的權利。只是，病人太無知時，就很自然地讓權利睡着了。像這位病人，不知道掌握自己的權利，不知道手術原來是應該那麼慎重地進行的，結果，準備不夠，連命也送掉了。

月經規則術是最近這幾年來突然流行起來的手術。看看大小報紙，很多婦產科醫院都大登廣告對月經規則術大事張揚，很多婦產科診所的招牌上也掛出顯明的霓虹廣告牌，懸掛著月經規則術的字樣。可見一定有很多人需要接受這種手術，這些婦產科診所恐怕需要手術的人不知道何處可行，於是大事張揚，招徠顧客。

爲什麼這種手術最近多了那麼多顧客呢？原來月經規則術就是變相的墮胎手術。

在懷孕的最早期，胚胎還很小，只是鬆鬆地附着在子宮內膜腔上，這時，只要在子宮頸口處，用真空吸管把子宮內膜腔內的內容物吸出，胚胎便隨之而出，達到了墮胎的目的。這種手術相當簡單，並不需要麻醉。

在台灣，目前墮胎仍然是不合法的，公然在報紙上及診所門口大做廣告，豈有不犯法的道理？然而，月經規則術能夠生存，能夠成爲很多婦產科診所的賺錢工具，是因爲這種手術是一種生存在法律夾縫中的墮胎手術。

在子宮受了孕的最早期，即是月經遲來的兩個星期內，用驗尿的方法是沒法測知是否已經懷孕的。除了在大醫院內，可以用驗血的方法，檢查血中所含一種特別賀爾蒙的量是否增多了，可以在更早的時候，便證實是否懷孕之外，通常都要待月經遲來兩個星期後，才可以獲得證實。在尚未能證實是否懷孕之前動的手術，在法律上當然不能算是墮胎手術。既然不是墮胎手術當然也就不算犯法了，法律又有什麼憑證加以制止呢？

但是月經規則術被開業的婦產科醫師，乃至其他醫師濫用了。有些少不更事的女孩，因爲經期無故晚了幾天，或者有些太太月經遲來，恐怕避孕失敗，都會匆忙地到這些診所去要求動手術，使她們的月經規則些，也就是使她們不會懷孕。這種人性的弱點，被這些診所的工作人員利用上了，便成了一種變相的賺錢方法。

到月經遲來兩個星期，如果是懷孕的話，驗尿便可以獲得證實。這時，胚胎已經長得相當牢固，用月經規則術的真空吸管是吸不出來的了。於是，只有改用子宮刮除術。子宮刮除術如果在合格的大醫院，也不是什麼大手術，只是必須把工具直接放入子宮腔內操作，需要麻醉病人，也需要有很完整的手術室消毒觀念，當然技術也很重要。

進行這種手術，與月經規則術一樣可以達到墮胎的目的，可是却不能大事廣告，甚至不能讓病人知道，因爲這是犯法的，被人告到官裏是要受到處罰的。

不願意因此失去賺錢機會的婦產科診所，會向無知的病人表示，只是替她動月經規則術，事

實上却是做子宮刮除術。却因為如此，這些診所沒有時間替病人作手術前的準備及接受麻醉前的準備，有很多無辜的病人，便是在這種情形底下犧牲的。

更糟糕的是，月經規則術已經成為墮胎的代名詞，很多設備簡陋的診所，缺乏訓練的醫師，乃至沒有醫師的醫務所，都紛紛替病人進行月經規則術；甚至用子宮刮除術墮胎，却以月經規則術為號召。

前不久，另一女性病人因為腹痛及月經逾期，到某一診所就診，當時診所的醫師不在，就由並非醫師身份的診所負責人命令女護士替病人診斷，誤診為懷孕及子宮發炎，並馬上替該病人動子宮內膜刮除手術，收取手術費二千元。結果手術欠當，病人並無懷孕，却被手術機械把子宮弄破了兩個洞，並把病人的腸子拉了出來，致病人陷入危急狀態，幸而馬上轉送大醫院救治，才把生命挽救回來。

這位診所負責人及護士，後來雖然都被起訴，依違反醫師法的罪名，分判十六個月及十四個月的徒刑。但是，這些處罰，對受害者的病人來說，又得到什麼補償？

更常見的情形是，有些婦女，尤其是未婚女性去接受這些手術，手術之後便一直感到腹部不舒服、疼痛，乃至大量流血，由親人陪同到合格的醫院去診治，還不敢告訴醫師說自己曾經被動過墮胎的手術，便是因為那是犯法的緣故。可是，這麼一來，正確的診斷往往被延誤了，等到檢查也證實了醫師的猜測時，往往病人便要作更大的犧牲。很多病人便是因為子宮穿孔、腹膜炎、敗血症……等等合併症，必須把子宮切除，以後再也沒有生育的希望。

中山北路的特種營業很多，值得一提的是這一帶的婦產科診所也很多，從中山北路一段中山市場到三段的晴光市場，以「女醫」為號召的婦產科診所幾乎每個巷弄都有，如果加上密醫開的無牌婦產科診所，數目就更加可觀，怪不得有些醫界人士戲稱這一段路為「墮胎街」。

在這個區域內的婦產科醫院診所，有一大特色，就是大多數都以「女醫」及「前某某大醫院主治醫師」主持為號召。

在台灣的各醫學院畢業的女醫師，即使受過

婦產科訓練的都集中到這裏來執業，數目也沒有那麼多。這裏的所謂「女醫」，便成了一個很值得深究的問題。

有一位記者曾經訪問到一位王小姐，從王小姐口中道出的事實，讓人聽了實在心驚膽戰。

王小姐來自南部，只有國中畢業的學歷。她到台北來謀職時，是看到報上一則徵「護士」的啟事而來的，啟事是：「供吃、住，不需經驗。」

她進入一個這樣的女醫師診所，見到那位所謂院長，院長是女的。院長只跟她談了三分鐘，她便被錄用了。院長還向她說，只要好好用心學，很快就有「晉升」的機會。

上班頭幾天，她只做些清洗器械的工作，一星期後，院長便命她進入手術室，看她如何為人刮子宮，半個月後的一天，院長便把手中的器械交給她，要她替一個看上去只有二十歲的女孩子刮子宮，她的手一直發抖，實在沒有法子做下去。院長一面接過器械，一面對她說：「頭一次難免緊張，以後多做幾次就習慣了。」

王小姐為此事非常不安，同一寢室的另一位「女醫師」是過來人，不斷安慰她說：「這沒什麼了不起，等你穿上白袍，變成醫師之後，便沒有這種感覺了。」

可見開業婦產科診所中，密醫、密護士所佔的比例相當的多。這些診所所謂主持手術的「醫師」，都是沒有醫師執照的，更不要說曾受專科訓練了。據說他們租個執照，請個助產士，就可以開張營業。生意做開以後，不愁沒有病人上門。

怪不得在大醫院急診處上班的醫師，一天到晚接到轉醫該處的危急病人。

但是，更倒楣的是病人，她們接受手術之後，如果發生意外，很可能連命都送掉；如果合併症並不那麼急，她們便往往不去就診，也不敢告訴別人，因為她們也犯了法。但是，病根拖了下去，以後却往往造成後遺症，譬如慢性炎症、不孕症……等等，那時再後悔便已太遲了。

在台灣，墮胎尚未合法化，未婚就懷了孕及子女過多却避孕失敗的婦女，只好求諸於這樣的診所，來替她們墮胎；還有那些根本就沒有懷孕，只是經期遲了幾天，却擔心已經懷了孕的婦女

，也無緣無故地接受了不必要的手術。這些手術，真不知造成多少悲劇。求診者在這些地方，生命與健康，那裏會受到保障？

省立台南醫院的婦產科醫師林茂表示，不管用什麼方法避孕，失敗的可能，仍然高達百分之二十五。即使所有的婦女都在很努力地避孕，仍然有失敗的時候。那麼遇到失敗的時候，為什麼不能讓他們在合格的醫院，接受正式醫師的墮胎，而要逼她們去求助於設備不全的密醫，冒生命及犯法的危險墮胎？

未婚媽媽是一個事實，並不是墮胎合法就存在，墮胎不合法就不存在的問題。

人口的壓力是一個更嚴重的問題。一九七九年台灣增加了四十二萬人，平均每一天有一千二百個嬰兒出生。這種人口增加的速度，已經使台灣地區的人口密度直逼每平方公里五百人，為全世界之冠。

專家紛紛表示：「人口問題已經到了危急的地步，再不迅速採取有效措施抑制人口膨脹的速度，辛辛苦苦得來的經濟發展，恐怕要被『吃光』了。」

其實不是專家也看得到，如果人口問題再不解決，不但經濟發展會被吃光，恐怕連存糧都不夠大家吃哩！

台灣推行家庭計劃已有十多年，但是，由於某些觀念沒法獲得大家的認同，例如「重男輕女」的觀念沒法消除；「養兒防老」的觀念沒法受到淘汰；「傳宗接代以男性為延續」的觀念仍然是傳統……等等，都使家庭計劃的實施，遇到相當大的阻礙。也因此，家庭計劃多年來並沒有明

顯的成果。

一九八〇年底，台北市家庭計劃中心主任江千代說：「今年人口的自然增加率，不但沒有降低，反而有增加的現象。」

准許婦女公開墮胎，雖然並不能解決所有上述的問題，起碼不會讓這些問題變得更惡化；不會使密醫更加濫用月經規則術；不會培養更多密醫、密護士來殘害我們的女同胞；不會產生更多的新的醫療問題及社會問題。

同時，當墮胎合法化之後，墮胎的問題可以擺在桌子上談，可以在媽媽教室談，甚至可以在中學的生理衛生課裏談，對糾正古老的錯誤觀念，必然更有助益。

台灣省家庭計劃研究所最近也公開表示，鑑於大多數婦女贊成墮胎（事實上已在實行），以解決意外懷孕的問題，希望政府早日通過立法，使墮胎合法化，使墮胎的婦女在接受手術時獲得良好的醫療照顧。

以前曾經有好幾次，有人提出「墮胎合法化」的提案，送請立法院通過，結果都被立法院否決了。今年，「優生保健法」的提案又已送到立法院去了。希望各位立法委員們，睜大眼睛看看受苦的女同胞們的遭遇（懷孕生子應該是男女雙方同負的責任，為什麼只讓女同胞單獨地受苦？真不公平。），拿出良心，通過這條法案，使女性的健康更有保障。

如果先有那麼一條法律，規定所有意外懷孕所生子女，統統由政府負責撫養及教育至成年，那麼，墮胎立法化的提案，可能便不會受到耽擱，很快便獲得通過了。

誰說癌是絕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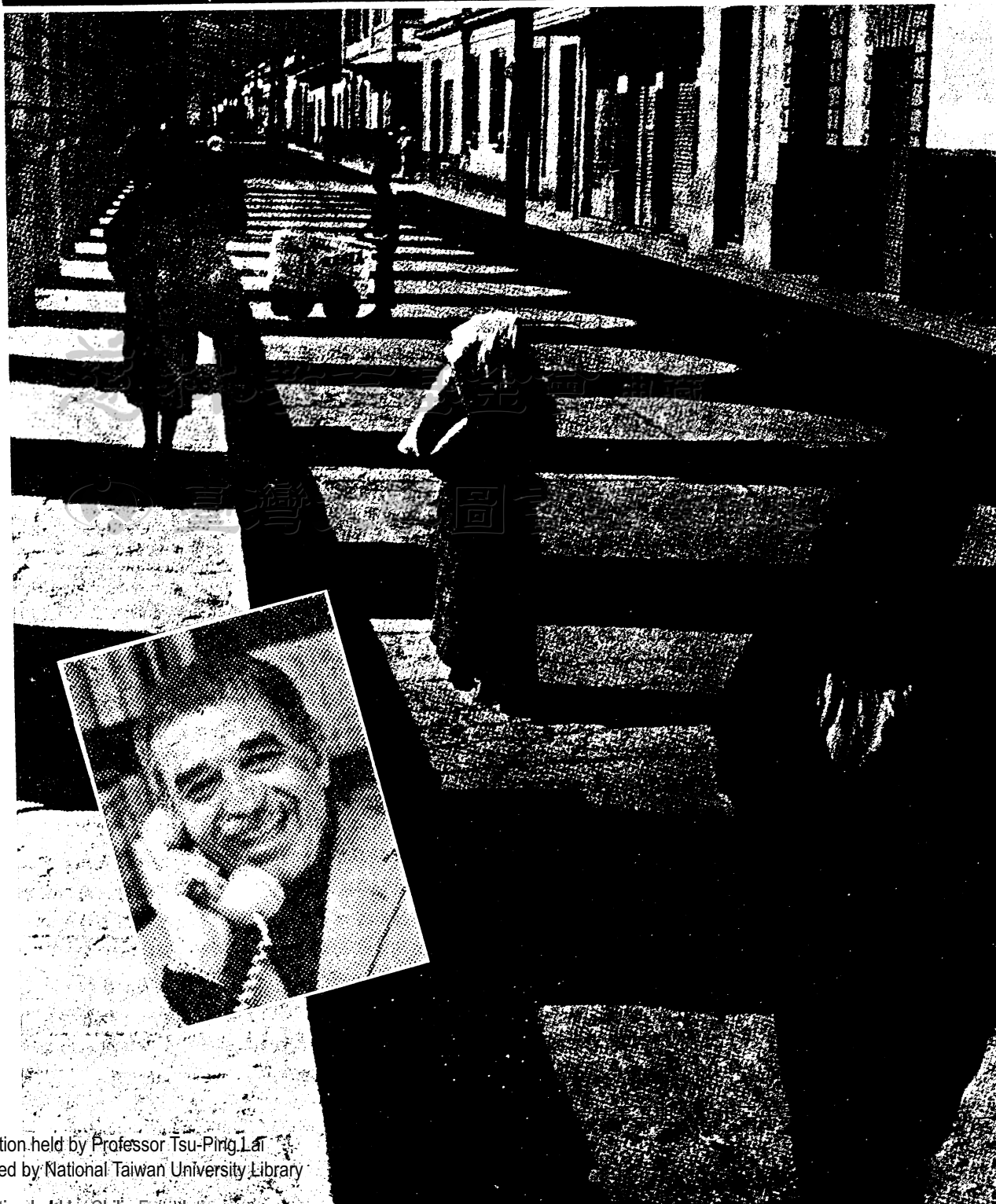
十四年前，年輕的李豐醫師得了癌症，她不但勇敢、堅強地活了過來，而且活得有聲有色。遇到癌症病人，她往往以自己的例子來鼓勵他們。而且，還以自己的經驗為經，以專業醫學知識為緯，陸續寫下數十篇防癌、剷癌的文章，結集成書，共分「癌是什麼？」、「癌不是突然發生的」、「癌也是心病」三大部份，深刻感人，值得所有關心癌症的人一讀。

著者／李豐醫師 定價／八十元
出版／健康世界雜誌社 郵撥／106474號

願我的書，使人們更相愛！！

——198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奎斯訪問記

絮 軒 · 譯 / 原載：美國「花花公子」
月刊1982年2月號



原序（節譯）

加西亞·馬奎斯（Garcia Marquez）是拉丁美洲「魔幻寫實」（magic realism）文學流派的頭號實踐家。魔幻寫實把幻想和現實混成一種獨一無二的新世界（New World）的講故事方法；他有關拉丁美洲一條村莊的人生愛情和革命的小說傑作「百年孤寂」（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被譯成卅多種語言，至今已售出二百多萬本；該書在美國大學校園被奉為經典；加西亞·馬奎斯榮獲諾貝爾獎以前，早已囊括幾乎所有有價值的國際獎。

除了文學有成，加西亞·馬奎斯也是一位政治活動家，主張第三世界，尤其是拉丁美洲實施社會變革。他與許多世界領袖是好友，包括古巴的菲特爾·卡斯楚和法國主張社會主義的總統法朗斯瓦·密特朗。他的觀點和背景使得他在美國成為爭論性的人物。

「百年孤寂」（英文版）一九七〇年在美國初版後，論者爭相把加西亞·馬奎斯譽為天才，接著是一九七五年的「族長之秋」（the Autumn of the Patriarch）（在美國初版）。

「族長之秋」是一部狂放的超現實主義作品，講的是一個在位年月長到無人記得他當年如何上台的拉丁美洲獨裁者。今年四月，（美國）諾夫（Knopf）出版社將會出版他的新作「一項預知死亡的記述」（Chronicle of a Death Foretold），一個有關性、謀殺和報應的故事。

馬奎斯一九二八年生於哥倫比亞濱海的村莊阿拉斯卡塔卡（Aracataca）。成長的環境使他成為一個自然而然的講故事能手。他總是說，阿拉斯卡塔卡是強盜和舞女的樂園。馬奎斯小時候，他的祖父告訴他許多戰爭、不義和政治的真人真事。他的祖母在牀邊給他講怪力亂神的故事。

早在十八歲那年，加西亞·馬奎斯就知道，一本有關拉丁美洲的巨著正在他心裏蘊釀。他年輕上波哥大大學（譯按：波哥大是哥倫比亞的首都。）唸法律，其後亦以法律為生。直至四十年代後期才放棄法律，以寫作和當記者勉強糊口。五十和六十年代，他在巴黎、羅馬和加拉加斯（

委內瑞拉首都）過著遊離浪蕩的記者生涯，包括擔任古巴的通訊社當定量工作的通訊員。一九五八年，他回國轉了一圈，和同年戀人默塞迪斯·巴查結了婚。加西亞·馬奎斯不替報紙寫稿時，就寫小說：「葉的風暴」（Leaf Storm）、「沒有人寫信給上校」（No One Writes to the Colonel）、「罪惡時辰」（In Evil Hours）和「大娘的喪禮」（Big Mama's Funeral）。時下有些學者將上述早期著作視為「百年孤寂」的初稿。一九三五年，自由職業作家加西亞·馬奎斯遷居墨西哥城，負擔著妻子和兩個兒子的生活。在墨西哥城，「百年孤寂」的構思終於開花結果。

自從「百年孤寂」（西班牙文原文版）在一九六七年面世至今十多年來，加西亞·馬奎斯瞬息間被高抬起來，享有大明星和政壇聞人專有的財富、政治影響力和國際聲望。加西亞一家現在在巴黎和墨西哥城都有雅緻的寓所。加西亞本人則利用其影響力，成為拉丁美洲流亡份子的非正式大使，他對他的聲望故置之不理，但無能為力。他說：「我討厭被人當作觀賞的對象」。

代表「花花公子」月刊訪問馬奎斯的克羅迪婭·德賴弗斯（Claudia Dreifus）寫道：「說是加西亞·馬奎斯行踪隱秘算是客氣了。他不回信的，擔心他的信會被拍賣。他的電話似乎一年到頭都失靈。我寫過信去他在巴黎的好幾個通訊地址，定期打電話給他在西班牙的經理人，均如石沈大海。」

「一九八一年三月，他有一次痛苦的經歷：哥倫比亞軍政府竟把他和當地一個卡斯楚式的游擊組織牽連在一起，使他逃離家鄉。在美國，他和國務院又有麻煩。國務院由於他和卡斯楚的關係，只發給他有限的美國入境簽證。」

「順便要說的是，我們（譯按：指與馬奎斯）有關拉丁美洲政治的談話發生在薩爾瓦多登上（美國）報紙的頭條，而去年夏天的福島衝突未爆發和尼加拉瓜未進入新一輪的緊張局勢之前，閱讀這篇訪問時，得瞭解當時的時事背景。」

在訪問中，德賴弗斯女士用英語發問，馬奎斯以西班牙語回答，而由派翠西亞·紐肯默女士翻譯。訪問的地點是巴黎的馬奎斯寓所。馬奎斯夫人有時在場聆聽。

最偉大的美洲小說家

花花公子：自從「百年孤寂」出版後，你獲得許多文學獎。有人把你和諾貝爾獎並論，「紐約時報」的約翰·連勒曾經說：「最偉大的美洲小說的作者是一個拉丁美洲人。」有鑑於此，由於你和（美國）國務院之間的問題，使你每次想來美國走走都很難取得入境簽證，這是否令你啼笑皆非？

馬：首先，最偉大的美洲小說的作者應是赫曼·梅弗爾〔Herman Melville，譯按：名著「大白鯨」或稱「無比敵」（Moby Dick）的作者〕。至於說我的問題，你說得很客氣，那是因為我的觀點，我的觀點不是什麼秘密。這很討厭。似乎我在額上有個記號。這是不應該的。我是北美洲文學的出色宣傳家。我對世界各地的聽眾都說，北美洲的小說家是本世紀的巨人。而且，由於拉丁美洲的影響，我的作品也是這項影響的一部份，美國正經歷著一場偉大的文化變遷。應該讓我更自由地參與。

花：為什麼不讓你自由參與呢？

馬：整個事件源出於一九六一年，我在紐約為古巴通訊社工作。我連分社主任也不是。自從那時候起，我和我太太想到美國走走，就有人告訴我們，我們「無資格入境」。一直到一九七一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頒給我一個榮譽學位。此後，我取得過某種使我感到缺乏安全感的有條件簽證。這是國務院安排的把戲。可怕的是，國務院喜歡的時候，可以隨時結束這場把戲，把我永遠拒諸美國的門外。今天，沒有一個有文藝修養的人能夠不經常到美國走走而生存下去。

花：儘管你有簽證的問題和據說有左傾觀點，你顯然真的很喜歡美國人和美國文化。

馬：是的。美國的人民是世界上我所最敬佩的一個民族。我唯一不了解的是，美國許多事都辦得很好，為什麼却選不出一個比較像樣的總統。不過這些我們可以以後再談。我注意到，你還沒有問我那個所有訪問者都劈頭就

問的問題。

花：這個問題是什麼？

馬：你沒有問我是不是共產黨。

花：我們想讓讀者自己去判斷。由於麥卡錫時代，（譯按：五十年代初期，美國舉國追查共產黨和左傾份子的時代）問別人這個問題在美國會被人認為居心不良。

馬：是呀，不過「花花公子」的讀者會感到奇怪，你倒底為什麼不問這個問題。

花：好吧。你是不是共產黨？

馬：當然不是。我現在不是，也從來不是。而且我從來沒有加入過任何政黨。我有時候感到，在美國，有一種傾向，想把我的作品和我的政治活動割離——就像兩者是對立似的。我不認為兩者是對立的。問題是，作為一個反對殖民主義的拉丁美洲人，我的立場觸怒了美國不少（在拉丁美洲）有利益的人。由此，有人把問題簡單化，說我是美國的敵人。我想糾正的是整個美洲（譯按：指北美洲和拉丁美洲作為一個整體。）的問題和錯誤。如果我是北美洲人，我也會這樣看的。真的，如果我是北美洲人，我會更激進，因為這一來，必須糾正的是我本國的錯誤了。

花：順便問一句，為什麼你說到美國時，總是說北美洲？

馬：美國人把阿美利加（America）這個字當作他們的禁樹，（譯按：美國人習慣把自己稱為「American」。按字面的解釋，「American」意為美洲人，應包括北美洲人和拉丁美洲人，而非僅指美國人。）似乎只有他們才是美洲人，這使我有反感。事實上，美洲始自南極，終於北極。美國的居民把自己叫做阿美利加人，也就說明，他們認為只有他們才是美洲人。事實上，他們是一個無名國的居民。

花：這是什麼意思？

馬：沒有國名。他們應當起個國名，因為他們現在沒有國名。世上有墨西哥合眾國，巴西合眾國。但什麼是合眾國（United States）？什麼合眾國呢？（譯按：美國全名為“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譯為美利堅合眾國。然美國對外自稱時往往省去“

of America”，而僅稱“United States”，即合衆國。馬奎斯表示，世上以合衆國為名的國家不只美國一個，為何只有美國可自稱合衆國，其他則須簡稱其原國名，例如巴西、墨西哥等。）你得記住，我這樣說是愛之深責之切。正如我所說的，我愛好北美洲的文學。我唯一加入的筆會是美國的。美國的（文學）批評家最了解我的作品。

但是，當北美洲的人把美洲這個字當作禁礙，身為一個拉丁美洲人，一個忠於拉丁美洲的人，我無法不感到憤慨。在我的心目中，美洲就像一條船，有頭等 遊客艙、底層艙和水手。我們拉丁美洲人不願呆在底層艙，而北美洲人呆在頭等。我們也不願意弄沉頭等，因為這一來，整條船都會下沉。我們——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的歷史任務是一起駕駛整條船。再者，古巴也是這條美洲船的一部分。我有時這樣想，如果古巴人能弄來一條駁船，把自己拖到別的地方去，而不是呆在（美國）佛羅里達州海岸外九十哩的地方，今天的古巴也許會穩妥些。（譯按：指不致受到美國的敵視。）

花：假使我們有移山倒海的能力，還有那些是應該搬動的？

馬：如果我們有這個能力，也許應當把河和海搬到有需要的地方去。世界是這樣的不公平。不管怎樣，這也已經發生過了，不是嗎？拿走了半個墨西哥，搬到美國去了。美國對波多黎各也是如此——我們對它懷念極了，因為那是一個拉丁美洲國家。（譯按：波多黎各在民族和語言上均較接近拉丁美洲，現隸屬美國。）東歐許多國家也有同樣的遭遇。我不想給你一個（拉丁美洲）地方派性很強的印象。

花：你是否曾經在一九六一年，作為一個幾乎不名分文的窮記者，乘長途公共汽車旅行美國南方？

馬：是的，當時我剛讀了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譯按：美國作家，一八九七——一九六二年。）的作品，對他十分敬佩，因此就乘——你們叫那做什麼？——「灰狗」（譯按：美國最大的長途公共汽車公司名字）

，從紐約下到（美國）和墨西哥的邊境。我乘公共汽車是爲了透過福克納描述的灰塵滾滾的小路看看美國——也是因爲我幾乎不名一文。

花：對那地區印象如何？

馬：我看到的和我鄉下，哥倫比亞的阿拉卡塔卡很相似。阿拉卡塔卡是美國聯合水果大公司建的廠鎮，也有用鋅和錫片搭成屋頂的那種棚屋。我記得，在福克納的鄉間，看到路旁的小店，人們坐在店門口，腳蹺在欄杆上。兩地有同樣的貧富懸殊。使我多多少少感覺到，由於加勒比海地區對（美國）墨西哥灣（沿岸地區）和密西比河流域的巨大影響，福克納同時也是加勒比的作家。

花：我們會詳細談你的作品，不過讓我再多問幾個有關文學和政治的問題，你迷戀兩者之間的關係是嗎？

馬：使我迷戀的是文學和新聞學之間的關係。我初出道是在哥倫比亞當記者，至今未完全結束記者生涯。我不寫小說時，就全世界到處跑，操練我的記者技巧。要是我告訴你，我所有的新聞都搞，除了個人專訪以外，你一定會感到有趣。專訪個人，負責採訪的記者事先要做太多的工作。不過回到你的問題上去，事實是，由於我的小說的成就，我舉世知名——但是，我是一個拉丁美洲人，而考慮到拉丁美洲的現況，對政治冷感也就有罪了。如果我來自世界另一個角落，那裏沒有拉丁美洲那種巨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我很可以不管政治，找個希臘小島快活逍遙。可是，我實在是一個拉丁美洲人，因此我除了當一個應急的政治人物，別無選擇。

「應急的政治人物」

花：應急的政治人物作些什麼？

馬：以我個人來說，首先，我不強烈支持任何一個黨派。我也不只介入某一個國家的政治，我覺得我是一個最廣義的拉丁美洲人。我就以這種身份，利用我的國際聲譽，進行我所謂的官方外外交。我在歐洲和拉丁美洲政府

的高層都有朋友。

花：讓我們談談你很有名的一項交情——和菲特爾·卡斯楚的。你們關係很密切，是嗎？

馬：我們是好朋友。我們之間的交情是知識分子之間那種關係。世間可能沒有多少人知道，菲特爾是一個很有修養的人。我們在一起的時候，談很多文學的問題。菲特爾是一個了不起的讀者。事實上，我們之間的交情是在他讀了「百年孤寂」以後開始的，他很喜歡那本書。

花：卡斯楚曾經說：「加西亞·馬奎斯是拉丁美洲最有權勢的人。」如果這句話是貼切的，你覺得他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馬：這不像是卡斯楚的語氣。不過，假如他真的這樣說過，我肯定他是指我作為一個作家，而不是一個政治人物而說的。

花：你是說，你和他不談政治嗎？

馬：呃，那當然是不太可能的。不過我們真的不太談政治。大多數人覺得很難相信，我和菲特爾·卡斯楚的交情幾乎完全是基於對文學的共同興趣。我們之間的談話很少是關於世界往何處去的。我們更多的時候是談我們讀到的好書。

我每次去古巴，總給菲特爾帶去一大疊書。通常，我一到古巴，就把書交給菲特爾的助手，然後辦自己的事。過了幾個星期，我與菲特爾終於有機會談話時，他已經讀完了我給他的所有書，話題滔滔不絕。記得有一次，我留下一本布蘭·史托克著的「吸血僵屍」(Dracula)。這是一本好極了的書，但知識分子看不起那種書。呃，我有一天晚上把這本書帶給菲特爾——大約是半夜兩點鐘。菲特爾總是在那種怪時間見你。他的生活就是如此。那天晚上，他有很多重要的國家文件要看要考慮。呃，我們談了大約一個鐘頭，接著在第二天中午又見了面。他說，「加布利爾，你可把我給迫慘了！那本書；我一分鐘也沒睡過。」他從早上四點鐘到上午十一點，一口氣看完了「吸血僵屍」。這就是他的性格中很少人了解的一面。我們之間的交情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與一般人所說

的相反，我們從來沒有在一起搞政治陰謀。

菲特爾認為，作家的責任是寫作，不是搞陰謀詭計。

花：但是，就像你所說的，人們認為你的確和卡斯楚搞政治陰謀，是嗎？

馬：我的國家哥倫比亞，在政府裏是有些人這樣看。但是讓我老實告訴你我和菲特爾的交情吧，因為要澄清有關的各種誤解，也許該從這裏開始。我就選一個我認為是典型的故事開始吧。

一九七六和七七年，我到安哥拉(譯按：原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獨立，外界指責卡斯楚派遣大量軍隊參與當地的獨立戰爭，而且在該國獨立後仍不撤出。)採訪，寫了一連串報導，刊登在「華盛頓郵報」上。從安哥拉回家途中，我在古巴歇歇腳。呃，在(古巴首都)哈瓦那，路透通訊社和法國新聞社的記者想訪問我。我對他們說，我七點鐘要飛墨西哥，他們最好是四點鐘到旅館來。三點半左右，菲特爾突然跑來找我談話。因此，當記者們四點鐘來到時，旅館職員告訴他們，他們不能見我，因為我和菲特爾在一起。

我用了十分鐘，對菲特爾講了我對安哥拉的印象，然後不知怎樣——大概我們正談到安哥拉的糧食不足——他問我在那裏是否吃得很差。我說，「對我來說還過得去。我還弄到一罐魚子醬，好開心。」因此菲特爾問我是否很喜歡魚子醬。我說，「很喜歡。」他說，那完全是出於一種文化和知識分子氣的偏見，他不認為魚子醬是那麼美妙的食物。呃，這一來就帶出了一連串的話題，我們談食物一談就是幾個小時——龍蝦，魚，怎樣煮魚。這位仁兄對海鮮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因此，到我該上機場的時候，他說，「我送你上機場。」到了機場，菲特爾和我坐在貴賓室裏繼續大談魚經——飛機停在那裏等我。

花：哈瓦那飛機場有貴賓室？這聽來不太像社會主義嘛！

馬：這是社會主義。事實上，那裏有兩個貴賓室

。不管怎樣，記者追著我們到了機場，顯然是彼此在說，「加西亞·馬奎斯剛從安哥拉回來，菲特爾又親自送他上機場，兩人一定是在談很重要的事！」因此，我上飛機的時候，記者們追到機艙門口說：「你走以前千萬告訴我們；剛才好幾個鐘頭你和菲特爾到底談了些什麼？」我說，「我還是不說的好。如果我說真話，你一定不會相信的。」

花：你是如何和卡斯楚這種人保持私人關係的？

馬：這顯然是不容易的，因為我們的交情是受到局限的。菲特爾沒有幾個私人朋友。當然，由於他的職位和權勢，這是無可避免的。有一次，有人問他——我當時在場——他是否感覺到當權者的孤寂。他說沒有。但是，我還是懷疑，權貴是否會感到孤單。

花：關於你的一項傳說是，在把小說的稿子交給出版商以前，你讓卡斯楚先看過，有這回事嗎？

馬：呃，我最新的一本書「一項預知死亡的記述」，是的，我把手稿寄了給他。

花：他喜歡嗎？

馬：菲特爾嗎？他喜歡！我寄給他，因為他是一個很好的讀者，精神異常集中——而且因為他很細心。他在讀過的書裏，很快就指出前後後的矛盾。「一項預知死亡的記述」的結構精密得像鐘錶的構造。如果書裏出現一個錯誤，一個前後矛盾，就會很嚴重。因此，知道菲特爾眼光銳利，我讓他看我的原稿，希望他能抓到其中矛盾的地方。

花：因此你把古巴總統當作文字推敲者？

馬：不，當作第一位好讀者。

花：就以你對卡斯楚的了解，你對於美國可以做什麼——或者應該已經做了些什麼——以改變和古巴的關係，有什麼看法？

馬：是呀。我十分相信，在吉米·卡特連任（美國總統）的計劃中，其中一項是解決美古關係的問題。他會撤銷禁運，恢復正常關係，終止（古巴）流亡分子對古巴的騷擾。雷根一上台就把政策倒回來，我很肯定，卡特會以（前總統）約翰·甘迺迪被刺前想用的方法來解決美古敵對的問題。毫無疑問，甘迺

迪當年想解決古巴問題。

花：以你看來，為什麼歷來這許多美國總統一包括甘迺迪在內——都在古巴問題上糾纏不清？

馬：有兩個原因。首先，古巴從前實際上是美國的一部份，完全是，完全是美國的屬地。一當古巴的革命被證實為一場真正的民族和社會革命時，對控制著古巴的北美洲財經利益是一項難以置信的損失。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在古巴問題上）糾纏不清的第二個原因。在古巴以前，拉丁美洲所有的革命總是或遲或早重新落入美國的控制下。古巴改寫了拉丁美洲的歷史。

花：也許是的，不過那只不過把依賴美國變成依賴蘇俄而已。

馬：那其實有相當一部分是人為的，美國的經濟封鎖引起的。古巴人運氣很好，正當他們需要援助時，蘇俄給他們提供了，因為美國想餓死他們。不過，這並不等於說，這個局面不是人為的。一個國家要像古巴那樣，所需要的能源無終止地從一萬四千里外運來，那是不可能的。每隔卅二小時就有一艘超級油輪開抵古巴。呃，這個現狀必須改變。如果美國承認古巴有權按照自己的方式革命，承認他們的這項權利，情況就可以改變過來。

北美洲很多人不了解的是，古巴對美國的人民有很深的感情。如果結束封鎖，（美古）關係會很好的。譬如說，在美國，時常聽到宣傳說，蘇俄文化如何影響古巴。我相信，美國對古巴的文化影響還要強得多。記得有一天晚上，和一位歐洲記者在哈瓦那泡酒吧。他正在大談蘇俄如何難以置信地控制古巴，酒吧裏有個男子在彈鋼琴。我們談了兩個小時，結束時，我對那位記者說，“你有沒有注意聽那位鋼琴手彈的音樂？”怪的是，他沒有彈過一首蘇俄的曲子——都是北美洲的音樂。我希望美國人認識到這點。

花：你的一本有關古巴的非小說作品，由開始動筆到今寫了三年了。傳說你決定不出版那本書。為什麼？

馬：話說來很長。那本書我已經寫了好幾年了。

我每次去古巴，就發現我從前寫的已經過時了。古巴的實況變得很快。最後，我決定暫停那本書，直至古巴的情況正常下來，才寫完出版。

花：一九八〇年五月廿二日的「紐約時報」說你對一位記者說，你決定不出版那本書，因為書裏對古巴批評得太厲害。

馬：好吧。我所寫的是一本很不客氣很坦白的書。很容易被人斷章取義，用來反對古巴。我不想看到這種情況出現。但這並不是我暫不出版那本書的原因；我想等發生國際大事——也許美國撤銷禁運——才寫完它。

花：（你的）另一位權貴朋友是法國總統法朗斯瓦·密特朗。你是不是他的拉丁美洲事務非正式顧問？

馬：你是說“顧問”嗎？不是的。密特朗總統在拉丁美洲問題上不需要別人出主意。他有時候需要些資料。那時候我們就談談。

花：前一陣子，巴黎因為決定對尼加拉瓜的左翼政權提供軍事援助，和華盛頓有過衝突，你們談的是不是這一類的事？

馬：決定賣軍火給他們？不。這類決定顯然是十分、十分機密的。但是在尼加拉瓜尋求的商業和經濟援助上，而又是我所了解的，（我們會談到。）尼加拉瓜現在當權的，他們是（我的）好朋友。他們和蘇慕薩（譯按：統治尼國達四十五年的獨裁者。）政權打仗的年頭，我們一起工作過。如果你想知道我在尼加拉瓜，進而實際上在整個中美洲的局勢上對密特朗總統說過些什麼，我很願意給你覆述一遍。

花：麻煩你。

雷根的自說自話

馬：我的看法是，拉丁美洲，尤其是中美洲的大問題在於雷根政府把所有事情都解釋為蘇美動態的後果。這是很荒謬的。也不合實情。在雷根政府的眼中，拉丁美洲人民不願意遵循固有秩序，是由於蘇俄某種活動，而不是

那些國家內部慘狀的最終結果。雷根政府由於抱著這種想法，因而導出了一種自說自話的預言——就像六十年代初期甘迺迪對古巴那樣。我碰巧和尼加拉瓜的現政權很熟，知道他們正致力建立自己的制度——不依賴任何世界強權。不幸的是，尼加拉瓜目前正面對各式各樣的內部陰謀，以宏都拉斯為基地的蘇慕薩舊部的襲擊，以及美國資助的勢力動搖其政府的企圖。同時，尼加拉瓜亟需糧食、發展和自衛。如果西方拒絕給以援手，他們將被迫向唯一願意向他們提供援助的政府——蘇俄求助。

花：你對薩爾瓦多的局勢怎麼看？你是否認為，雷根也把它當作蘇俄加強活動的證據？

馬：我認為，美國政府希望中美洲出現它所能夠控制的政府。幸虧——或者，視乎你的看法，可以說是——除了戰爭，美國沒有其他方法可以達到這個目的。要了解雷根的動機是很難的。他一定知道，他所提出的說法——薩爾瓦多是蘇俄陰謀的受害者——不可能是真的。如果他真的不了解這點，局面就危險了，因為這表示美國總統所得的消息完全錯誤。不，我比較相信，雷根和他的顧問是在玩政治把戲。

花：你是否相信蘇俄是擴張主義者？

馬：我相信，蘇俄會利用機會從中獲利——尤其是當美國拒絕支持反對現狀的一方。但是回到薩爾瓦多的問題去，那是一個很危險的局面。當你考慮到各種可能的發展，你會認為世界大戰也許就要爆發了。首先，我所講的不是在薩爾瓦多一個國家爆發戰事。如果美國像介入越南那樣介入薩爾瓦多，這場戰爭會迅速蔓延到整個中美洲——可能會遍及整個拉丁美洲。是的，美國可能軍事介入中美洲，因為那裏愛國力很弱。然後，作為第二步，美國可能會以軍艦封鎖，防止古巴人助中美洲人一臂之力。雖然我不相信古巴會荒謬地向美國軍事挑釁，但若北美洲入侵，它肯定會起來自衛——這也是一個可能性。

花：你顯然很不欣賞雷根的外交政策，但你是否覺得，他的政策和前任的很不一樣。

馬：是很不一樣。卡特的拉丁美洲消息很靈通。他在位短短的幾年內，受到巴拿馬前任領袖，已故的奧馬·托里賀斯將軍的影響很深。托里賀斯是我最好的一個朋友，他們之間談到的許多事我都知道。譬如說，我知道，卡特和托里賀斯想一起為薩爾瓦多問題制訂一個談判解決的政治方案。卡特簽訂巴拿馬運河條約的政策朝著改善美國和拉丁美洲關係邁出了一大步。卡特致力爭來的巴拿馬運河條約，已證實是他的國際政策中最重要的成就。他簽署了這項條約，表明美國開始公道地和拉丁美洲打交道。此外，卡特的人權政策亦往往值得嘉獎。我承認，當他在位時，我以為他的人權政策是裝門面用的。但是，雷根上台後，我改變了看法。

卡特在任時，拉丁美洲獨裁者純粹出於心理因素，感到有人在監視他們，忐忑不安。在美國，權力結構從來不是一元的。因此，卡特任期內，國防部和中央情報局告訴獨裁者們不用擔心。同時又有國務院對他們說，他們得尊重他們國民的人權。這種兩面的信息使得獨裁者們缺乏安全感。由此，我們這些搞人權工作的能夠救回不少人。但是，雷根當選後，你們的（駐聯合國大使）玟·寇克派特歷克趕去智利，告訴（智利軍政府首腦）奧古斯托·畢諾切說，他的政府是屬於拉丁美洲所需的那種「獨裁民主政體」（authoritarian democracy）。自從她去過以後，畢諾切監獄裏的囚犯一個也沒有弄出來過！我們向阿根廷政府打聽一萬五千個失蹤的阿根廷公民的下落也沒有回音。卡特在最大的程度上收回了對獨裁者的支持；雷根給予他們的支持則超出了可能的程度。

花：你提到你在一九八一年因飛機失事喪生的托里賀斯的交情。他去世後，你是否得了胃潰瘍？

馬：誰告訴你的？

花：只是我們聽到的一個消息。為什麼這個問題這樣困擾你？

馬：因為我再也沒有私生活可言了。沒有一樣是屬於我私人的了。

花：呢，托里賀斯的去世使你得了胃潰瘍嗎？

馬：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我的十二指腸一直有毛病，一緊張就發作。好幾年前，潰瘍的部份出過血，但此後，自從我患病以來，從來沒有這麼久未復發過。但是，托里賀斯去世，我心情壞透了。他是很好的朋友。不，他不只是好朋友。我把自己當作他最好的幾個朋友之一。而且，他是拉丁美洲一個極重要的人物。而且，我差一點和他同乘那失事的飛機。你可以想像，這一切加起來使我的潰瘍再度出血。

花：你差一點乘上那架失事的飛機嗎？

馬：是的。失事前幾天，我突然想起，我從來沒有這麼久未見過托里賀斯。這使我有點不安。我覺得該找他談談，了解一下現況，就打電話給他，結果跑到康塔多島和他會合。事實上，我們住的屋子就是伊朗（廢）王住過的那間。

花：伊朗王恨之切骨的那間嗎？

馬：是的。那是我一生見到的托里賀斯心情最好的一次。他很努力處理薩爾瓦多的問題。他深信可以經過談判達成政治解決，而唯一的障礙是美國可能不合作。他說，卡特會接受談判解決，但雷根就不一樣。因此，在康塔多拉島呆了些日子後，我們飛到巴拿馬城。我們在一起消磨了些時間，然後他去了一個不知道什麼地方，留下話說，會派飛機來接我去和他會合。又過了一天，他還沒有回來，我決定回墨西哥去。我給他留了話，告訴他我改天再來，和他繼續談未談完的事。兩天後，他就失事去世了。如果我沒有回墨西哥，也就會乘上那架飛機——托里賀斯指定要我同行的。

花：你是否認為那次失事決不是意外？

馬：意外與非意外，機會均等。不過我願意說，我認為有不少疑點。

花：托里賀斯也許是你的朋友，不過美國報紙常常把他形容為軍事強人，也就是軍事獨裁者的代號。有些人覺得，「族長之秋」的作者和軍事強人成為摯友，好像有點古怪。

馬：呢，美國報紙說過很多事——有好，有壞，

有對，有錯。至於托里賀斯將軍，他是拉丁美洲一位最偉大的民族主義領袖。拉丁美洲歷史給他的評價將會很高。最重要的是，托里賀斯個性獨立，不受他人控制。不像許多其他的人，沒有人敢指責他是北美洲利益的工具。他把收回運河看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他成功達成了這個目標，必將使他成為拉丁美洲歷史中的一個重要人物，人民愛戴他。他去世後，從他的葬禮和由此在巴拿馬產生的激動可以看出，人們對他的愛戴比他所想像的還要深。我肯定，如果那些把他叫做獨裁者的北美洲人看到公眾對他的去世的深切悲慟，就會三思了。

花：你一定知道，有些美國人和歐洲人覺得，拉丁美洲政治無可救藥，你們的政治生活中一向帶有若干傷害人身的成份（譯按：指拉丁美洲常見的政治謀殺和派系武鬥。）

馬：是的。五十年代，我第一次到歐洲就碰上了。有人問我：「南美洲的人爲了政治原因彼此殘殺，這種野蠻的國家你怎麼能住得下去？」

花：你對此有什麼感受？

馬：很憤怒。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分析不很公平。我們的國家（立國）只有一百七十年；歐洲國家的歷史比我們長得多，經歷過比拉丁美洲時下的還要殘暴得多的時代。而今天却覺得我們野蠻，我們從來沒有出現過像法國大革命那樣殘暴的革命！瑞士人——善於釀製乳酪，自然爲偉大的和平主義者——在中世紀時曾經是歐洲最血腥的僱傭兵！歐洲人必須經過長期的流血和暴力，才成爲今天這個樣子。當我們也和歐洲國家一樣老時，我們會比今天的歐洲更先進，因爲除了我們自己的經驗以外，還有他們的經驗可以借鏡。

哥倫比亞政府的醜聞

花：你自從一九五五年就沒有在哥倫比亞住過。爲什麼？是不是因爲當作家都永遠回不了家？

馬：不，不，不。那並不是精心炮製的傑作，而是我一生中一連串的意外造成的。是的，的確，我現在半年住在墨西哥，半年住在歐洲。這要上溯到一九五五年，那年我離開了（古斯塔夫）勞哈斯·比尼拉獨裁統治下的哥倫比亞。我出國時，本來是去歐洲當記者。但是勞哈斯·比尼拉封閉了我的報館，我流落巴黎——我在那裏住了三年。其後，我回到南美洲，和默塞西斯結了婚，一起搬到委內瑞拉。我在那裏當記者。接著古巴革命後，我在古巴通訊社駐紐約辦事處工作。後來，我們全家搬到墨西哥，我寫電影劇本，又終於寫了“百年孤寂”。呃，一事接著一事，我根本沒有時間回去哥倫比亞住多過幾個月的。“百年孤寂”成功後，我有足夠的錢到任何我喜歡的地方去住。但是那時候哥倫比亞成了我的問題了。在哥倫比亞，我是國家的財產，國寶。所有哥倫比亞人都這樣對待我。我沒有半點私生活。不過，直至最近我出事以前，我還是不時回哥倫比亞——住一年半載。

花：最近出了什麼事？

馬：呃，哥倫比亞政府——就像其他幾個政府——不相信我和菲特爾·卡斯楚談的只是魚和海鮮。因此，一九八一年我在哥倫比亞的時候，出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我剛在兩三個星期以前在古巴見過菲特爾。有一天，我在哥倫比亞，一個叫做M—十九的左翼游擊組織在哥倫比亞南部登陸。政府抓到游擊隊後，要他們供認是我和菲特爾·卡斯楚共同策動的。說是我，我個人呀！幸虧我在波哥大有不少朋友，每逢有三個人以上同時聽到的事，其中就有一个人會告訴我。三個消息來源告訴我，有人企圖把我和M—十九扯在一起。顯然是總統府的一次晚宴，總統和軍事首腦都在場的場合上，討論我據說的和那個組織的關係。與此同時，游擊隊被關在牢裏，用刑迫供，要他們簽供詞，把我牽連進去。

呃，我一聽到這個消息，說是驚慌已經說得太輕鬆了。給我通風報訊的人叫我不必擔心

——政府不敢動我分毫的，我太重要了。但是我似乎覺得，政府可能想借用我來說明，我們對誰都不在乎。我於是立即到墨西哥大使館去，要求外交庇護，以便離開哥倫比亞。

這給哥倫比亞政府造成了一項大醜聞，它公開聲稱對我沒有惡意，也許我只不過是想藉此為我的新書作宣傳而已。此後，他們審過（被捕的）游擊隊員一次，其中幾個說受過酷刑迫供，要他們簽那份供詞。有一個簽了。因此，我正在控告哥倫比亞軍政府濫用權力。談這件事有點困難，因為這個訪問刊出時，哥倫比亞的政局可能已完全改觀了。

花：你不得不逃離哥倫比亞的時候，是否很驚慌？畢竟，行刑隊似乎已成了南美洲一個重要的體制。

馬：一點也不驚慌。哥倫比亞政府只不過是透過損害我來擺個姿態——如此而已。如果他們想殺我，在哪一個街口都行。不，他們想獲得的是另一些東西。雷根政府和他的拉丁美洲盟友想恢復六十年代初期，完全孤立古巴那種局面。如果哥倫比亞政府能夠證明，菲特爾的一個私人朋友曾經策動游擊隊登陸，也就有理由和古巴斷絕外交關係。事件發生後，他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這樣做了。

花：你似乎很肯定，雷根政府一心要追殺拉丁美洲的左派份子。如果，選出了一位左派總統，就說哥倫比亞吧，就像沙爾奧多·阿萊德一九七〇年當選智利總統那樣，你認為（美國）現政府還會搞垮它們嗎？

馬：我百分之百相信會如此。智利歷史重演，是的。卡特不會這樣做，但是雷根絕不遲疑。不過，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性不大。哥倫比亞今天的內部局勢和七十年代初期的智利不一樣。

「百年孤寂」—— 拉丁美洲的喻言

花：讓我們開始談談你的作品吧。有些「百年孤

寂」的崇拜者說，藉著講述勃迪亞家族的這篇故事，你講完了拉丁美洲的全部歷史。批評家們是否誇張了？

馬：「百年孤寂」不是拉丁美洲的歷史，而是拉丁美洲的喻言（metaphor）。

花：你的一個短篇小說「無辜的艾蓮迪拉和她善良的祖母難以置信的悲慘故事」中，一個年輕的妓女對她情人說：「我喜歡你的，是你胡說八道時那副一本正經的態度。」這不是加布里爾·加西亞·馬奎斯的自述？

馬：是的，那是如假包換的自傳式陳述。那不只是我的作品的定義，而且是我的性格的定義。我討厭嚴肅。我有這種本事，能一本正經地講述最殘酷或者最荒誕的事。這是從我祖母——我母親的母親——特蘭奎利拿夫人繼承過來的一種本事。她是一個了不起的講故事能手，講神怪故事的時候，表情一本正經。我漸漸長大，開始懷疑她的故事是不是真的。由於她一本正經，我往往還是相信她所講的。今天當了作家，我如法泡製；我以嚴肅的筆調講述怪事。只要你講得頭頭是道，任何事都可以混過去。這是我祖母教我的。

花：對於那些需要摘要講一下「百年孤寂」的故事的讀者，「百年孤寂」講的是一個神話中的村子麥康杜裏，勃恩迪亞家族六個世代的故事。故事從村子建成開始，說當時「世界一切都還那麼新，許多事物還沒有名字」。終於勃恩迪亞家族最後一個成員，剛出生的一個長著豬尾巴的男嬰，被螞蟻抬走，勃恩迪亞家族至此告終。在這期間內，麥康杜經歷了「香蕉熱病」、「失眠瘟疫」、三十二次內戰、革命、反革命、罷工和一場歷時將近五年的大雨。你以一種稱為魔幻寫實主義的手法講述這些事，把神怪和日常生活混在一起——譬如說，有一個神父喝巧克力奶時，身體會凌空浮起——那麼讓我們以這個問題開個頭，你的小說裏，有幾分是在現實生活中有根據的？

馬：「百年孤寂」每一行每一句，我所有的書，都源於現實。我提供了一個放大鏡，使讀者能更容易看清楚現實。讓我舉個例吧。再說「艾蓮迪拉」的故事。其中的一個人物尤里

西斯的手一觸到玻璃，玻璃就變顏色。這不可能是真的。但是已經有這許多人寫過愛情，我必須用一種新的手法表達這個孩子正在戀愛。因此，我讓玻璃變色，我讓祖母親說，「只有戀愛時才會這樣……對象是誰？」我只不過是換一個方式表達愛情這項老生常談：愛情如何擾亂你的生活，如何擾亂所有的一切。

「魔幻寫實主義」

花：過去二十年，拉丁美洲的魔幻寫實小說數量激增，到底是拉丁世界的什麼特性，促使作者們把現實和超現實狂放的混為一體？

馬：顯然，拉丁美洲的環境很不平常。尤其是加勒比海地區。我剛好來自哥倫比亞的加勒比海沿海。那是一個神奇的地方，和（哥國西部的）安第斯山區、高原地帶完全不同。哥倫比亞還是殖民地的時候，所有自認為有地位的人都移居內陸——到波哥大去。沿海只剩下強盜——俠盜——和舞女、冒險家，各種尋歡作樂者。沿海的居民都是海盜和走私者的後裔，加上和黑奴的混種。在這種環境中長大，也就有令人難以置信的詩歌題材。此外，我們加勒比海地區的人什麼宗教都信，因為我們受到多種不同文化的影響，再混入天主教和我們當地的信仰。我認為，這使我們除了眼前的現實以外，虛心探求更遠的境界。我在加勒比海沿岸的小村子阿拉卡塔卡長大的時候，聽說過許多奇事，說是有人只要看椅子一眼，椅子就會移動。阿拉卡塔卡有一個男子，只要站在母牛面前，就能驅除母牛肚裏的蟲——治好牛疾。他站在母牛面前，蟲子就會從母牛的頭爬出來。那是真的，我有一次親眼看見的。

花：你怎樣解釋這種現象？

馬：啊，如果我能解釋，今天也就不會把它當故事講給你聽了。我小時候看見就覺得很了不起，直到今天還是覺得了不起。

花：讓我們談談「百年孤寂」現實生活的一面吧

！你的祖母是否就是小說裏的女族長烏蘇拉·勃恩迪亞？

馬：呃，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她倆都是麵包師傅，而兩人都很迷信。不過，我（的小說裏）所有的人物都是由我所認識的人混合而成的。我從這個人的性格裏取一些，和其他人的部分性格糊在一起。至於說我祖母，自從我出生，到我八歲，我一直和她一起住在我祖父的屋子裏。我祖父的屋子裏很多女人——我祖母，我祖父的姊妹，還有其他女人。只有我祖父和我是男的。那些女人之迷信，簡直難以想像，狂熱——我所謂的狂熱是說她們富有想像力。我祖母特蘭奎利拿夫人最會講稀奇古怪的事，面不改容。我不太清楚她的祖籍是哪裏，也許是加利西亞。加利西亞是西班牙一個很奇怪的地區——很相信鬼神，宗教迷信氣氛很濃厚。在我祖母眼中，每種自由現象都有超自由的解釋。一隻蝴蝶從窗子飛進來，她就會說：「今天一定有信。」牛奶在爐子上煮沸溢出來，她就說：「要當心哪——家裏有人生病。」我小時候，祖母會在半夜喚醒我，給我講些嚇人的故事，說是有些人不知怎的，會預知自己的死期，又說死人顯靈，又有些死人沒有顯靈。我們在阿拉卡塔卡的屋子，我們那間大屋子，時常就像有鬼似的。所有這些早期的經歷，多多少少出現在我的文學作品裏。

花：能不能請你舉個例？

馬：當然可以，在「百年孤寂」裏，勃恩迪亞小姐的情人出現以前，一定先飛來一羣黃色的蝴蝶。這段情節的實際根據是，有一個電器匠到我們在阿拉卡塔卡的屋子來修理東西。有一次，他來過以後，我祖母在廚房裏發現一隻蝴蝶。她立刻用洗碗抹布給打死了。她就說：「那個人每次進來這間屋子，就有蝴蝶飛進來。」我祖母老是說這種話。她也時常買獎券，不過從來沒有中過。從來沒有。

花：你說她名叫特蘭奎利拿（Tranquilina）夫人，這是否有諷刺的意思？（譯按：tranquilina 在西班牙語中意為心境寧靜。）

馬：以一個狂熱的女人來說，她是很平靜的。她

的不安靜只是精神上的。她從來不匆匆忙忙的。

我祖父尼哥拉斯·馬奎茲剛好相反。他是整個屋子裏唯一與我交談的人。女人的世界——太古怪了，使我避之則吉。但是我祖父把我帶回到現實世界中，給我講實在的事物——報紙上的新聞，他在哥倫比亞內戰中在開明的一方當上校時的戰爭故事。每當我祖母或者我的姨媽嬌嬌說些異常古怪的話，他就說，「別相信那些，婦人之見。」我祖父爲人也很切合實際——我覺得我在這方面繼承了他。我的朋友們時常說，我是他們所知道的少數幾個切合實際的作家之一。這種切合實際的特性在我的政治（活動）上派上了用場。而且在日常生活上，我很注重安全。我盡量避免出意外——採取預防措施，以免發生意外。我寧願走樓梯，不坐電梯。如果有選擇，我寧願乘坐任何的交通工具也不乘飛機。這種實際感在詩人中並不常見。如果有一天，我當了家長，政治性的家長，也就是這個原因——並不是我有實際的權力。我的朋友總是向我請教實際的問題，而這是我從祖父那裏學來的。

花：你說你祖父給你講他的打仗經驗。那些故事肯定與你祖母的神怪故事同樣令你感到困惑吧？

馬：實際上，答案是不。他談到內戰時，就像是講述愉快的經驗似的一一年輕人扛起槍闖世界那種。完全不像今天的戰爭。啊，當然，內戰有很多可怕的戰役，死了很多很多人。但是在那段期間內，我祖父也有不少艷史，也生下了不少兒女。

花：「百年孤寂」裏的中心人物奧利安諾·勃恩迪亞，也就是荷西·阿卡迪奧·勃恩迪亞的兒子，他在三十二次內戰中和十七個女人生下了十七個私生兒女。尼哥拉斯·馬奎斯也有十七個（私生兒女）嗎？

馬：天知道。真正的數目永遠不會有人知道。直至十五年前，我所第一次見到的一些人，事後才知道竟然是我姨媽。據我母親說，（私生兒女的）數目是十七個。她是（我祖父）

正式結婚生下的兩個兒女之一。

花：因此，你祖父對於哥倫比亞內戰的美妙回憶，其實是那一切性的聯繫。

馬：呃，我猜，無論打仗還是太平，他都喜歡性。在我的記憶中，他是一個大私通者。

花：哦？

馬：就是道地英文所說的「禽種」（fucker）。

花：你祖母一定很光火。

馬：她在這方面倒很奇怪。我祖母是一個十分嫉忌的女人。但是一聽見生下了那種兒女，她的反應就像烏蘇拉·勃恩迪亞：把嬰兒帶回家來。我祖母說，我們家的骨肉不能流離浪蕩，失散掉。不管怎樣，她很疼那些兒女。我們的屋子裏，有一度根本分不出哪一個兒女是結婚生的，哪一個不是。我祖母也是一個很堅強的女人。我祖父出去打仗時，她整年沒有他的消息。她挑起家務和全家的生計。直至有一天晚上，有人敲門。天還沒亮，深更半夜的，有人說，「特蘭奎利拿，如果你想看看尼哥拉斯，到窗前來。」她於是跑過去，打開門，看到有人騎著馬經過，但是沒有看見祖父。只看見一隊馬出城而去。過了一年，她才再接到他的消息。

花：聽起來你好像很喜歡烏蘇拉這個人物。

馬：是的。她維繫著大局。這和我小時候在實際生活中所看到的剛好相反。我祖父家裏的女人往往不懂事故。但是我相信，一般來說，女人要比男人實際。充滿浪漫幻想，離家出走，盡幹些狂熱事的都是男人；女人知道謀生不容易。烏蘇拉就是那種典型的實際，維持家計的女人。烏蘇拉以下，我喜歡她的玄孫女阿馬蘭塔·烏蘇拉。在勃恩迪亞家族所有後裔中，她最像原來的烏蘇拉——但是沒有老女人那種情結和偏見。阿馬蘭塔·烏蘇拉是烏蘇拉再世——但是現在解放了，見過世面，有新思想。但是，生活在勃恩迪亞上校創立的氣氛中——保守派控制大局的氣氛下——不允許她發展自己的個性。拉丁美洲的歷史就是由一連串這種挫折構成的。

花：你祖父給你講戰爭故事的時候，有沒有告訴你一九二八年那次香蕉罷工？在「百年孤寂

」裏麥康杜那個也許就是聯合水果廠的香蕉工人、僱員舉行罷工。三千人被屠殺在麥康杜鎮的廣場上。屍體用火車的貨卡運去海邊。此後，麥康杜沒有一個人記得那次罷工；唯一記得的是勃恩迪亞。而對於他來說，回憶起罷工是他神經失常的原因。

馬：那段情節不是聽來的故事。那多多少少是基於歷史事實。罷工前後所發生的事，無論原因、動機和方式，都和小說裏一樣——當然，只是死亡的人數不是三千。死的人很少。如果一九二八年那時候死了一百人，也就是大災難了。我把死亡人數寫成三千，是因為我在書裏用了某些誇大的手法。一百個人沒有人會注意的。我還想造成某種意象：我要用火車，就像我們用來運香蕉的那種火車，運走屍體。我研究過，發覺要裝滿一列火車，至少要有三千個屍體。一九二八年的時候，三千人可能是全鎮的人了。

花：所以這就是你把非小說性的事物改造為藝術的方法？

馬：讓我告訴你關於罷工的一件大怪事吧。沒有人研究過真正的香蕉罷工事件——今天報紙上每次談到香蕉罷工，有一次甚至在國會裏，就說那次死了三千人！我心想，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天，三千人的數字積非成是。這就是為什麼在「族長之秋」中，族長有一次說，「現在不是事實不要緊，有一天會成爲事實的。」

花：「百年孤寂」是這樣開頭的：「許多年後，奧列利安諾·勃恩迪亞上校面對行刑隊時，這才回想起，很久以前的一個下午，他的父親帶他去看冰。」你的祖父尼哥拉斯·馬奎斯有沒有帶你去過冰？

馬：呃，有的。類似這樣。阿拉卡塔卡是一個熱帶小鎮——而像我那樣，在還沒有冰箱以前住在那裏，我從來沒有看過冰。有一天，我祖父帶我去聯合水果公司辦的商店——阿拉卡塔卡是香蕉中心——他指給我一個裝著冰和魚的板條箱。箱子裏那種不知名的東西好冷，在我看來就像是在沸騰。我用手摸摸箱子裏面，感到火炙似的。我對祖父說，

「可是這在沸騰哪。」他告訴我說，「不，剛好相反，那很冷。」然後他讓我觸摸那種東西——那就是冰。我一生中那段期間，總的來說我一生中，我只記得一些浮光掠影，而且也很少去分析它。我寧願享受它們給我留下的感覺。

花：你的小說充滿了氣味。

馬：是的。臭味。我認爲，在所有感官中，嗅覺是最能喚起人的，比味覺和聽覺要強。

花：你所有的文學作品中，都寫到一種近乎情慾的嗅覺，這是否你處理情慾的方法？

馬：是的。這是我個人的性格。

花：在所有官能享受中，那一種對你最重要？

馬：吃。

花：吃？真的嗎？為什麼？

馬：呃，出於感覺——沒法子解釋的。不過我最喜歡的是吃。

童年與祖父母

花：回到你個人的歷史，你怎樣會和祖父母住在一起的？

馬：這在加勒比海地區是很常見的。我的父母很窮。我父親是發報員。我父親想娶尼哥拉斯·馬奎斯上校的女兒時，她的家庭反對；人人都說我父親到處拈花惹草。因此，結了婚後，我父親跑到離阿拉卡塔卡很遠的一個小鎮做事。我母親懷了我以後，我祖父爲了表示和解，就說，「來我們家生小孩吧。」她很樂意地接受了。過了一陣，我母親回到我父親工作的村子去，因此我祖父就說，「把加布利爾留下讓我們帶吧。」我父母很窮，而且我剛剛說過，大家庭在加勒比海地區是很常見的。後來，我的父母回到阿拉卡塔卡，我還是和祖父母住在一起——和祖父母住大多數時間都很愉快。和祖父母一直住到我八歲，我祖父去世那年。

花：你是否有被你母親遺棄的感覺？

馬：沒有，我以爲這就是人生。也許，在另一種社會裏，我會感到被遺棄。但是在加勒比海

地區，和祖父母、姨媽、叔伯一起住是絕對正常的。的確，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對我母親很陌生。我還記得，有一天早上，大人叫我穿得整齊一些，因為我母親要來看我。在此以前，我對她毫無印象。我忙得走進一個房間，坐著很多女人。我感到很窘，因為我連哪一個是母親也不知道。她打了個手勢，我知道那是她了。她穿著一件二十年代的長裙，的確是二十年代的，低胸，戴著頂草帽。她看起來很像路易絲·布魯克斯（Louise Brooks）。接著她抱我，我很害怕，因為我覺得根本不愛她。我聽說，兒女應該很愛母親才對，而我竟然不愛，那就似乎有點邪惡了。後來，我父母搬到阿拉卡塔卡，我記得，我只是生病的時候才上他們的屋子去。我在那裏過一夜，給我吃點瀉油。不很愉快的往事。

花：你祖父的去世，是否使你很悲痛？

馬：不。我幾乎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況且，我當時只有八歲，根本不清楚什麼是死。出身天主教家庭，我也許以為，他上天堂去了，感到很滿足呢。

花：我們問到他的去世，因為你時常對訪問者說，八歲以後，就失去了人生樂趣。

馬：我的意思是，此後，我搬出去和我父母一起住，而我感覺到，我所有的作品都取材自我和我祖父母一起住那些日子的經歷的。

花：你今天的生活是否沒有你童年那樣多采多姿？

馬：少了點神秘感。沒有祖母給我編造神奇的故事了。

花：你童年的阿拉卡塔卡一定是一個很神奇的地方。

馬：我把它看作一個可怕的新興小鎮。那是（美國）聯合水果公司的一個香蕉中心——一個人們想把握一切機會發財的地方。但是，在這種地方，當它突然成了世界的十字路口，也就無可避免地充滿各種神奇怪誕的事。

花：奇怪，你會把阿拉卡塔卡形容為可怕的新興小鎮。你按照阿拉卡塔卡塑造的神話小鎮麥康杜，却被視為文學中一個最迷人的村莊。

馬：呃，事實上是，麥康杜是懷舊的產物。懷舊的好處是剔除了記憶中的往事一切不愉快的成份，只留下愉快的。

花：你是怎樣會想到從記憶中的阿拉卡塔卡塑造麥康杜的？

早期的寫作生涯

馬：呃，「百年孤寂」實際上在我很年輕——也許是二十歲的時候就開始了。我嘗試寫一本關於勃恩迪亞家族的小說，書名叫做「屋子」。整個情節從頭到尾都發生在屋子裏——完全沒有屋子外的情節。寫了幾章以後，我就感到，我還沒有能力寫這樣長的小說。我就決定，先嘗試比較容易的，逐步學習寫作。我多半是寫短篇小說。在那段期間內，我二十一歲那年，我母親叫我陪她一起回阿拉卡塔卡走一趟——那次回鄉對我的寫作生涯有決定性的影響。你知道，那時候，我住在巴蘭奎拿，離阿拉卡塔卡不遠的加勒比西海城市。我的祖父母都已去世。我母親想賣掉他們的屋子。

起初，我對於回阿拉卡塔卡的主意很興奮。可是，回到了鄉下，我感到很震驚。阿拉卡塔卡一點沒有變。我感到（上次離開阿拉卡塔卡），把時光給留在那裏了。分隔我和阿拉卡的不是距離，而是時間。因此，我和我母親在街上逛。我發現，我母親也有類似的感覺。我們走去一間藥店，從前的店主和我們家裏很熟。櫃檯後面，一位女士正在踏縫紉機。我母親說：「老友，近來好嗎？」那位女士終於認出了她，站起來。兩人抱頭痛哭。整整半個小時相對無言。使我覺到，整個鎮已經死了，那些還在生的也都死了。我記憶中的每個人還是當年的他們，現在他們都已死了。那天，我認識到，我以前所寫的短篇小說只不過是知識分子的吟風弄月，與我的現實毫無關連。我回到巴蘭奎拿後，立刻坐下來，以麥康杜為背景，寫成了我第一篇小說（葉的風暴）。順便提一下，那次回

鄉，我母親和我經過我小時候時常看到的香蕉園。園子外掛著一塊牌子，名字叫做麥康杜。

花：「百年孤寂」最後在你腦海中成形是什麼時候？

馬：我剛才說的那次回鄉大約是在一九五〇年。自從那次初次努力後，一九六三年，我在墨西哥第二次試寫那本小說。那時候，我對全書的結構有了比較明確的概念，但對筆調還不是太清楚。我還不知道怎樣可以寫得令人置信。因此，我又再寫短篇小說。但是，一九六五年有一天，我想是，我正乘汽車去（墨西哥渡假區）阿卡波哥。不知道怎的，我頓時醒悟，該怎樣寫那本書。悟出了筆調，所有的一切。

花：就像看到幻像那樣嗎？

馬：差不多是這樣。就好像我從頭到尾讀了一遍那本書。因此我回去墨西哥城，坐下來一連十八個月，每天從早上九點寫到下午三點。我當時有家，一個太太，二個兒子。我一向靠幹公共關係和改編電影劇本養活他們。既然要寫書，這一切都得暫停了。但是，這樣又沒有收入。於是，我就典當了汽車，把錢交給默塞迪斯。自從那時候起，默塞迪斯就不得不像哥倫比亞內戰時期的女人那樣：我征討（「百年孤寂」）時，她必須管家，維持家計。

她立下了許多了不起的大功。每天，不知怎的，她總保證我有香煙、紙和寫作必需的一切東西。她借了些錢。向商店賒賬。書寫完後，發覺我們欠肉店五千披索，當時這是一筆大錢。不知怎的，鄰居都傳說我在寫一本很重要的書，因此所有店主都很合作。有一次，我認識到，默塞迪斯不可能再一個人撐下去了。我於是動手寫劇本，就頭痛得難以忍受。沒有方法治得好——醫生們給我試過所有方法。

終於，我回去寫小說，頭痛立刻就好了。那本書寫了整整十八個月。但是我寫完後，我們還是有許許多多的問題。快寫完的時候，有一次，打字員帶著好幾章僅有的

一份書稿，被公共汽車撞到了。因此，全本書的僅存書稿在墨西哥城的大街小巷滿天飛。幸虧車子沒把她給撞死。她還能爬起來，把手稿一張一張撿起來，最後，大功告成，需要一百六十個披索（的郵費）把手稿寄給（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出版商。默塞迪斯只剩下八十個披索。因此，我把手稿分成兩半，寄出一半，然後典當了默塞迪斯的食物攪拌機和乾髮風筒，付另一半的郵費。默塞迪斯聽到說，我們最後的四樣財產也成了郵費時，她說，「呃，到此地步，出版商一退稿，那就有戲可看了。」

花：「百年孤寂」這個書名是怎樣來的？

馬：幾乎是寫最後一頁的時候才想到的。在這以前，我對書名毫無頭緒。我早就放棄用「屋子」作書名了。我作出這個決定的時候，曾經粗略計算過，發覺經過了一百多年的孤寂，但是把書名叫做「一百四十三年孤寂」不大好聽。我於是四捨五入。事後證明是明智之舉。出版商接下了這本書，一九六七年初版。後來翻譯成英文，一九七〇年在美國出版後，就舉世知名了。

花：傳說「百年孤寂」會拍成電影。有這回事嗎？

馬：永遠不會。製片家們不斷出高價要買我的版權，但是我拒絕了。我想，最近一次提的版權費是二百萬美元。我不願意把它拍成電影，因為我希望讀者讀到書中的人物時，仍然有機會發揮他們的想象力。這在電影裏是不可能的。在電影裏，人類的形象已經定型，現象也就不能再隨心所欲地發揮想象力了，只能按照銀幕上強加給他的去想象。

我研究過電影製片，發覺電影的表現形式有若干限制，而這些限制是文學所沒有的。我深信，小說家的作品是現存（各種形式的）作品中最自由的。隨心所欲。

花：像上帝那樣無所不能？

馬：呃，差不多是這樣。問題是，你不像上帝那

樣，能隨意除去書裏的人物，而只能在那個人物真正要死的時候才能殺死他。這就是烏蘇拉·勃恩迪亞的情況。如果你仔細算算，她有二百歲。我寫「百年孤寂」的時候，不只一次發現她活得太長了。我想把她弄死。可是，她還是活著。我總是需要她出現做些什麼事。只有讓她活下去，直到她壽終正寢。

花：還有人傳說，你燒了近一千頁的「百年孤寂」（原稿）。是真的嗎？

馬：不是。不過，怪的是，傳說儘管是傳說，然空穴來風，其來有自。我寫完「百年孤寂」後，扔掉了所有的筆記和文獻，避免留下任何痕跡。這樣，批評家就只能根據書本身的價值去判斷，而不是到原稿中去東翻西看。我每次寫書，都收集很多文獻。這些背景資料是我的私生活中最隱秘的部分。有點不好意思，就像給人看見你只穿內衣似的。

花：或者說，害怕別人揭穿你的魔術家的奧秘？

馬：當然。就像魔術從來不告訴別人，他用帽子變鴿子的方法。

花：「百年孤寂」快結尾的時候，你寫道：「有史以來所發明的各種作弄人的把戲，以文字為最佳。」你認為這個看法對嗎？

馬：其實，這是我朋友說的，我收入了書裏。

花：你也這樣看嗎？

馬：我認為，（寫書時，）當你開始能夠控制情節的發展的時候，是很開心的，當整本書真正在你的掌握下，沒有別的事比寫作更美妙了。這就是我所謂的靈感了。當你寫出這種叫做靈感的東西時，你的心境肯定是處於某種特定的狀態中。但是，這種心境不像浪漫主義者所想的，上帝在你耳邊私語那種，而是你和你要寫的對象之間產生了純然無間的這種境界，就行文如流水。這就是人生最大的賞心樂事，最開心的時候。書寫得順利時，我就達到了畢生的至境，我的屋子也達到了至境，我和所有人的關係都達到了至境。

花：「百年孤寂」最後一章有很多笑話和旁白。你把默塞迪斯和你很多朋友寫進去了。為什麼？

馬：因為我覺得好玩。十八個月的禁閉終於快要結束了。而那時候也寫得很順利。我有這種感覺，沒有人能阻擋我，我喜歡怎樣寫就怎樣寫，整本書就像我的囊中物。在這種心境下，我好開心，尤其是經歷過早期的一段痛苦經驗後，因此就開始開些私人的玩笑。那一段裏有很多笑話，不經心的讀者可能看不出來。朋友們看到，肚皮都笑痛了，因為他們知道每個笑話指的是誰。那是一本必須在心情極好的情況下完成的書——因為，在另一方面來說，那是一本令人很傷感的書。就像人生，不是嗎？

花：是呀，那是一本很令人傷感的書。好像拉丁美洲是不可能進步的；由於拉丁美洲的悲慘政治生活，社會變遷是不可能發生的；一切都將週而復始。這也就是一般（對拉丁美洲）的政治解釋。

馬：我知道。我聽到很多這樣的批評。有一次，我和古巴幾位文學教授有點意見。他們說，「『百年孤寂』是一本了不起的書，不過有一個缺點：沒有給出答案。」在我看來，這是教條。我的書是描述境況，沒有必要提供答案。但是，在「百年孤寂」中，我的確想表達這樣的想法：拉丁美洲的歷史包含了這許多壓迫的實例，因此必須要改變——不管是付出多少成本，多少代價！不管怎樣，「百年孤寂」並沒有說，進步是不可能的，而是說，拉丁美洲社會充滿了挫折和不義，使每一個人都感到爽氣。這實際上指出了，這個社會必須改變。

「族長之秋」—— 獨裁者之死

花：我們談了很多「百年孤寂」。如果讀者把這當作你所寫的唯一的一本書，你會不會很不高興？

馬：極不高興。我常常看到評論說，「百年孤寂」是拉丁美洲小說的至境。這是很荒謬的！如果這真的已臻至境，我就不會繼續寫了。

老實說，作為文學作品，「族長之秋」更重要得多。這是一本嘗試性的作品，因此更重要。「百年孤寂」還沒有使我豐衣足食以前，我根本不可能完成「族長之秋」，因為寫那種書要花很多時間和很多錢。

花：讀者說「族長之秋」太難讀，這有沒有令你不高興？

馬：我寫這本書也很不容易。是的，要讀那本書，沒有一點文學修養是不行的。不過我希望，終久會證明，「族長之秋」和我其他的書一樣容易讀。（詹姆士·喬伊斯著的）「尤里西斯」（Ulysses，一九二二年初版）剛出版時，人們也覺得很難懂。今天，兒童也讀「尤里西斯」。如果你問我，「百年孤寂」唯一的缺點是什麼，那就是太容易讀。

花：小說「族長之秋」講的是拉丁美洲一個獨裁者之死。這在拉丁美洲文字裏好像是一個很熱門的題材。是否由於你一生中的某些特殊經歷，促使你寫這本書？

馬：呃，同理，這本書源出於我在阿拉卡塔卡的童年。我成長的時候，阿拉卡塔卡鎮上住著許多委內瑞拉流亡份子——當時（委國）是獨裁者瑣·維森特·哥梅斯的時代。流亡份子往往神化獨裁者。流亡在外時，他們把他給誇張了。他們心目中的哥梅斯是驅使我寫那本書的部分原因。但是還有其他的來源。

花：每當學者和批評家想對你的作品進行細緻的解釋時，你總是推搪。有一次，你曾經說，「百年孤寂」本來並不算成為世界名著，而不過是勃恩迪亞家族的家史，預言勃恩迪亞家族會生下一個有豬尾巴的兒子；勃恩迪亞一家想設法避免讓預言應驗，最後還是生下了有豬尾的兒子。這樣說，你顯然是在扯後腿嗎？

馬：呃，情節就是如此。但是，要說這太誇張，那麼想無中生有（在小說裏）到處發掘解釋和象徵的批評家，至少也是同樣地太誇張。我堅持說，整本書裏沒有一個有意穿插的象徵。

花：因此，你對於把「百年孤寂」逐字解釋的許多追隨者，一定感到很有趣。

馬：不。我反而有點同情他們，一本書本來就不應該逐字理解。有一種學院傾向，不是探索書裏有些什麼，而是書以外有些什麼。換句話說，是解剖。

花：不過，一位最精通你的作品的學者，「紐約客」（New Yorker 週刊）作者阿內斯他爾·里德認為，「百年孤寂」真正的含意在於：「永遠不會有人瞭解我們。我們都獨自住在地球上各人自己的玻璃球裏。」里德對你的書的解釋是否正確？

馬：再正確也沒有了。我深信，每個人的性格裏都有一些絕對秘密和個人的成份，永遠不外傳或顯露的，譬如說，默塞廸斯和我的關係很好——我們結婚二十五年了。可是，我倆都了解，彼此都有些隱秘，是對方無法穿透的。我倆彼此尊重這點，因為我們知道，與此對抗是徒勞無功的。譬如說，我不知道默塞廸斯幾歲。我們結婚的時候，我就不知道她幾歲，而她當時還很年輕。我們一起出外旅行，我從來不去看她的護照或者身份證。在飛機上，我填妥入境表格後，就把她那部分的出生日期留下（讓她自己填上）當然，這不過是一個遊戲。但是，這個遊戲很能說明，總有那麼一些我們彼此無法貫穿的領域。我絕對相信，要百分之百了解一個人是不可能的。

花：「百年孤寂」裏的孤寂感是否就是反映這個看法？

馬：不是的。我認為，孤單是每個人都感到過的。人無論如何是孤單的。儘管社會上為此作了些協調和協議，但人還是孤單的。舉個例，我作為一個作家，和許多人有交流，而且也很容易達到交流。但是，一當我坐下來寫作，在我生命中這個十分重要的時刻裏，就只剩下我一個人了。沒有人能幫我的忙。沒有人確切知道我想做什麼——而有時候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沒有法子求人幫忙。陷入了絕對的孤寂。

花：這是否令你很害怕？

馬：不。這再也嚇不倒我了，因為我已經證明了，在打字機前工作的我，能獨力成功地抵禦

(孤單的侵襲)。不過，我的確覺得，每個人，每個人都害怕孤單。早上一覺醒來，張開眼睛，現實包圍著你，這時候第一個感覺總是害怕。

「魔幻寫實」 並非超現實

花：在你長大的地方，(心理學祖師)佛洛伊特(Sigmund Freud)和心理分析的影響可說是少之又少。這種西方人稱為潛意識的現象，會不會就是魔幻寫實家所講的同一種東西？

馬：是呀。也許是的。但是，我從來沒有研究過這些領域。還是讓潛意識自生自滅吧。這樣做在我的作家生涯中效果很好。

花：批評家用心理分析解釋你的作品時，你有什麼感受？

馬：我對此不太欣賞。我所做的沒有一樣是有意根據心理分析的。我明白，文學作品，尤其是小說，是在潛意識的邊緣上存在的，但要是有人想解釋我的作品中的潛意識部分，我不會去讀的。

花：換一個方式說又如何：魔幻寫實會不會是並非那樣超現實，而只不過是透過一雙比較銳利的眼睛去看日常的世界？

馬：呃，我的確很善於觀察事物。但是，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我來自加勒比海地區，而加勒比海地區的人什麼怪事都相信。我們受到許多截然不同的文化——非洲、歐洲，我們當地的信仰的薰陶。這使我們虛心探索表面現實以外的境界。

花：你是否經歷過一些別人未經歷過的事？你和我都認識的一個朋友告訴我們，他相信你有心靈感應的異能？

馬：我的確時常遇到些怪事。我可以想像得出，別人也會經歷過怪事。可惜的是，這類事無法有系統地處理。事情未發生以前，你根本不知道什麼是預兆或者心靈感應預兆——預言總是以隱晦的形式啓示的。舉個例說，我

最近坐火車去(西班牙的)巴斯隆拿。遠在墨西哥，我們家的一個女傭人可能隨時臨盆。因此，在火車上，我正脫鞋子的時候，感覺到墨西哥正在發生某些與我們有關的事。我對默塞德斯說，「特利莎剛生了小孩。」到了巴斯隆拿，我們打電話回去，他們告訴我特利莎臨盆的準確時間，差不多就是我預感她生孩子的時間。幻象是說不準的，但是很像有人在你耳邊私語。我猜，幾乎每個人都有過這種經驗，但是由於文化背景不同，人們要不是不相信，就是不以爲然，或者根本沒有注意。只有保持童真的人才能看到幻象。

花：「百年孤寂」裏有一段令人難忘的情節：一個教士每逢喝熱巧克力牛奶，身體就凌空而起。這是怎麼想出來的？

馬：呃，阿拉卡塔卡從前真的有一位教士，人們把他看作聖人一般，說是每當他主持彌撒舉起聖餐杯，他就離地升起。我採用了這段情節，把它寫出來時，自己也覺得不可信。如果我自己不相信，讀者當然也不會相信。因此，我決定試讓他用其他器皿喝別的飲料，看是否比較可信。呃，給他喝過各種各樣的飲料，沒有一樣行得通。最後，我給他喝可口可樂，那似乎就對了！但是，我不想免費替可口可樂做廣告，因此就給了他熱巧克力牛奶，那證明也是可信的。真的，如果他喝的是可口可樂，拉丁美洲就會出現廣告辭說：「可口可樂能令你飄飄欲仙！」

拉丁美洲獨裁者 的下場

花：我們聽說，你扔掉了「族長之秋」的初稿，因為讀起來太像「百年孤寂」。是真的嗎？

馬：半真半假。那本書我試寫了三次。第一次寫是根據記憶中一九五九年的夏灣拿。我當時負責採訪(被卡斯推翻的古巴獨裁者)巴迪斯塔手下一名大將的審訊。在一個大型室內籃球場裏提審他，罪名是戰犯。我仔細看

他時，使我產生興趣的是，可以用他的處境作為文學題材。因此，當我坐下來寫「族長之秋」時，我以為可以採取獨裁者坐在體育館中央獨白的方式來寫。但是我一動筆，這個主意立刻就崩潰了。這不合實情。拉丁美洲的獨裁者，最大的那幾個，要不是死在牀上，就是捲巨資逃之夭夭。我第二次試寫時，我決定以傳記的形式來寫——這種寫法的確在文體上比較接近「百年孤寂」。因此，這份原稿也忍痛割愛了。說老實話，我不明白，為什麼有這許多人希望「族長之秋」寫得像「百年孤寂」。我猜，假如我想多賣書賺大錢，我很可以終生繼續寫「百年孤寂」。我可以騙大家，就像荷里活那樣，出版「奧勒利安諾·勃恩迪亞上校的歸來」。我最後決定採取的形式是同樣用好幾個人的獨白組成（「族長之秋」），這就很像獨裁統治下的生活。好幾個不同的聲音以不同的方式講述同樣的事。

後來，過了一段日子，我遇到了另一個障礙。我個人從來沒在在位很久的獨裁者下生活過。要使這本小說行得通，我得了解，在老獨裁者統治下生活是怎麼一回事。我寫這本書的時候，世上有兩個這類獨裁者：西班牙和葡萄牙。因此，默塞迪斯和我就搬到（獨裁者）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住在巴斯隆拿。但是，即使在西班牙，過了一陣子，我發覺，書裏還是缺少一些應有的氣氛；太冷酷了。因此，為了獲得應有的氣氛，我們再搬家。這次是去加勒比海地區——我們離開那裏已經有好一段日子了。我抵達哥倫比亞的時候，記者問我，「你來這裏幹嘛？」我說，「想回味一下石榴的香味。」默塞迪斯和我跑遍了加勒比海所有的島嶼——不記筆記，只是居住。我們回到巴斯隆拿時，那本書就一氣呵成了。

花：你最新的小說「一項預知死亡的記述」將會在今年內出版。我們不是談到過，你說只要畢諾切政府還在智利當權，你就不出版新小說嗎？畢諾切現在還在智利，而你的書却出版了。這是怎麼一回事？

馬：噢，那只是我在「族長之秋」初版後對記者說的。我很惱怒。那本書我寫了七年，而他們劈頭就問我，「你下一步打算做什麼？」每逢人們問我這種問題，我就胡謔一個答案——哄他們。實際上，我寫完「族長之秋」後，並沒有計劃寫下一部小說。有了那個答案，以後的許多訪問中也就避免了這個討厭的問題。

花：有人告訴我們，你接受訪問時，時常編些小故事。

馬：誰說的？

花：呃，舉個例說，你自己剛才就是這樣。但是，這是許多有關你的傳言之——就是說你在接受訪問時所講的，經過「美化」。

馬：我的毛病是，我很喜歡記者，而如果我喜歡一個人，我就會發揮創作力，就像創作短篇小說那樣，以保證他或者她所聽到的與其他的訪問有所不同。

使世界運行的是女人

花：你在這次訪問中有沒有發明一些什麼東西？

馬：哪一次訪問？我們這次？現在？沒有！相反地，我正設法反駁所有關於我的謔言。

花：很好。能不能再回到「一項預知死亡的記述」上去？那本小說裏——其實，在你所有作品中——你寫妓女的時候充滿了熱情。這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馬：呃，我記憶中的妓女印象都很好，而我寫她們是出於感情的因素。

花：拉丁美洲青年男子的性經驗是否都是在妓院學來的？

馬：不，比這個要封建。上妓院要花錢，因此是年紀比較大的男人去的。初試雲雨實際上是以家裏的傭人為對象。還有的是表姊妹。還有的和姨媽。但是，我年輕的時候，妓女們和我是朋友。真正的朋友。我成長的環境是很壓制的（個人發展）的。除了和妓女，很難和其他女人建立關係。我去找妓女，目的不是做愛，而是找個伴，以免形影孤單。我

的書裏的妓女都是很有人情味的，是很好的伴兒。她們很孤單，恨她們的職業。我和妓女，包括那些我沒有和她上牀的，都有很好的交情。我和她們睡覺，因為孤伶伶一個人睡很可怕，也或者是我一個人沒法子睡吧。我老是打趣說，我之所以結婚，是因為不想一個人孤伶伶的吃午餐。當然，默塞迪斯說我是狗狼養的。

花：你的書裏的女人都很堅強。打點日常生活的是女人。

馬：我家裏也是這樣。默塞迪斯打點一切。而我的出版代理人也是女的。支撐我的全是女人。對於我來說，女人幾乎已經成了迷信（對象）。只要那件事有女人參與，我就知道那一定會成功。對於我來說，使世界運行的顯然是女人。

花：全世界——不只是一半？

馬：女人關心的是日常的現實，而男人逛來逛去，盡幹些怪事。我發現，女人有一個優點，這就是缺乏歷史感。他們關心的是今天的現實，今天的安全感。

花：你是說，不會像奧列利安諾·勃恩迪亞那樣丟下家人，打三十二次內戰。

馬：不，她們呆在家裏，主持家務，做糕餅——讓男人放心在外打仗。女人的另一個優點是，比男人忠心得多。女人唯一不能饒恕的是被拋棄。如果一開頭就約法三章，不管法是對還是錯，女人通常都會接受。但是，她們不能接受你越軌。要是你越軌，她們會毫不留情。在另一方面，男人的主要長處是溫柔。

花：溫柔？

馬：是的。溫柔不是女人的屬性，而是男人的屬性。女人了解謀生不易。

花：如果就像你所說的，女人缺乏歷史感，你怎樣解釋（阿根廷前總統夫人）伊娃·貝隆、（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巴故以色列總理）哥爾達·梅耶這些女人？更不必說聖女貞德了。

馬：呃，我說的是一般的情形。你舉的是出色特殊的例外。

花：你是否感到慶幸，你的兒子生長在一個男人和女人較容易相處的環境下？

馬：啊，這的確很好。我羨極了他們了。有時候，我告訴我的兒子我年輕時的世界是什麼樣子的，他們幾乎都不相信。譬如說，他們說了「一項預知死亡的記述」，講的是兩兄弟合謀殺死一個男子的暴行。一個女子出嫁，洞房之夜，她的丈夫把她退回給她父母，因為她不是處女。因此，女子的兩個兄弟就殺死了他們認為奪去她童貞的男子。我那個時代，這在拉丁美洲是一個平常不過的故事。但是，我兒子讀到的時候，覺得好像科學幻想小說似的。

花：你是怎樣認識默塞迪斯的？

馬：這由頭到尾都寫在「一項預知死亡的記述」裏。我倆年輕時，都住在蘇克利嶺。一九五二年，我在波哥大的「觀察報」（El Espectador）工作時，我倆訂了婚。結婚前，報館給了我一個機會，到歐洲當特派員。因此，我就得在我夢寐以求的願望和結婚之間作出選擇。我和默塞迪斯商量。她說，「你還是去歐洲的好，否則你會一輩子埋怨我。」因此我就去了。原來只要我停留一個月。但我剛到歐洲不久，獨裁者羅哈斯·畢尼拿就封閉了「觀察報」，使我留落巴黎，身無分文。因此，我退了回程飛機票，把錢作為在歐洲的生活費。一住就是三年。

花：默塞迪斯對這有什麼反應？

馬：這就是她性格中神秘的一面，我直到現在還搞不清楚。她百分之百相信我會回來。所有人都說她神經病；我會在歐洲另結新歡的。而我在巴黎，也的確毫無拘束地過我的日子。但是，我知道，事過情遷後，我得回到她身邊去。不是信用的問題，而比較像是命中註定，好像米早已成炊似的。在巴黎時，我每個星期都給默塞迪斯寫信。我們結婚後，每當遇到她不高興的事，她就會說，「你不能這樣做，因為你在巴黎時寫給我的信裏說，你絕不會這樣做。」最後，我對她說，「我要把你手中的信全部買回來。」〔談到這部分時，默塞迪斯一直靜靜地坐著聆聽。〕

默塞，那些信我付給你多少錢？

默塞迪斯：一百博利瓦（委內瑞拉幣）。

馬：很便宜阿。

默塞迪斯：當然是。

花：默塞迪斯怎樣用那筆錢？

馬：我不知道。〔默塞迪斯微笑。〕我把信給燒了。現在，我真高興這樣做了。如果信還在，就會有人死追著要出版。

由於我的書， 使人們更相愛！

花：一個獲得過許多文學獎的人，必定不會像人們對他的浮華讚賞那般膚淺。你覺得，有關這個沈默的人，藏在讚賞詞令背後的私生活中的這個人，還有什麼是我們應該知道的？

馬：沒有了。我認為沒有漏掉什麼。當然，每個人都有一些隱私，是別人永遠接觸不到的。但是我想，讀這篇訪問記的人並不打算揭開別人的隱私。他們寧願看到，這個人和他們心目中的形象剛好一樣。

花：那麼到底哪一個是真的你呢？

馬：我嗎？我是全世界最害羞的人。我也是最善良的人。在這點上，我既不管你同不同意，也不和你爭辯。

花：呢，你既然是地球上最善良和最害羞的人，那麼你認為你最大的弱點是什麼？

馬：啊，你問的這個問題，從來沒有人問過我！

我最大的弱點嗎？嗯，是我的心。我指的是情緒和感情。如果我是女人，我一定什麼都說好。我很需要別人憐愛。我主要的毛病是想獲得更多的愛，這就是我寫作的理由。

花：你真運氣，作品給你帶來了這許多愛。即使討厭你的政治的人也喜歡你的書。

馬：是呀。但是我貪得無厭。我還想獲得更多的愛。

花：你這樣說，聽起來好像縱慾無度的蕩婦。

馬：呃，是的——但是蕩的是心靈。現在，我要你向美國的讀者傳達對於我的這個印象——絕對忠實地傳達。我很怕美國會有人不愛我，而我希望透過這篇訪問記，使不愛我也愛我。

花：好吧。但是，讓我們給最後一個大問題同等的表達機會。你認為，你至今的人生意義是什麼？

馬：這個問題也許可以這樣回答，我告訴你，如果我當年沒有成為作家，我會做什麼。我希望在餐廳裏當鋼琴手。那樣，我就可以使情侶情意更濃，盡我的一分綿力。如果我能夠透過寫作達到這個目的——由於我的書，使人們彼此更相愛——我想，這也就是我所追求的人生意義了。

（全文完）

八三、一、十六定稿

夏潮愛大家，大家愛夏潮

——夏潮徵求贊助性榮譽會員——

“夏潮”又出刊了，
開始了再一次的漫長新征，
在這坎坎坷辛的征途上，
夏潮需要您——
需要您的精神鼓勵與財務支持。

只要您——
捐贈五千元（海外朋友美金二百元），
您就成為夏潮的榮譽會員，
您就可以成為夏潮的永久性訂戶，
更是夏潮的永恆之友。

榮譽會員郵撥帳號：555202黃溪南 帳戶

郵政信箱：台北郵政29-247號信箱

電影廣場



文革前的大陸電影

韓良露 譯

若依山姆富勒 (Sam Fuller) 為電影所擬的定義，民族電影 (national cinema) 就如同一個戰場，那麼中國是一個特別的戰場。所有的電影都必然地會反映出出品它們的社會，比起其他國家來，這種現象在中國電影却是自覺且始終不變的。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格外地動盪不安，從一九二〇年代開始，電影就成為此一國家最重要的大眾傳播媒體。自三〇年代國民政府整肅激進份子至六〇年代中期四人幫迫害政治反對者，電影和政治的鬥爭就一直息息相關，因而若不想不提及影片出品時之國家處境，而想「閱讀」中國電影是絕無可能之事。

在三〇或四〇年代，一部中國電影可以呈現出各種不同意識型態之間的衝突。如同每一本小說和每一篇報導文字，每一部電影對當時的關鍵事件都必須持有自己的立場，這些事件包括：是否要抵抗日本的侵略和對付日益擴散的貧窮及腐敗現象應採何對策。如果一部片子的立場過於「前進」，那麼國民政府檢查當局則禁止其太過明顯地表達立場，因此，影片就會採較為委婉的方式表達，同時觀眾也能完整領略其弦外之音。由於致力強調存在於社會中的鴻溝和矛盾，以期製造兩極化的反應，當時的左派電影在本質上被劃分出來。

相反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創建的前十五年，電影在精神上變得盡統合。「解放」後的電影業儘可能地將觀眾層面普及，其中包括那些在以往很少或從來沒有機會接觸到電影的鄉下

人民，電影態度堅定且建設性地面對社會問題；範圍從傳統束縛下之農村人口的迷信及恐懼，到共產黨所憑依之理想逐漸淡滅的危險情況。然而，和任何社會主義國家一樣，它們同時也必須臣服於政治方針的搖擺和陰晴不定。一九五六至五七年間，將目標對準中國知識份子的「百花齊放」運動，使許多電影工作者鼓起勇氣嘗試新的題材和風格。兩年之後，這一批電影工作者又在「大躍進」運動的鼓勵下，拍了一些為工業生產力突破而攝製之天真又過於樂觀的頌讚作品。當事實情況證明「大躍進」根本是一場經濟災難，它遺留給廣大人民的是幻滅和缺糧。此時，電影業復起而激勵民心，以期再燃起理想主義的火炬。

如此服膺政策的電影極易被駁斥為「政治宣傳」，對一般犬儒的西方人而言，「政治宣傳」這個字眼意味著隨便的解答和虛偽的萬靈仙丹。毫無疑問地，有些中國電影和上述偏見確有相符之處；譬如說，有些電影敘述純潔無瑕的革命英雄或女英雄如何征服勢均力敵的反動份子；有些則宣示社會主義對於社會的意義，即如北京烤鴨之美味於老饕。類似的映像在此四人幫控制之文革時代是電影的主要特色，當時江青將傳統平劇更新為「激進之改良」（譯按：指「樣版劇」）。當然，像「智取虎威山」和「紅色娘子軍」這樣的片子，必須為這種成規的確立負大部分責任。（這兩部電影較每一部早期的中國電影都流傳廣泛，部份原因是因為它們出品的時期正是西方對「第三世界電影」開始產生興趣之時。）

在中國（大陸）我們看了三十年代到六十年

代早期的電影，這使我們確證實 Jay Leyda 在其一本有關中國電影的著作「Dianying」中的基本論點：遠在文革之前，中國即擁有熟練又迷人的電影傳統。事實證明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電影乃奠基於數十年前的左派電影運動，同時許多重要電影導演、編劇、技術人員和演員的職業生涯，自三十年代的顛覆時期橫跨至六十年代中期的迫害時代。文化大革命不但破壞了此一傳統，同時更企圖毀滅其整體。「極左主義」的風潮—不管對它的權力政治之評價如何—事實上詆毀了所有的知名藝術家，無論是電影或是其他的藝術領域均然，在「極左」的威名下，許多重要的藝術家身心受創甚或折磨致死。致力恢復舊觀迄今不過兩年（文章發表時間是一九八〇年秋天），完全消去創傷仍需好長的一段時間。

曾為「中國影業發行公司」（China Film Corporation）分支機構的「中國電影資料館」（China Film Archive）關閉已有十二年之久，直至一九七八年底方重新開放（如今為獨立機構），目前致力於目錄的重編和藏片的檢查，其中有許多的硝酸鹽庫存品。為了一些明顯的理由，現在仍不接待訪客，因為還沒有放映的設施和人手。「中國電影發行公司」不僅監督新片的發行，同時還負責進口國外影片，並組織了一個「再度發行」的計劃，以期大眾能熟悉或再度熟悉以往的豐富遺產。

鑒於我們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知識的極度缺乏和語言不通的缺憾，我們對中國電影遺產的探究自然地具有諸多限制存在。我們儘可能地觀看電影，可是終究只看了比例極微的一小部份，我們此一「回顧記」所選出的影片，只能當成為了評估中國電影所踏出之嘗試性的一步。最後的清單包含了三十部長片、四部短片和十五部影片的選粹片段，其中還包括了一段由 Charles Urban 拍的新聞影片，片中出現清代晚期的北京市街。最早的影片攝製於一九三五年，最晚的則是一九七九年的作品。大部分影片拷貝由英國國家廣播公司的姊妹公司「中國影業公司」所提供（本來將至少有五部電影在英國放映），使得影片內容生色不少，其他的則由「中國電影資料館」和倫敦的中共「大使館」提供。

在下文「回顧記」的每一部電影之中，我們大致敘述出我們對中國影業發展史之研究的主要結論，同時指出在我們心目中，此一傳統裏特別珍貴且卓越之處。讓我們再一次強調，我們的觀察僅是試探性的，還有許多事務等著我們再去觀看、研究。

「馬路天使」

在上海一處貧窮地區，有五個男子同居於一座破敗的房子裏，馬路對面是一間茶室，茶室主人已經逼了一個年長的「養女」為娼，同時也想逼年幼的那個步其姊後塵。有一個男子愛慕年幼的女孩，另一個則同情援助年長的妓女，生活環境一天天的不如意，工商業蕭條、失業、食物短缺、暴力蔓延社會。

「馬路天使」的戲劇前提熟悉得幾乎令人心驚，其視覺風格之中的某些要素也是如此。和片名一樣，它們衍生自 Frank Borzage，不過，類似之處也僅限於這些地方。年輕的那個女孩為茶室的一位客人所染指，那個年輕男子怯於表露對她的愛意，但是他很快地就接受了事實，將其歸罪於無法避免的環境影響，而且不再想念那個女孩。年長的妓女試圖逃離「父母」，卻為保鏢酷打致死。五名男子中的兩個人想要找一個狡黠的律師將年輕女孩救出茶室，他們身處律師富麗堂皇的辦公室裏，益顯出他們的狼狽相，這一場戲在片中以喜劇形態拍攝。當他們獲知高昂的律師費用時，只能退縮放棄，保持緘默，對律師沒有任何不滿的表示——因為律師是握持權力之人。

在一九三五年之前，上海兩家主要電影公司「明星」和「聯華」即為左派人士徹底滲透。這群進軍電影業的年輕激進份子的意識形態衍於一九二〇年的五四運動。（譯者註：以下刪譯一小段有關五四運動大致情況的敘述）二十年代時，有許多年輕的「五四」青年學生在左翼劇團裏工作，所以當電影成為中國第一號大眾傳播媒介時，他們很自然地為電影業所吸引。明星公司完成於一九三七年的「馬路天使」也是諸多和「五四運動」牽上關係的電影其中一部。導演袁牧之的很

晚才投身此一運動，原因很單純，因為他十分年輕。一九三〇年他和家庭絕裂投入左派，七年之後，也就是二十八歲時，導演「馬路天使」（這是他最後一部劇情片）。

暫且莫提左派份子意圖將片廠固定製造出的逃避幻想之電影轉變為反映當前現實的電影之明顯企圖，他們之所以進入電影圈有其強烈愛國的理由。雖然直到一九三七年國府方承認真象宣告抗戰，事實上，自一九三一年起中國就已和侵略之日本軍隊作戰。同時，也因為當時的電影業乃由外國人創建，大部分資金仍掌握在他們手裏：許多美國及歐洲電影公司擁有發行和放映公司，並且發售許多外國影片。

「馬路天使」十分機敏地採用了一些「保險」的好萊塢式成規——部份原因是為適應需要和觀眾口味，部份是對嚴厲的檢查制度採先發制人之勢，當時的電檢禁止電影提及戰爭或正面攻擊政府方針。本片之政治意圖在片子一開始之上海碼頭摩天樓的橫搖鏡頭中即明白地顯現出來，（此舉乃為顯示片中主要情節均發生於此一城市最卑微之處，並且也為這一故事和廣大現實社會之關係提供象徵意義。）同時片子結尾是一逆轉

鏡頭，將鏡頭又橫搖至同一摩天樓。主要的場景完成於一「隔離的世界」，是一個充塞不定的喜劇和羅曼史的片場世界，生活其中的人們心中蘊藏著夢想和熱望。在妓女為人謀殺之後，這個世界終於崩潰，因為它再也無法抵禦真實世界的侵襲干擾，而改變世事情況的方法是全然處於中心人物的控制之外。

「馬路天使」中的許多觀點值得分析，可是限於篇幅無法詳細說明，譬如說：對女性地位的關切、對娼妓行為之超道德態度，十分接近 Pabst 及 Borzage 的視覺風格，同時樂團的演奏更使得此一作品蘊育著創造性的合作精神。兩位男主角趙丹和袁鶴齡在中國電影界保持了許久的「明星」地位；扮演年輕女孩的周璇，曾走紅於歌壇，並且拍了許多左派電影，直至心理疾病縮減其演藝生涯。導演袁牧之後來放棄拍攝劇情片，他其後唯一的影片是一部出品於一九三九年的紀錄片「延安和八路軍」。

一九三七年秋，上海陷入日軍手中，所有的電影界先進都離開此城，許多人重返舞台，和反日本的劇團共同旅行演出，籌募基金以支援抗戰。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那些留在影界之人士，

夏潮的朋友，請您來投稿

——夏潮徵選精簡有力的短篇小說創作

夏潮所需要的短篇小說
是社會寫實的、批判的、各階層的，
夏潮所需要的短篇小說
最好是五千字到八千字之間，
不長不短，不多不少，
只要是好小說，
夏潮將致一字一元稿酬。

投稿請寄：夏潮雜誌社
郵政信箱／台北郵政29～247信箱
電話／(02)9144333
(請於信封上註明「小說徵選」字樣)

只得拍攝一些較以往更謹慎小心的避世電影。直至一九四六年，中國電影業才恢復它於一九三七年失去的動力。

「一江春水向東流」

四十年代晚期的中國電影和較早數十年的電影一般處於同樣的備戰狀態，國民政府和共產黨的戰爭使得國府控制下的上海情況對影業而言較前更為艱苦，同時顛覆破壞之需要較前更為熱烈。有一位在戰後歸返上海工作的左派導演史東山表達他這一代的失望，他們發現戰後的社會和戰前的社會同樣地腐化和不公。「八年抗戰十分艱困，但是我們能夠瞭解接受，我們實在很難明白為何在戰後數月我們會感到如此挫敗。」史東山曾是許多共同重建「聯華」公司的電影從業人員之其中一名，而且還阻止國府當局接管「聯華」的意圖。他們後來組成了自己的電影公司——崑崙影業公司，出品當時最激進的影片。

「一江春水向東流」是崑崙公司第二部電影，也是中國影業有史以來最煽動人心的影片。分為上下兩集，時空跨越自一九三一年日本人侵略東北至（未確切年代）電影拍攝期間時的國共戰爭。描繪一名原本愛國理想的學校教師對政治、精神及道德的退卻。結婚不久，他投身紅十字會以為抗戰盡一份力量，後來為日本人所俘，但卻逃至國府所在之陪都重慶。在那裏他很快地為布爾喬亞的生活所誘，然而他的父母、妻子和孩子卻在上海忍受困苦的生活，為了物質利益，他甚至重婚。戰後，他返回上海將他的公司自日本關係中解脫出來，同時遇見了首任妻子。自片子一開始即構築的社會矛盾在歇斯底里的會面中迸發出來，在最後一個鏡頭裏，他的母親（直接對著攝影機）尖叫，意味著苦難即如一江淚河向海流，永遠無休無盡。

此片的政治方法本質上延襲自尚維果之 *A propos de Nice*：頹廢的奢華和悲慘的貧窮十分具組織地並列在一起。「一江春水向東流」，比起其他我們看過的片子，更繼承此原則。導演採平行剪接的手法來拍攝男主角之沈溺在第二任妻子及情婦身上，以及他真正為了家庭求生的

痛苦掙扎，此法非但政治味濃厚以及十足煽情，而且也為中國社會十六年來擴大之矛盾提供全視的基礎。其中有些反諷來自平行的場面：丈夫和妻子的拖鞋整齊地擺在雙人床邊，平行於丈夫首次背叛妻子時，鞋子在地板上擺動。也有更明顯的對比：真實家庭困苦情況的幾瞥在風格上十分地「寫實」（並且時常穿插入真實的戰爭新聞影片），然而重慶場景則以憤怒的態度沿用劉別謙式機智及風格化的機敏；成規的潰敗與中國社會的破裂共鳴，這令觀眾得以瞭解主人翁對社會及性墮落的讓步；不管他的行為是如何地該受譴責，最重要的是要顯現出他也是一名受害者，而不只是一個大惡棍。

若不是製片人定期地賄賂有關當局，這部影片根本不能攝製或發行。由於它引起迅速且廣大的歡迎，致使檢查單位感到難堪，所以就對「崑崙」後來的出品施以特別嚴格的尺度以彌補此次過於寬鬆的結果，於是「崑崙」一九四八年出品的電影十分地「溫馴」。直到一九四八年製作的「烏鴉與麻雀」才膽敢再度攻擊國府當局，並且這部片子完成於上海「解放」後不久。「一」片和「烏」片均由鄭君里執導（「一」片由其與較長之蔡楚生共同執導，蔡氏並且在劇本編撰上貢獻很多心力），但是若以作者論來檢討這兩片將會犯下錯誤。如同三十年代的左派電影，它們基本上是群力合作的影片，並且力量很清楚地來自產品中團隊的共同一致。

「龍鬚溝」

「解放」之後，電影業很快地為共產黨控制，全國性的新片廠開始製作頌讚「社會改良」並且試圖治癒戰爭傷痛的電影。當局允許五家在「解放」前最前進的電影公司（崑崙公司也包括在內）繼續獨立營運，然而它們對為「國家當前需要」服務興趣缺缺，於是在拍了幾部「意識型態含混」的片子後，一九五二至五三年間，它們為國有事業吸收。

「龍鬚溝」由「北京電影製片廠」拍攝，「北影」為國有事業的新基點之一。它同時具有當時電影的力量及限制，如同許多中共的電影，它

本自現存之來源資料，本片根據老舍的劇作改編，於一九五一年由「北京人民藝術劇團」擔任演出。（以文學作品和戲劇創作為原始劇本資料的現象越來越普遍，部份原因是為了省時，部份是為了劇本來源中涉及的意識型態問題早已排除掉了。）此劇敘述一典型的「解放前後」的故事，再現北京最貧窮的一個地區。片名的渠溝是一條流經人口密集地區的開放式下水道，接踵而來的不幸降臨到一群共有小院的居民身上，他們原已為稅收和地頭蛇的壓迫逼的喘不過氣來。「解放」後，下水道掩蓋起來，地頭蛇也被逮捕，人們尋找到生命的新方向。

無論如何，影片的視覺意象過於大量製造了單純教條化的觀點。「解放」前的場景用平面的印象主義式映象來顯示苦難和貧窮，影片的第二部分一反前段之愁雲慘霧，轉變為朗朗晴日和清明的樂觀氣氛；效果頗具印象主義色彩，然而由於對比的過於極端，使得片子結尾顯得過於一廂情願式的天真與油滑。這點嚴重地損壞整體演出的可信度，糟蹋了老舍精湛的北平俚俗表現。和其他的西方同業一樣，中國的電影製作者必須曉得顯惡要遠比揚善來得容易。

這部影片清楚地顯示出當時中國影業所面臨之中心問題：「解放」之適切表象為何？有些片子聚焦在以往之鬥爭掙扎以避免此一問題，但是就某種程度而言，大部份五十年代早期的電影，和「龍」片一樣偏向於誇張的表現手法。同時，這種解決方式也為文革時的「革命浪漫主義」預鋪好了道路。

「李時珍」

直至一九五六、五七年間的「百花齊放」運動，如同其他藝術工作者，中國電影製作者才尋到新路。此運動意圖為共產黨吸引到更多的中國知識份子，不論是否直接「為廣大人民服務」，它鼓勵自由發表意見或想法。（有些對此運動有所迴響的知識份子隨即悔於自身的孟浪，因為緊接在五七年夏天的「反右派運動」中，他們遭到了整肅。）毫無疑問地，此一運動也有其正面效果，它提供了許多「解放」前的左派電影老手許

多有趣的拍片計劃。兩位在四十年代晚期曾為「前進」之「文華影業公司」工作的影人投入「百花齊放」的陣容，依據巴金的原著「家」改編，拍了一部成熟又具風格的電影。一位五四運動電影的開拓者——孫瑜，自政治荒原中抽身出來，拍了一部機敏的歷史奇譚「魯班傳」。約和孫瑜同時竄起的沈浮，於三十年代晚期開始執導電影，同時也參與了「烏鴉與麻雀」的編劇工作，「李時珍」之導演的行政職責即由其擔負。

這部電影是記敘一位被人尊為中國草藥之父的明代學者高雅且令人感動的傳記片，除了給予趙丹（「馬」和「麻」兩片中的明星）得以擁有飾演自己數十年來最為豐富且最不誇張之角色的機會，並且和同時在日本拍攝之溝口健二晚期電影一般，它加強了中國電影的單純力量和視覺上的繁複色彩。影片時空包括了李氏生命中一段三十五年的時光，自一五四〇年為皇帝診病未成，因而促使其追溯一些在藥學上久被輕視的學規開始，直到他更深入研究而改訂修正了中國的本草綱目。

李氏代表一位「模範」的知識份子：他的努力為帝國政體壓迫（王朝之內政成員都支持貴族內臟是由金子造成的想法），並且回歸農村學習農民傳統的草藥療法。同時本片以早先五年任何影片都想不到的方式來塑造一個個人形象。最有關的事情並不在於他的科學技術或職業決心，而在於他在傳統的既定歷史整體中所占之地位：壓迫他在王族及僧侶為許多仁慈之父親形象彌補（李氏的父親是一位富同情心的皇室醫藥學院的講師，也是一位草藥學家），同時李氏還訓練了一個農家小孩作為他死後的醫學傳人。沈氏在本片藝術上和政治上的成就看起來均十分有道理。

「暴風驟雨」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整肅中，中國電影在各方面都遭受政治上的打擊。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促使製片的預定數量和成本的減低，然而却又要求電影以增強的工業化生產方式拍攝，因為一九五九年是「解放」十週年紀念，必須有頌讚慶祝的史詩之作出現。慘淡的一九六〇和六一年



「暴風驟雨」一片探討革命中發生的現實困難，是「解放」前後痛苦掙扎的記錄。

，中共上層統治階層權力騷動，導致文化工作者感到對指令之無所適從和矛盾。在一篇完成於去年的論文中，前「文化部長」兼電影編劇夏衍指出，許多以「土改」為主題的電影尚待進一步檢討改進，然而由於政治路線不斷的變動，致使此一目標未能實現。很顯然地，只有謝鐵驪的「暴風驟雨」實現了此一目標。

「土改」在中共勢力興起之事中占了極關鍵的地位，共黨利用此一論點作為吸引廣大中國農村人口的基礎，在充滿政治和經濟危機的時代裏，在普遍人心中，這是個極具說服力的論點。電影根據周立波出版於一九四八年的同名小說改編，十分具有「黨性」，卻也寫實地刻劃出履行「土改」政策時所遭遇的問題。原著（更令人驚異的是電影劇本也是如此）和三〇年代之中國農村影片一樣，表達著同一格言：日本人殺了太多人，國民黨抽了太多稅，共產黨遭遇太多的事。

原著和電影的地方背景均在中國北方的一個農村，那裏是四十年代晚期共黨之「人民解放軍」首先虜獲的地區之一。一個「解放軍」的工作

隊來到此農村教導鄉民和農工該如何掌握自己合法的權利。很快地，一條明顯的鴻溝分隔了工作隊的馬克斯主義辭藻和農民的迴應，歷經數週之久的誤解和討論，甚至差點釀成悲劇，農民終於想通了，將地主交付審判，以懲其以往之不義和冷酷。

雖然對城市幹部和農村居民間存在數世紀之久的傳統溝通障礙之觀察有失於扭曲之處，本片也承認所有那些在革命中發生的現實困難，我們可將此片視為「解放」前後之痛苦掙扎的紀錄，或者視為對「大躍進」之失敗的道歉。但是這部電影可能是迄今為止中國影史中，為革命過程中提供了最為圓滑及忠心的理由之影片。然而它也包含了其自身之反面意義，它可說是文革時代之絕對、單純的「模範革命作品」。工作隊長的角色由于洋飾演（自第一部完全在「解放」之後拍攝的電影開始，他就一直扮演此類代表人類終極改良品的角色），此角被塑造以過多之人類溫情，因而被誤為文革時代最無缺點之英雄形象，但是角色仍以「懷抱革命真理之人」的典型呈現，

而且他所有那些表面錯誤的時刻全是偽裝的。

同年拍攝的另一部電影更清楚地指明即將迫近的「極左」淨化風潮，「洪湖赤衛隊」是一部自舞台改編成之現代（意思是說新撰的）革命樣板戲，可說是文革時代革命鬥爭的先鋒，當然更加對英雄式的為共產黨殉難之強調。這部電影擁有後來的文革電影所缺乏之活力和令人信服的狂熱精神，有趣的是，它也是為創造中國明確文化造型此一嘗試之中的一小部份，但是它也預兆了以後接踵而來的許多事件。



文革使得電影製片停頓了四年，在這之前，最後一部重要電影是水華的「革命家庭」。

文革使得電影製作停頓了四年，在這之前，最後一部重要的電影是水華的「革命家庭」，這是一部混雜著預言和告別辭的回顧電影。趙丹扮演一位「革命烈士」，在「解放軍」到達之前，死於國民軍隊之手。他為此角色帶來了不凡的莊重和尊嚴；就彷彿三十年來之左派電影和此一角色同時身處垂死掙扎。在處刑之前，幾乎在整部電影他都身處一個髒亂孤立的囚牢中——很嚴酷地，這似乎預示了趙丹在文革時期的真實命運。

「白求恩大夫」

六十年代中期有些電影已經起而反抗「極左」運動，謝鐵驪的「早春二月」、謝晉的「舞台姊妹」、李俊的「農奴」（拍攝於西藏且演員均為藏胞）均包含野心勃勃之場面調度和幾乎顯而易見的革命精神。但是，只有一部電影完全和當時之統御的政治文化處於相反地位，那就是張駿

祥的「白求恩大夫」，獻給一位在一九三九年自願貢獻生命為紅軍服務的加拿大胸腔外科醫生。片子於一九六四年開始製作，攝影師吳印咸在戰時是紀錄片攝影師，在真正的白求恩去世前不久曾為他拍下影片。在影片收尾期間，由於江青之私人命令，拍片工作擱淺下來。（因為江青認為吳氏之真實紀錄片已足以使人牢記這位外國人的勇氣）。直到一九七七年，全片方告完成。

由於這是唯一一部以西方人為主的中國電影，本片僅能視為對國際主義的辯辭，除此之外，沒有什麼地方是「激進」的：它的立場比「毛澤東主義」要來得人道主義一些，容易被控訴為社會主義溫情，劇本只是簡單地敘述白求恩在中國的生活和工作。反過來說，由於其本身的限制和單純，使其顯示出對六十年代中期大多數影片流露出之懼外症的明顯攻擊。這就一點而言，它的論證力量是很明白的。

一九七〇至七六年間，電影界製造了許多「模範革命作品」，幾乎所有作品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們誇張的映像和自說自話。直到一九七七年「四人幫」垮台之後，電影界才掙扎地想恢復到以往之舊觀。迄今為此，進步仍舊很慢很痛苦。一九七九年間，只有少數幾部影片受到大眾喜愛；甚至發生過憤怒的觀眾將票送至影業領導者處要求退回部份票款之事，因為他們覺得那部電影不值得全數的票款。

「文化大革命」為電影業帶來巨大的損害，它不僅謀殺及傷害了許多重要的從業人員，並且事實上使得整個電影業在視覺上退縮了一大步。最近的幾部片子如韓小磊的「櫻」及張錚的「小花」是最早幾部突破文革基型的電影，然而它們卻太過於明顯地模仿海外電影（殊為可惜地，特別是台灣的感傷通俗劇）以求己身希望的象徵。未來最大的希望是：提供新一代機會去觀看並分析過往的成就。這種情形已在醞釀之中，以往之遺產豐富得足以構築這一情況。

本文資料出自 Sight & Sound

倫敦電影節所寫

原作 Scott Meek

Tony Rayns

南韓「經濟奇蹟」

的昂貴代價

黃立禾 · 譯

美國副總統布希在今年（指一九八二年）四月間訪問韓國時，曾經宣稱「韓國創造如此經濟奇蹟，美國身為其盟友甚感光榮」。他還稱讚南韓人民因為其吃苦耐勞的民族性他使們「比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人民工作時間更長……爲了將來——甚至是下一代的子孫，他們還犧牲了目前的享受。」

的確，南韓自從改變它原來主要的農業經濟型態，進入生產鞋類、紡織品、成衣、鋼鐵、造船等爲輸出導向的經濟型態以後，它的工業成長率確實驚人。但是，布希先生忽略的一點是：南韓人民爲這「奇蹟」却付出了多麼昂貴的代價！

■巨額外債，換來的工業成長■

今天，數以百家的工廠都簇聚在兩、三個城市並且集中在南海岸附近。它們所造成的嚴重污染再加上政府對改進農業措施的毫無規劃，已經迫使四周圍鄉下地區成千上萬的農民和漁民擁入城市尋找工作。但是，一旦離開鄉土，這些人們才發覺工作機會却很少，工資也很低，並且所從事的往往還是很危險的工作。

更糟糕的是，韓國政府還希望在未來的廿年內致力於發展核子運動，以減少對昂貴的外國原油之依賴。但在這段期間內，爲了幫助彌補能源

上的巨額開銷，輸出品價格勢必要暴漲，並且工資和工資的調整也會被壓至最低，以維持工業進一步的發展。

自從一九六〇年代開始，南韓在日本和美國的扶持下，從外國銀行借貸大量的金錢和跨國公司的支援投資，建立了以適應世界市場需求的製造業爲經濟基礎的工業結構。至於，能夠吸引外國投資者和貸款者的主要因素則靠南韓強而穩定的政府，使得低工資、低扣稅、不良的工作環境及勞工法不致有所改變。

南韓經濟繁榮的最初階段，靠政府提倡的一些輕工業像：合板業、紡織成衣業、電子工業等。但是，一九七〇年代早期，政府決定開始投資在鋼鐵、石化、汽車、機械和造船等重工業方面。

爲了配合外銷工業，南韓輸入了大量的原料與機器，而正當輸入與輸出工業激劇成長的時候，本國的傳統工業和農業就被忽視了。

到了七〇年代中期，南韓的輸出貨物總額高達美金五四億元——數目爲一九六〇年的一六八倍，但這數目只能使人產生錯覺。目前南韓的輸入已經超過輸出總額，其中燃料和原油的總數佔輸入總額的三分之一。而今天南韓的外債已高達美金三五〇億元——對於一個人口三千萬，面積與印第安那州一樣大的國家而言真是一筆大數目！

當南韓固守其迅速成長的政策時，快速工業化在鄉間所留下的後果是相當顯著的。

■破碎的農村，污染的家園■

一九八〇年這個國家遭遇到他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農作物歉收。南韓曾經是稻米輸出國，卻被迫從美國進口大量的穀物。政府把歉收歸咎於寒冷的氣候。但是，農夫們卻責怪是因為政府過去強迫他們種植所謂「綠色革命」的稻米新品種所致。

七〇年代初期，為了使稻米增產，政府發展了一種曾經在菲律賓使用過的「奇蹟米」。這新品種原來的產量是比傳統稻米高，但是幾年以後，農夫發現他們的新作物不能適應南韓冬季寒冷和多雨的氣候，並且容易感染當地的蟲害。

在近幾年內，韓國農夫只好使用大量殺蟲劑，平均一英畝使用量高達六〇磅，使南韓成為世界上單位農作面積使用農藥最多的國家。也由於在農藥上的巨大花費，迫使很多農家因而破產。

雖然在一九七八年，韓國政府承認全國稻米耕作總面積百分之十二以上因為奇蹟米對蟲害的微弱抵抗力而導致歉收，但是，一些評論家仍然指控官員們低估了它的傷害程度。

根據韓國天主教農民協會所發表的調查報告指出，每一戶遭殃的家庭，一年減少了百分之五〇的收入。並且很多村民由於過度的工作和長期暴露於化學藥劑而深受疾病之苦。

南韓受污染最嚴重的是南方工業和農業混雜的「蔚山」(Sam Soow) 地區。

蔚山平原曾經一度是韓國南方最主要的稻米產區，三、四年前，那裡不再豐收了。一大堆的發電廠、石化工廠、肥料廠、冶銅廠、鍊鋅廠和煉油廠，徹底地破壞了這個平原，一位南韓的環境學家說道「沒有人願意買他們的土地了，農人們也不知道能做些什麼」。很多農人只好遷往工業區附近的小城鎮，使得它在幾年內人口由三萬人增加到三十萬。

七十年代間，較大的環境公害如：由於蔚山附近化學工廠的二氧化硫氣體洩漏兩個小時造成六千人窒息的事件，後來也成為當地極平常的事。到一九八〇年，這個地區的污染變得更為嚴重

，以致於有九萬人遷離此區。

魚兒的命運也開始遭殃了！工業污水被排入沿岸的魚蝦養殖場，並且嚴重的影響到漢江的出海口。兩年以前，漢江河口一帶曾經是韓國南方的主要漁場。但是，現在漁民們開始因為骯髒的河水而感染皮膚病，也被迫放棄他們的生計方式。

據估計，一年內遷離那被污染而荒蕪的家園，湧往城市的農、漁民，為數高達八十萬人。一旦遷移入城市，他們往往只能棲息在都市的邊緣市鎮一些臨時搭蓋的小房子裡，這些地方通常都很骯髒並且缺乏足夠的供水和衛生設施。

至於漢城空氣污染的嚴重程度比起日本或美國的城市超過十幾倍。它的自來水源近來也變得非常的污濁，以致於引水口必須往上游移動卅七英里。

■勞工的權利被剝奪■

當我詢及南韓的工業成長對工廠內的工人有什麼實際的影響，一位勞工組織成員冷淡地回答：我認為韓國的「經濟奇蹟」是以勞工們的血和汗換來的。假使工人們能夠擁有他們自己的權利，那才是真正的奇蹟呢！而在如此惡劣環境下，勞工們居然仍舊能繼續工作，這倒也是一項奇蹟！

南韓產業工人的平均工資大約在每小時美金〇・七到一・〇之間，一個星期的工作時數達六〇小時。政府官員主張工資必須壓至最低，以增加南韓的工業產品和其它國家的競爭力。像在去年，即使通貨膨脹已經高達百分之卅的時候，資方仍被指令工資的調整不得超過百分之十五。

還有，工廠的安全情況更是可怕。去年，官員們已承認近幾年來的工業意外事件「數目龐大並且損傷慘重」。依照韓國時報 (Korea Times) 的統計，一九八〇年受到傷害的有 117,938 人；其中 1,295 人死亡，101,837 人受傷，15,000 人感染了各種職業病。

南韓的工會和美國的大使館官員均一致認為，在經濟繼續衰頹的時候，勞工情況一定會更加惡化。新的勞工法更剝奪了工會的影響力和明令禁止他們跟資方談判協議。

另外一項欲節省耗費的措施是，政府爲了取代昂貴的進口石油開始核能計劃。南韓已經有一座運作中的核能電廠，並且幾年前宣稱在未來廿年內將再建造四十四座，使它達到供應全國電力需求的百分之四十。

不過，一份世界銀行的研究奉勸南韓政府對它的龐大核能計劃作重新考慮。依照這個研究，南韓政府不但沒有一個有效率的核能管制機構，甚至連受過訓練而足以控制那麼多數目核能電廠運轉的人員都還太少。

報告還顯示，對於低、高程度的放射性廢料處置方法的規範也很缺乏。如果照計劃進行，那麼估計每年將會有一五〇萬噸的放射性廢料產生。而到報告發表時間爲止，南韓政府還無法決定廢料的處理是要儲放在南方海岸外的小島，或是投入海中。

目前，在南韓大多數的核能反應爐所產生的放射性廢料被儲放在反應爐附近。不過，去年日本的報紙曾經報導過，南韓已經將其部份核能廢料直接投入日本海。

隨著核能電廠建造費用的高漲和南韓本身經

濟情況的繼續蕭條，韓國不得不減少它那龐大的核能計劃。而政府目前所能夠把握的（至少暫時），就是把已經建造中的五座和設計中的二座電廠徹底完成。

人權提倡者、活動的工會份子、工人和教會代表，曾經擔心過一些使韓國遭殃的計劃，他們目前已開始關心核能電廠將對環境、廠內工人和附近地區產生的衝擊。

計劃中的核能電廠大部分位於韓國南方的工業區附近，也就是在這個國家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一位韓國人士曾指出，任何核能意外事件，不管是發生在核能廠內的，或者是核能廢料的輸運中，或者廢料儲存地區，都可能傷害到幾百萬的人口和摧毀這個國家僅存的一些自然資源。

一個活躍份子被問道：南韓人民如何能夠幫助解決這些問題呢？他回答「韓國人首先要關心的是，去製造一個可以公開討論問題的氣氛——但是，除非我們有足夠的民主，否則我們也做不到。」

（譯自 1982 年 7 月「Not Man Apart」）

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記

美國記者亞克森斑所著的

「日本上空之煞星

——復活中的軍國主義、

將以翔實資料與親身訪問告訴你日本軍國主義如何死灰復燃，如何在日本官僚與財閥的陰謀統籌下有計劃地復活起來，龐大起來。

出版 / 學術出版社
定價 / 六十五元
郵撥帳號 / 4876號

出版 / 四季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郵撥 / 一〇五六二六號
定價 / 二二〇元

迎接「中國之春」的
王曉波著：「春天與中國」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王炳章在紐約出版了一本雜誌叫「中國之春」。在這之前，一九八一年四月，凝視中國未來的王曉波爲迎接中國的春天，在台北出版了一本書叫「春天與中國」。王曉波以充滿樂觀奮鬥的堅定口吻宣告：「黎明前的黑暗終究要在陽光下逝去的，冬夜的酷寒也終必爲春風驅逐。分裂的中國要統一，被壓迫的人民要民主。中華民族要從重重的枷鎖中解放出來，擁抱即將來臨的春天。」

這本書論述了近代以降中華民族的苦難，也探出了一北京之春」以來中國春訊的脈動。「中國之春」的出現，更證明了王曉波敏銳的觀察和預見。

公害日誌

□ 編輯部 □

類別	地區	污 染 內 容	備 考
環境污染	全省	台灣地區十大死亡原因中的惡性腫瘤和支氣管炎、肺氣腫及氣喘病，均和工業化所帶來的環境污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而且近年來肺癌的死亡率也逐年上升，而呼吸器官的疾病已被認為和空氣污染有密切的關係，由此可見今天台灣的環境污染問題，已嚴重到危及到大家身體健康的地步，不容當局再作忽視。如何使人們的生存不再受這無形殺手的威脅，實為現今當務之急了。	72. 1. 16. 聯合報
公害防治	宜蘭縣	宜蘭縣政府鑒於工業發展及人口密度增加的影響，所帶來的公害問題，使農業生產環境受污染程度日趨嚴重。決定在縣內全面進行農業生產受到公害損失情形的調查，作為今後積極防治的依據。	72. 1. 15. 中國時報
空氣污染	全省	省環境衛生實驗所公佈七〇年度全省空氣污染影響農業實況調查結果，受害面積共計六一五·七五公頃，其中以苗栗縣最嚴重，佔受害總面積六二·八%，新竹縣第二，桃園縣第三。而本省空氣污染傷害農作物，以硫氧化物、氮氣、氟化物三者最為嚴重。	71. 12. 8. 中國時報
公害追跡	彰化縣	台化公司排放臭氣的問題一直深受彰化市民詬病，該公司雖聲稱已花費鉅資改善，但是據附近民眾表示，該公司常利用晚間排放廢氣。時常開車經過該公司的駕駛人也表示，台化喜歡在夜間排放廢氣確有其事，有時候臭氣太濃甚至造成薄霧，影響開車視線。附近的教育學院受害尤深。一般市民咸認為台化公司這種缺乏誠意、取巧污染環境，太不應該。	72. 12. 8. 中國時報
水 污 染	彰化縣	根據彰化縣農田水利會的調查指出，該縣境內排放廢水未符合規定的工廠及畜牧場約有八百家，受污染影響的灌溉面積佔總面積之20%，使每年稻谷減產量高達二百九十四萬五千多公斤，並增加水利設施維護費在四百一十八萬四千元以上。由此可見彰化縣水污染情況之嚴重。	72. 1. 3. 聯合報
空氣污染	中南部	台糖公司在採收甘蔗時，因限於技術，不得不先燃燒蔗葉，再以機器採收，往往在燃燒之際冒出濃濃黑煙，灰燼四處飛揚，令產蔗區居民深表不滿。數年前，南部地區居民就為此鬧出風波。大家希望台糖能夠改進採蔗技術，或最起碼把採收時間提早於清晨，將災害降至最低。	71. 12. 11. 中國時報